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La lutte de classes
Nouvelles leçons sur l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阶级斗争

工业社会新讲

Raymond Aron

[法国]雷蒙·阿隆 著 周以光 译

译林出版社

刘东 主编 彭刚 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阶级斗争

工业社会新讲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封面设计 胡 苨



ISBN 7-80657-482-4
I·373 定价:13.50元

人文与社会译丛

阶级斗争

工业社会新讲

Raymond Aron

[法国]雷蒙·阿隆 著 周以光 译

本书由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法）阿隆（Aron，R.）著；周以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6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La lutte de classes Nouvelles leçons sur l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ISBN 7-80657-482-4

Ⅰ.阶… Ⅱ.①阿… ②周… Ⅲ.阶级斗争－研究
Ⅳ.D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2939号

书　　名	**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
作　　者	〔法〕雷蒙·阿隆
译　　者	周以光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Editions Gallimard，1964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182千
版　　次	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82-4/I·373
定　　价	13.5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契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封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逐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1962年，当我发表《工业社会十八讲》的时候，我写了如下一段话："这些课事实上是于1955至1956年间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曾由大学文献中心把授课内容用速印机油印出来。直到今天我仍拒绝把讲稿原封不动地出示给更广泛的读者。我把我迟疑的理由立即告诉读者。这些课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研究的机会，是学习的工具，它们启发一种研究方法，勾画出一些概念，提供一些现象和见解。讲义中保留着而且不可能不保留讲课和即席发挥的痕迹。这些课程事先没有撰写成文，因而是口语形式的，难免有缺陷，事后尽管做了修改，以减少其不足之处，但不可能彻底消除。"

《十八讲》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国外多家出版社表示要将它翻译出版，这促使我决定发表这第二册书，然而我仍然要重申关于前面那本书所做的提醒。本书的十九讲是于1956至1957年间在巴黎大学教授的课程。分析阶级斗争是继分析工业社会之后进行的，虽然对阶级斗争的分析本身是自成体系的，但是读者只有把两册书看做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才能充分抓住分析的依据和意义。我对工业社会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曾使一些评论家感到意外的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进行对照的做法，在我看来都将因研究的展开而得到证实。对于工业社会的研究本身不是终结，它应该作为先导，引入另一项研究，即在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的对于阶级关系的研究，而这项研究再导向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这将是第三册《民主和极权》的内容。

同时，我很愿意用几句话来回答某些评论家对我的一个指责，应当说他们是出于好意，如米歇尔·科利内和罗贝尔·康泰。为什么我没有把本属于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的东西，即关于工业社会的思想和用语，归于他们的名下？如果我意欲对这个概念做一个历史性的概述，显而易见，我必然会去参照圣西门主义者或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如同我在其他情况下已经做的那样①。然而这不是我在《十八讲》中前四讲所要表述的意图，在那里我仅仅想粗线条地勾勒我打算遵循的方法，同时我也想提出把托克维尔预见的**逐渐资产阶级化**和马克思预言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两者进行比照。关于托克维尔既不是理论家又不是工业社会(在他所访问的美国当时尚不存在工业社会)的目击者这一点我很难不知晓，尽管米歇尔·科利内煞费苦心让我明白。但托克维尔**从政治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对未来社会的见解比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的看法要更加正确，本书要证实的正是这个事实，如果不是坐井观天地看待西方社会，所确认的也是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决定了我选择上一个世纪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并展现他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为的是将它们与本世纪的现实进行比较。

把圣西门主义者阐述的题材与现实加以对照也并非没有好处和教益。我在论述有关战争的主题时正是这样做的，我引证了奥古斯特·孔德。然而当涉及圣西门主义者时，会出现两类困难：如同亨利·古耶在一些书中所论证的那样，亨利·德·圣西门本人的思想在圣西门主义中所占的比重很可能是有限的，而且无论如何，难以将奥古斯丹·蒂埃里、奥古斯特·孔德、昂方坦和

---

① 见《工业社会和战争》以及《历史意识的向度》。也参见1963年4月发表于《论证》杂志上的文章：《发展和思想》

巴扎尔的贡献与圣西门主义割裂，虽然某些人对此故作不知，但任何人都未予以否认。圣西门主义者表达和传播了时兴的思想，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他们的思潮缺乏严谨和系统的形式。托克维尔或马克思分别对我提出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而我们也许不能对圣西门主义者作出同样的评价。

当然，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孔德能够称得上是我们所生活的技术社会的预言者，如今，在电子机器尚未管理我们这个社会之时，**经理阶层**管理着这个社会。但是他们在预示所有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时，却无视我们时代经历大分裂的可能性，这两册书(继而第三册)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力图客观地来讨论这个主题。托克维尔设想民主社会可能具有两种体制，一种是自由社会，另一种是专制社会。卡尔·马克思则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进而分别以这两个阶级所统治的不同制度之间的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孔德对**政治学科的特殊性**更缺乏判断力。或者至少是这样：假设某一天对事物的管理应该取代对人的统治，那么为使圣西门主义者和崇拜奥古斯特·孔德的人得到安慰，我们也只能说他们的预言还是大大地超前于今天的社会。

讲课距今已有六年多。最近十五年西欧历史发展之迅速令人震惊，使我今天不可能完全像昨天那样来探讨这些问题。然而，在我看来这项研究的成果已为世事的演变所证实。但是在某些要点上还需加以补充，在这个前言中，我将只是扼要地予以指出来。

一，工人阶级是越来越走向趋同，还是正相反，即越来越走向分化？分化的原因是工人之间的差距扩大了，有些是没有任何专业资格的非技术工人，有些是持有专业培训文凭的工人或

管理着一架机器的低级技术人员。我认为我给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充分的。任何简单的回答都没有价值,因为多种多样和互相矛盾的演变是纵横交错的。上一个世纪所有工业部门中的专业人员失去了他们的重要地位,此外,众多工业部门中的熟练工人似乎销声匿迹而成为毫无特色的人群,每一个人都被迫从事一项"分割得极细的劳动"。但是这种景象仅代表所有工业组织类型中的一种,在某些尖端工业部门(石油、电子、电气)中,工业组织类型好像完全不同。从新型工人阶级的情况看,一方面是不同的劳动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是更高的消费水平以及大众传播媒体的作用(这种作用将逐渐窒息上世纪可能存在的工人团体的原始文化和自主文化)决定了他们的态度。两种简单说法——日益增长的趋同,日益增长的分化——中的任何一种都不符合现实的复杂性。

二,随着经济的增长,群众,包括工人群众更加趋向于采取请愿的方式,而非造反的举动,这几乎不再成为疑问。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使阶级斗争**具有政治色彩**,换言之,无产阶级要把自身定位于一个旨在全面夺取政权的政党,这些都不再时兴,甚至在共产党保有稳固的常设机构和几百万选民的法国或意大利都如此。在意大利,共产党寻求一种更灵活的策略,并拒绝全盘谴责共同市场。经验甚至使最狂热的思想家都几乎不再坚持认为:在所谓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任何改善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可以合适地把工会和政党旨在进行即时的改革(列宁依据英国的范例称之为**工联主义**)称做实用主义的活动,而把共产党反对现存制度和以革命为目标称做意识形态活动的话,那么,一五年来欧洲经济的发展处处都加强了实用主义趋势,而削弱了意识形态趋势。

然而,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冲突从此没有其他目的,

仅仅是"利益分享",那就错了,因为增加工资或抵制技术改造会引起痛苦的转化过程。尽管眼下在大部分国家中的大部分工人似乎对共同管理的种种方式还有点漠不关心,但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在某些国家,以组建企业为目标的请愿将发展起来。在实用主义争论和意识形态冲突之间,人们发现了第三种形式的论战或斗争,其最终目的可能是加强劳动者参与企业生活,或者加强管理人员或劳动者代表参与某方面的领导。

三,最后,在美国,有四分之三居民的生活水平继续在提高,与此同时,一部分居民——有人说占 20% 到 25%,另一些人说占 15% 到 20%——的贫困状况没有消失,相对地说,也许绝对地说,甚至有加剧的趋势[1]。这种现象在美国比在西欧国家更为明显,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保障的缓慢进程(老年人的贫困)、多种族的并存(黑人、波多黎各人)、悬殊的地区差异(某些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减慢)、青年的失业现象等。富足社会中"失败者"的分量不均衡地落到各类社会集团的身上。最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最可能找不到职业。

尽管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不那么突出,目前,欧洲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阶段,但时过境迁,同样的问题也有可能在这里显露出来。现代企业技术复杂,要求为数更多的劳动者具有越来越高的专业水准。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提供给最缺乏专业知识的劳动者,即使被雇用,他们从工业社会感受到的也只是受奴役而非得益。

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足的社会里,贫困问题甚至赤贫问题正显现出来。这里所指的贫困不是在生产资料发展的情况下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的问题。这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贫困化概念没有

---

[1] 参见迈克尔·哈林顿:《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纽约,1963 年。

多少共同之处。但是贫困问题并不因此就不存在，它恰好提醒那些素来易忘记它的人，经济增长或技术进步不是达到社会稳定和建立真正人道主义关系的灵丹妙药。劳动能够创造数量日益增加的财富，使得造成上世纪被人们称为社会问题的依据发生变化。现在更重要蹬是提高生产率，而不是改变对现有财富的分配方法。然而，一味的经济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技术进步都不能担保会带来公正的秩序，更谈不上保证出现符合人类所向往的生活条件，人类为此而改造世界，甚于对自身的改造。

许多读者从《十八讲》中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按人们通常理解的含义讲，这个结论或者由于它极平凡而被认为是明摆的事实，或者被看做是错误的。显而易见，一切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都呈现相似的特征，一本苏联杂志竭力对我进行的辱骂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的真相；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我力求明确指出苏联式经济和西方式经济间对立的真实本质。在双方的科学和生产技术都相同的情况下，在两种经济模式或增长模式之间，在两种类型的工业社会之间作比较是合情合理的，为了得出这个推断，无需成为像莫斯科的批评家们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说这两种制度具有相似性并不意味着——那些在苏联《文学报》上反驳我的人可以放心——能够贬低两者的区别。即使比政治制度差异更小的经济制度，其区别也足以使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进行斗争"。斯大林的经济制度和赫鲁晓夫的经济制度都不允许我们要捍卫的政治自由存在。

但愿有一天，这些差异会缩小，两个世界将不仅像今天一样意识到它们的共同利益是不互相摧毁，而且意识到它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我热切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只要和平共处即理智地拒绝热核战争，尚未变成思想意识共处，也就是说，尚

未承认对方的存在权利，尚未停止宣称自己掌握着惟一和绝对的真理，只要论战的目的仅仅是在于使用什么最有效的方法以清除所有不赞同越来越过时思想的人，那么，对于制度进行的比较社会学研究将依然是学院式的习作，而不是历史性的对话。但是学院式习作有时已为历史性对话做了准备，也许正在热闹的宣传声中悄悄地成为历史性对话的真正组成部分。

1963 年 8 月于布拉奈

目 录

阶 级 斗 争

——工业社会新讲

第一讲

回顾与展望

今年我打算给你们讲的课是一个整体中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在去年讲了。今天我想先带你们回忆一下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内容，然后再说明今年课程的主题。

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是托克维尔的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同时提出的问题。前者观察到了一种向民主的演进过程，如同是上帝的意志，几乎不可抗拒，民主这个词的含义是社会地位的差异逐渐消失和生活状况趋向于拉平。马克思的观点既有相似之处，又迥然不同。他在十九世纪初观察到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但是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这种增长必然会导致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一个世纪以后，人们不能只满足于继续探讨马克思的问题，一个简单的理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种惟一的发展经验，而是两种：西方世界的即美国和西欧的经验，以及人们不加区分地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苏联式（我把这几个词视为同义词；它们简单地指我们能够在欧洲的另一边看到的发展模式）制度的经验。从此，中心问题就变成，在这一种制度或那一种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在什么程度上会诱发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疑问不是由带政治色彩的内心思索引发出来的，因为当今共产主义的官方理论家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对

近来发生的某些事件[1]做解释时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阶级斗争有可能尖锐化。

所以，去年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者在苏联式制度下，生产力是怎样发展的？既然两种经验可能很接近，那么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同一类事物的两种形态。这样就使我们创造出**工业社会**这个关键性概念。在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之前，应该先分析两者的共同特征。在一个工业社会里，人数日益增多的劳动力被工厂或服务部门雇用。这是最简单的、最直接可见的现象。但是对这个表面特征需要提供其他详尽的说明。确实，为了使农业活动向工业转移，农业总产量不仅必须足以养活农民自己，而且还要养活城市居民。如果说人数稳定或日益减少的农业劳动者有能力不仅为他们自己，同时也为越来越多的城里人生产出足够的食品，那就是说单位劳动力的产量提高了。由此得知，只有在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提高的前提下，一个社会才能成为工业社会。由此出现现代社会的第二个新特点，即对劳动生产率的关注。从前，每一代人都认为过着同前辈们一样的生活是正常的事；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人人都想更多地占有并更好地生活，这种愿望才被看做是正常的。因此我们毫不费力地得出第三个特征：技术的不断进步是惟一的途径，实际上表达了人们要创造越来越廉价产品的愿望。

如果我们接受工业社会的这个基本定义，我们就会发现，理论家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众多责难同样也完全针对另一种制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资本的积累。今天我们肯定无疑地说，这是所有工业社会的一个特征，如果这类

---

[1] 做这一讲时正值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不久。

社会一心关注创造更多产品,就不得不日益扩大资本投入量,增加机器设备。马克思以同样的方式得出结论,工人受剥削是因为他们没有以工资的形式获取他们的劳动创造出的全部价值。但是无论是什么制度,显而易见都必须这样做,一部分创造出来的价值必须再投入,或者是为了更新作为现有资本的机器,或者是为了扩大资本投入;还有一部分应该用来支付社会的领导阶层或社会的行政费用。在两种制度下,对工人的“剥削”并不是采取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用于投资的价值通过生产资料占有者的个人收入转手;而在苏联式制度中,则是通过国库转手。在两个社会中,某些个人是特权者,即他们获得的收入比处在低层等级的劳动者的收入高得多。资本积累现象或“剥削”现象是两类工业社会所共有的,并非仅为一类社会的特征,而另一类则不然。

西蒙娜·韦伊[①]谴责现代工业使工人被迫受制于某种绝对需要,不惜任何代价生产成本更低的产品,以至生活在非人道的境况中。哲学家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把关注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目的在现代企业组织中占压倒地位,这是否恰当;人们可以辩解说,宁可允许降低一些生活水平,以控制劳动者的必要劳动强度。(我认为大体上说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因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久而久之,人的劳动强度就能够减轻。)不管怎样,如果我们仅满足于粗略地观察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两种工业社会,我们所看到的还是从双方都能找出的共同特征。

最后我要指出的一点是,如果说现代社会的实质是把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作为首要关注的事,那么在马克思眼里作为资本主义重大特征的工厂所有制性质虽然没有完全失去其重要意

① 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 1909—1943),法国哲学家、作家。——译注

义，但是也不再具有与以往同样的作用。去年我曾试图指出，变成公有制的工业与仍然维持私有制的工业是何其相似。人们称为铁幕的这种东西的这一侧和另一侧，大量工厂极为相像，而且不可能不相像，因为它们都采用或者希望采用同样的生产技术和服从于同样的绝对需要。

这不是说两种工业社会间的差别无足轻重。去年我力图利用两种对比方式指出它们的差异，即两种**发展模式**的对比以及两种**社会类型**的对比。

下面是第一种对比：如果我们把美国经济发展的某一个时期发生的事同苏联相应时期发生的事进行比较，我们看到既有相似又有差异。最重要的相同之处在于农业部门或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的现象，以及农业特别是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但是苏联式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在西方从未见到过的特有现象：首先，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与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类似的时期中，人们在美国和日本观察到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同步增长；伴随着产品数量增加，人们的实际购买力提高。苏联的情况则是（且不说东欧的其他国家），重工业的发展比西方经济发展任何一个可类比时期都更为迅速；相反，农业生产的增长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却更为缓慢。关于这些特征，我没有打算以惟一的因素给予确定无疑的解释。我提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苏联的发展模式是计划经济**失败**的结果，还是计划制订者的**意愿**所造成的。产生这个疑问有充分根据，理由如下：在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所取得的成果之间存在的这种巨大差距，并不包含在领导者正式确定的目标中。人们可以随意猜想到，失调是农业成就落后于预定目标造成的后果。我力图指出如何解释这种差距：苏联的计划制订者们陷入了恶性循环。由于他们想快速发

展工业，他们便不得不在农村提取数量可观的收获成果。为此，他们必须采纳集体所有制。结果是农民长期以一种怠工的方式来回敬令他们憎恶的制度，他们对生产漠不关心的态度最终导致很差的农业收成。对发展模式之间的比较，不管人们给予怎样的解释，它是人们观察到的眼前事实。

相反，我去年做的第二种对比更多地涉及未来，而非当前。我确实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随着苏联经济的发展，它的上述特征是趋向于更加突出，还是相反地更加减弱。直到目前为止，在苏联实施的那种计划经济制度主要是把可支配的财富都集中到重工业（以人民群众不得不承受暂时的或永久的牺牲为代价），在各种产品的价格间确立的关系更符合于领导阶层的政治意向，而不是产品的成本差异。

我曾经大胆地做出相对乐观的假设：苏联的制度将会朝着向西方经济靠拢的方向发展从而得以改变。主要的论据是专制的计划经济会随着经济的逐渐发展而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文人们想像，计划是一种治愈市场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这想法颇具诱惑力；事实上，严格地实施一个计划，意味着一小部分人在办公室里便能够做出有关分配国家财富和最合理地在每个部门甚至每个企业中利用这些财富的一切决定。这种全盘计划经济覆盖到一个国家的全体生产者，即使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它也超出了管理能力。事实上，经济越发展，它就变得越复杂，越会出现分散决策权力的趋向，这正是当今在铁幕的另一边很重视的一种变化趋势。在苏联或东欧的杂志中，在大众杂志或技术杂志中，用过分集中来解释失败或困难，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抽象的研究启示我，随着经济发展，人们非常可能更多地求助于价格机制。每个人都挣一定数量的钱，人们将依据消费者以这样或那样利用工资的方式，来生产或多或少的不同商品。一旦苏

联的制度走出直到现在还存在的极端匮乏的困境，它几乎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大众的喜好，计划制订者将必须根据需求来分配生产资料。我要补充的是，我大胆做出这些预测是有多种保留的。我要明确说明，这里指的是一种纯属经济的远景；然而苏联的计划制订者虽以经济至上的名义，却总是用政治性措词来思考他们的问题[①]。

去年进行的这些分析得出的结论同今天在铁幕两边仍然时行的思想体系相去甚远。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会向社会主义演进；这种对历史的想像是简单化的，从现在来看，具有不合常理的特点，因为这样的演变没有例子，一个都没有，事实上，反方向的演变即使没有观察到，至少在某些方面可想像到。（不言而喻，在这里我用社会主义这个词，其含义指“苏联式制度”）。确实，我们能够注意到西方经济的某种“社会化”。社会化包含多种意义：国家越来越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它按照某些社会因素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把有些工业部门国有化；但是这些措施是在西方框架内部实施的，它们不会导致全盘计划经济，更不要说会导致与苏联式制度相类似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把苏联式制度视为**西方经济的未来**看来是很荒唐的；**更不是西方经济的过去**。苏联式制度直至目前代表着一种为解决某些相同问题的不同方法。然而，我要再次强调，认为苏联式经济必然会接近社会化的西方经济，认为我们将走向调和，以至使人们发现意识形态的冲突是一种错觉，这些看法都过

---

① 彼得·怀尔斯正是使人们观察到，计划制订者们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分配额外的生活资料，而不是把日益增加的收入分配给个人，由他们随意支配使用。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似乎考虑到了这种类型的制度。个人仅对他们收入的一半拥有自由支配权，另一半将通过行政手段以福利的形式进行分配。西方借助社会保险采取了一种由国家决定消费的过时的形式。

于乐观 至少有两条理由使我们应该避免这种必然的错觉:第一条是,有史以来,人类既为错误思想也为正确思想而争斗,既为假想之事也为现实之事而交战;即使当两种经济制度十分相似的时候,他们也可能继续互相辱骂,或者甚至更糟。第二条是,苏联的实践是,以一种致富思想为名,使当代人的福利刻板地依赖于集体的力量(没有比这更具有逻辑上的矛盾)。然而这样的政策可能保持很长时间。我想仅提醒你们去年我提供的一个数字:今天正在实施的五年计划预定要把钢产量提高到超过英国钢铁工业目前的产量[1]。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两种制度之间的惊人对比,一种制度将叫做资本主义,它服从于选民的决定和消费者的全民投票,将以福利(相对而言,但是毕竟是福利)为目标,另一种制度叫做社会主义,它根据某些政治目标,将优先发展可动员来为战争服务的经济实力。这种对比的加剧将会导致政治的和心理的后果,对此我不能加以发挥,但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想像。

现在我来谈我们今年的课程将要讨论的主题。我们要对两种社会进行分析。去年的课程主要涉及经济,仅仅是一种方法。我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家,你们也不是攻读政治经济学的大学生。你们和我本人感兴趣的恰恰是社会分析,但是如果不首先弄清各种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分析也不可能完成好。

我们以分析两种模式开始,它们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社会的平等,以及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发现第一种观点在一个重要问题上是正确的,即旧制度时期所

---

① 此外,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根据1956年制订的五年计划,预计1960年的钢产量应该是6830万吨,实际仅为6530万吨。况且,1956—1960年的计划在1957年被放弃了,代之以一个1959—1965年的七年计划。

指的等级或等第区分确实已经消失或者正在迅速消亡。从一定意义上说,所有工业社会都是人民的社会,平等的社会;从各自的思想体系上说也是如此:在美国,人们依靠普通百姓,在苏联是依靠无产阶级,在法国是依靠人民。各自在口头上都承认一切权力来自普通人,即使普通人没有感觉到对民族命运的发展施加了什么影响。大家都有选举权,哪怕毫无用处。惟有一些"落后于时代"的知识分子,亦即十足的"反动分子"才设想不给予普选的权利。我们都是公民、劳动者、无产者或普通百姓,尽管如此,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自然还是存在的,无论在收入、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影响、参与政权各方面。由此产生我们在课程的前几讲中将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可以说,工业社会显示出两种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特征:它们宣称所有公民是平等的,同时它们又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形成等级;我故意用咄咄逼人的口气提出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它是事实。在政治上或形式上的平等和社会地位不平等之间形成的这个矛盾是马克思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仍然看得见这个矛盾。

在整个课程的前一部分中,我们要探讨全社会如法国、美国、苏联内部的各个集团是怎样组成和怎样区分的;职业、收入、权势是怎样分配的;各集团在什么程度上意识到自己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并同全社会集体相对立的整体;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说存在着社会阶级,如果说属于同一个社会并互相冲突的集团被定义为社会阶级的话。我们要探讨社会学词汇中使用得最频繁、定义最不清楚的词,即阶级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可以在哪些不同含义上使用它,在各种工业社会中,这个词在什么范围内是与现实相符的。

但是对社会集团的分析将只是研究的第一部分,是最基础

的部分。事实上，我还要研究其他一些现象，它们与前述现象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我称之为**少数领导者**。在任何社会里，行使权力的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为人民而进行管理，直到目前，从来都没有过由人民进行管理的事。有必要提一下，美国的国家思想体系是人民管理、为人民管理和由人民管理，但是社会学家的固有特征是无视传统观念，他们把思想和现实进行对照；也许在大部分古代的小社会里就已经存在指挥者和服从者之间的分化。因此我们要探讨在工业社会中什么类别的人在行使领导职务。

我将要立即阐明作为我们分析对象的某几个特征。国家越来越世俗化，而且不再由一种超验的信仰加以神圣化。掌握政权的人不再要通过神授或者成为某教会的代言人，他们从理论上说是**普通百姓**、无产阶级或人民的委派者或代表。由此导致惊人和严重的后果。人们可以在多种思想体系的竞争和仅仅一种思想体系的专制两者间做出选择。国家不再是神圣的，与此同时，一小部分人发号施令。从此，两者必具其一：或者任凭被统治者表示他们对统治者是不满意的（这是前者自然的思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合理合法的冲突，如同在集体生活中永远都会产生的现象一样。或者国家宣称一种思想体系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论战在表面上看被消除了，但这是一种人为的消除，因为一种想要如实描绘世界本来面目的、纯粹内在的学说，是不可能像传统的信仰那样被同样的神圣光晕所环绕。工业社会中互相矛盾的权力原则之间是存在冲突的，它们或许会被人为的因素，如纯粹的专制统治或某种国家信条所遏制。

这样的社会呈现出另一个特点：非特权者被组织起来，他们有领导者。以往的奴隶和穷人很少拥有永久的首领。今天，劳

动者，即那些获取最低工资的人可以组织起来，让别人听到他们请愿的呼声。

我想，我们将可以根据如下这些基本的因素来为工业社会的类型下定义：存在还是不存在思想体系的斗争？容许还是不容许在群众的领袖或非特权者的代言人同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之间存在对立？

因此我们的分析将针对两种区分：一种是因职业、收入、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而存在于社会集团之间的差别，而另一种是少数领导者之间的竞争，分歧的要害在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对国家政权的参与，或许还有对国家的改革。工业社会是动荡不安的，它们不容许精神上的统一性、无争议的权威，我们想像（也许是错的）在历史上的集体中存在过这种权威。

这样，我们就要谈到课程的第二方面问题。去年我是想阐明两种工业社会经济制度间形成的对比。今年我力图阐述铁幕两边的社会结构差异以及少数领导者之间关系方面存在的差异。同时，我将尽力把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纳入这项比较研究中。

最后，我将接触到这一项研究的目标，即使算不上是主题，那就是阶级斗争。我希望避免以老板们的口吻发表有关阶级必然合作的论调，同时避免采取有关阶级间殊死斗争的有利性和必然性的思想方式或伪思想方式。前者等于忘记了在对集体财富进行分配方面存在着合理合法和不可避免的竞争，此外，争论或冲突也许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肯定是合理和合法的，其关键在于如何最完美地组织社会。有什么权利禁止站在对立面的人对究竟是改变立场还是改革社会的可能性进行思考？这些争议属于工业社会正常发展的趋势。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人们应该接受救世主式的论调，说阶级斗争不仅合理和必须，而且是天

意,它具有神奇的效用,能在一定的历史时刻最终结束剥削和不公正现象。马克思本人确实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我给你们引述一下:他对早在他之前就已有的阶级斗争理论补充了他的思想,即这种斗争经过某一场革命后会趋向于自行克制和自行消失。这种救世主降临说正是我们不应该接受的,也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有理由加以拒绝的。我们观察到的社会集团间的竞争越是合理和必然,我们就越没有理由认为在某一时刻竞争会毫无目的。工业社会对苦行主义不感兴趣,它们在本质上是享乐主义的,对财富的欲望,也许还有对权势和荣耀的欲望激励着它们。既然人们不承认刻苦所固有的长处,为什么公民们不会去为更公平或更有利地分配集体财富而争论呢?经过某一场革命,对抗就会消逝的想法,其根源是两种思想或两种幻想,第一种是,阶级斗争的关键原因是所有制性质,第二种是,通过改变所有制性质,社会将会奇迹般地一致化。去年我们看到,所有制形式在农业、商业和某些工业部门中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事关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业生产资料时,在法律上企业性质的改变仍会使组织结构方面和工资方面的等级关系完整地保存下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只要从法律上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就足以结束企业内在的紧张关系。也没有理由认为,一旦全部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以前竞争的焦点问题都会销声匿迹。

总之,有多种多样的方法阻止冲突显露,很多世纪以来我们熟知这些方法。专制统治下的太平也许很好,但肯定不是什么创新。人们不用等到现代才发现达到表面统一的秘密。

第二讲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

我今天将要开始讲的内容是课程中有关分析工业社会里社会阶级的部分，但在进行经验性的研究前，我在这一讲和下一讲中要谈谈对词汇或者对学说提出质疑的理论问题。

你们知道，阶级的概念充满感情色彩，并且模棱两可。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做到没有偏见是不可信的。所以我将不打算这样做，为了使我们之间不存在误解，我事先假定你们不认为我抱有不可告人的打算。如果能够消除听你讲话的人心中存有的猜疑，那么就能够尝试去消除模棱两可的问题。与阶级的概念相关联的模棱两可方面是多种多样的，因为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它在马克思的任何著作中都没有成为系统论述的对象。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很独特的情况，一个学说中最重要的概念却相对地不确定。在这一讲里，我尽力向你们解释模棱两可的含义以及为什么马克思本人不想把它们排除掉。

马克思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他也是一位政治家和预言家。然而，模棱两可的含义远远没有限制一个学说的成功，反而发挥了有利作用。概念本身越是不确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越是容易传播。这一讲要涉及的两个部分是模棱两可问题和关于阶级的学说，两者看似对立，实则互补。

为了向你们指出模棱两可之处，我将使用最简便的方法，我给你们念几段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第一段引自《共产党宣言》。下面是最开始几行：

>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①]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在这部著作中，阶级这个词适合于任何社会中按等级划分的社会集团。阶级的对立差不多等同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在概念中几乎没有别的内容，只有阶级的等级概念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加压迫的概念。

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阶级这个词被限定于**现代工业社会内部**以等级划分的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这里涉及的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定义问题，也就是一个可以随意选择的问题。人们可以对阶级这个词下定义，使之适合于任何社会中按等级划分的集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应该阐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阶级的特点是什么。这正是马克思在另一部同样是

① 在马克思的原著中此处应分段，本书未分。——译注

经典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中。

> 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

这一段文章被某些评论家解释成如下的意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级下定义是根据他们收入的来源（工资、利润、地租），因此，社会的阶级是在分配或分摊的环节中诞生的。我认为这种解释不确切。马克思的看法正相反，社会阶级诞生于生产的组织。确实如此，三种收入被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所限定：工资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拥有的收入，利润给予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从而有可能剥削被雇用的劳动者，而地租是被自己不种地的土地所有者装入腰包的。如果这种解释确切的话，社会阶级就诞生于生产资料和生产人员之间的关系，本质现象就会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

现在我给你们引用第三个同样有名的段落，出自马克思就拿破仑三世政变而写的历史评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1]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

[1] 本书作者在此处省略了马克思原著中的一段，但未加删节号。——译注

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

这是马克思最明确最引人注目的文章段落之一：要有社会阶级的出现，不仅应该有数量众多的一群人以近乎相同的方式生活和从事类似的工作，他们互相之间还应该有永久的关系，发现他们既具有共同性又与其他集团相对立，从而构成一个整体。不仅仅是几百万个人具有共同特征，而且是所有这些个人都意识到他们组成了利益一致的整体，并与其他成百万同样组成集团的个人相对立，这时才称得上是阶级。

按照这个分析思路，产业工人如果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一致利益以及与其他集团的对立，他们互相之间将会竞争。确实，当他们中的一些小集团没有共同意识到他们的一致性和与其他集团的对抗性，他们在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上是互相竞争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阶级不仅要求人们在生活方式上具有事实上的共同性，还要求个人相互之间存在几乎永久的关系，尤其要求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共同性，而且如果意识不到与其他集团存在某种对抗，共同性也是不可设想的。由此得出马克思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时才真正存在，但倘若不承认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有阶级意识。一个阶级只有当它发现它要对其他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它才具有自我意识。

从这些著作看，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分析了不同的社会，他几乎在所有地方找到了同样的社会阶级。事实上，在不同的著作和不同的历史研究中，他所列举的社会阶级是不一样的。例如，在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本书中，马克思的划分

是：一，封建贵族；二，资产阶级；三，小资产阶级；四，富农和中农；五，小自由农；六，农奴；七，农业工人；八，工业工人。在另一本书《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列举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它们包括如下各个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这个德文词指无产阶级中愚昧粗鲁的最低阶层。

在我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你们引用的阶级定义与上述各种各样的罗列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不同情况下有不同阶级的现象是有可能产生的，但是列举的任意性往往使人们难以知道某一个阶级何时诞生和何时消亡；譬如，按照马克思的著作，不能严格地讲清，是农民共同构成了一个阶级，还是更恰当地说贫农与中农同富农是对立的。人们视不同情况偏向于这一种或另一种解释。再一次强调这里没有矛盾；我想说明的全部意思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严格地确定工业社会的阶级在与前工业社会的阶级相比时有什么特征，没有罗列出工业社会所特有的阶级。

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把某个集团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或所起的作用作为确定社会阶级的标准。例如列宁宣称，所谓阶级就是互有区别的人类大集团，其区分表现于它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历史制度中的地位、最通常由法律确定的它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它们在社会组织中的作用、它们由此获取一部分财富的能力以及这部分财富的多少。另一马克思主义者布哈林更为简单地把参与生产过程的一个集体定为一个阶级。因此简而言之，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是一个大集团，由其在生产制度中的地位确定其特征，特别是它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确定了这种地位本身。可惜的是，这个概念模棱两可。

的确，概念明显地包含两种可能的意义。雇用劳动者不拥有生产资料，并领取工资，在这个限定范围内，他们在生产过程

中担当着一个确定的角色。因而他们的角色是从法律-社会的含义上来定义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着眼于这个概念的技术含义：不管产业工人的财产地位如何，他们担当着一个确定的角色，即他们是体力劳动者，在机器上从事劳动。法律-社会含义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相连，技术含义同生产的组织相连。如果你们取第一种定义，你们可能会想像一场结束雇用劳动者状况的革命；相反，如果你们取第二种定义，很显然，任何法律意义上的革命都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职位。生产资料变成国家所有可以改变工人同生产资料的法律关系，但改变不了工人同劳动的集体组织在技术上的关系。如果你们宣布：无产阶级由于他们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劳动而被定义为无产阶级，那么只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可从定义上理解为自动地消灭无产阶级。这个时刻，自然只剩下继续在工厂劳动的工人，但既然他们不为私有制而劳动，那么从定义上理解，你们已经把你们所称的无产阶级消灭了。

事实上，什么是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阶级？它们同前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阶级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没有引起马克思极大的兴趣。他当时对今天的社会学家们所提出的问题也没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这个问题就是在客观现象和主观现象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即相似的生活条件和利益一致的阶级意识之间存在什么关系。首先引起他关注的是某种历史哲学，某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

马克思的思想和他的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被观察到的事，即在他的思想和哲学所属的社会中，形成一个他称为无产阶级的新阶级，这就是产业工人，在他看来，他们既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又是对资本主义的表述。之所以说是否定，是因为资

本主义社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之所以说是表述，是因为被剥夺了一切的工人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原则的同时，揭示了这个社会中现实的本质。我似乎在玩弄词藻，不过我只是满足于再现确切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因为它体现了、可以说表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说揭露了这个社会，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力图自我呈现的形象相对立的形象。

马克思在发现以无产阶级的身分出现的工人阶级之后，坚信阶级关系趋向于简单化，久而久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将存在两个阶级，而且只有两个。在它们各自周围将集中所有的社会集团。让我们再统一一下看法：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只有两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甚至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社会集体的所有成员或者聚集在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周围，或者聚集在无产阶级周围，但是他相信经济社会的发展确实会使社会集中为两个阶级，而且只有两个。

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可能会主动地使生产资料积聚在一小部分人手中；资本家会越来越少，他们每个人拥有的财富将会日益增加。同时，在另一个极端出现的将是贫困的积聚。马克思认为，伴随资本集中的是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或绝对下降，或相对下降。产业工人将越来越贫穷，无论如何将会越来越具有反叛精神。

我们曾讨论过，马克思是否相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出现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即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通常，像他这样一位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从事大量创作的作者，其

著作有可能时而肯定①、时而否定绝对贫困化的理论。再说，在今天的政治论战之外，这个观点的重要性只能是有限的。这种历史想像的实质内容是，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的命运将严重恶化，即便工人的收入有所增加。无产阶级状况的恶化将归因于工厂劳动的组织本身，以及生产资料拥有者为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而做的努力。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同时也与它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境遇而不进行反抗有关联。我们现在回到我刚才给你们指出的那个见解：工人阶级的意识本能上具有战斗性，无产阶级在发现自己的同时也发现了它的敌人。因而对最终只存在两个营垒的事实得出一个新的解释。最后集中成两个营垒的原因归根结底不是经济方面的；我们可以想像，工人阶级状况得以改善，却不动摇马克思的基本信念，即这场较量终究要在两个阶级之间展开，而且只有两个阶级。在这里马克思确实引入了**政治**观念。他认为每个社会都由某个阶级的统治确定其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由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统治来确定其性质的，国家是它进行统治加以利用的工具。自此，如果国家的性质决定于资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发现了自身的存在及共同利益，并与资产阶级相对立，那么不可避免会有两个营垒，而且只有两个。惟有两个阶级可能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那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它们两个之间当然存在一些集团，中产阶级或农民阶级，它们可能有众多人数，但是这些中间阶层丝毫改变不了存在两个敌对阶级的重要事实，因为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观念，资产阶级的目的是维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无产阶级的固有利益是推翻建立在这种所有制

① 事实上，马克思常常主张绝对贫困化的论断，但是这个论断与《资本论》中的某些分析是不协调的。

基础上的制度。

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推翻这个制度呢？马克思的回答在《资本论》中可找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中，剩余价值是被资本家据为己有的，因而工人作为雇用劳动者是被剥削的。由此，如果它意识到自己的状况，它不可能不以斗争的愿望予以回答。因此，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结论是号召起来战斗，如果我们接受下面推论的各个阶段，他的分析就是合乎逻辑的：任何社会都存在阶级对抗；在一个对抗的社会中，有一个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是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是被剥削的，它不可能不认识到它的根本利益在于推翻现存社会，也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惟一可能有愿望进行彻底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沦落到非人道的境遇中，从它发现自己的处境之时起，它同时发现只有通过拯救社会的全体成员才能拯救自己。

大体上这就是马克思致力的历史哲学。不言而喻，在这样一个范围内，阶级定义的细节就成为次要的了。重要的是，懂得阶级的对抗性、斗争的必然性，以及组织这场斗争。然而为了达到目的，必须创建一个政党，它将成为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言人。由此，人们就从对阶级的社会学分析过渡到一种革命斗争的政治理论。这种范围内的哲学显然具有迷惑力，因为它把分析现实与号召斗争相结合。如果人们接受这种哲学的某些指导思想，结果是不可抗拒的。事实上，为了抓住其模棱两可之处，只要取被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像让-保罗·萨特那样的准马克思主义者们广泛引用的一句名言即可，那就是："无产阶级要么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我请求你们允许我向你们明确指出人们对这样一个判断可能给予的不同解释。它包含

三种可能的含义。首先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定义，那么其意思是：如果产业工人是革命的，我就可以把他们称为无产阶级；如果他们是不革命的，我将不称他们是无产者。他们的命运将不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但是哲学家将会说：如果没有革命的意识，就没有无产阶级。这还是一个定义问题，我们就不去讨论它了。

这句名言可能具有描述性的意义：每当产业工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确定的社会集团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不是革命的。这是一个未被证实的判断，它引人注目，可惜是错误的；有各种各样的例子说明，一些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然而并不想进行革命。他们希望改革，这是正常的，他们或许比我们更想改革，因为他们处在反对派一边。英国工人组织成工会，绝大多数投工党的票，他们通常意识到自己属于工人阶级，但是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意愿，即一种彻底革命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意愿。

"无产阶级要么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这句名言的第三种可能的含义，我把它称为召唤性的：如果工人阶级不是革命的，它就配不上无产阶级这个崇高的称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暗示它如果它不革命，它将失去一个光荣的称号。它仅仅叫做工人阶级。这一切从战斗部署上看都是合理的，但却不能显著地改变现实；这是一种道德判断。

在三种含义中，哪个最切合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呢？马克思擅长当预言家，社会学则是他的弱项，这就使人们可能以这些含义中任何一个来解释这句名言。作为辩证学家的马克思认为三种说法都同样正确：意识到自身的工人阶级是倾向于革命的；如果它不革命，它就不配被称做无产阶级，因为它如果不革命，它就没有意识到要进行斗争，就是说它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最后，号召工人起来革命是适合的，因为历史的进程就是如此，工

人阶级将根本改变社会生活的组织。

在有关社会阶级的这种哲学中，有我们将要在今年课程中讨论的**未被证实的判断**，还有我马上就要排除的**哲学上的判断**。下面是未被证实的判断：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级关系会简单化。在他看来，工人阶级的物质和精神贫困趋于恶化，由于这种恶化，工人变得越来越革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处在有利的条件下，看一看各种各样社会中的现实是有益的：有众多千差万别甚至矛盾的事实足以使大家从中找到有利于己的事例。问题不在于哲学争辩，而在于了解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整个推理的关键在于，肯定在一切社会中有一个统治阶级，而国家除了是这个阶级借以行使权力的工具外不再有任何作用。最后，无产阶级是惟一有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成为统治阶级的阶级。然而在这里，我们掉入了神话中，如果是讲授某派哲学，那是有益的，但从经验的角度看，把资产阶级这个特权阶级同无产阶级这个非特权阶级混为一谈那是绝对不予考虑的。无产阶级是由几百万工人组成的，就其确定的特征而言，它永远不是一个统治阶级，并且不行使权力。不排除少数人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或**作为其代表**行使权力的情况。一个与某一社会阶级相关联的政党行使权力是可能的。在一个苏联式的制度中，你们可能说，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或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行使权力：这是一些会引起争议的未被证实的判断。你们不可能说是无产阶级在行使权力，如同你们不可能说一个圆圈是方的一样。几百万工人继续在工厂劳动，行使权力的是官员，是少数政治家，他们的位置离工厂中的工人很远。如同人民在民主体制中不进行统治一样，无产阶级在苏联式体制中也不进行统治。权力就其实质而言是由一小部分人行使的；在任

何一个已知的社会里，大部分人是不自己行使权力的。我不去预断自称是无产阶级制度的道德或政治性质，我只是看到无产阶级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制度，而是掌握国家的人宣称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制度，哪怕无产者本人与他们的统治者之间有着不同的思想。

一旦你们消除了把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神话般地混为一谈的说法，就变得更加难以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马克思所表达的革命利益的明显性建立在他的信念基础上，他深信工人阶级在发现他们的处境同时，也发现他们是被剥削的，因此懂得他们的利益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以便消灭他们在其中受剥削的制度，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自己掌握政权的另一种制度。但是，通过一次革命，除了那些将变成政委的人，产业工人仍然是工人，依赖于他们的制度将对他们只有好处并不是明摆的事实。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明显性一方面以剥削的概念为根据，去年我已经向你们指出概念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以对未来制度与无产阶级政权的等同为根据。如果你们消除了把大量工人和少量掌权者神话般地混为一谈的说法，你们就回到了历史现实中：你们思索一下什么是不同类型制度的利弊和功过。

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辩证法，根据这种方法，必然性和价值观、科学和行动奇迹般地相协调。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必然进程就是创造条件，即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并建立一个人道制度以取代我们今天看到的剥削制度的条件。他认为对历史进程的科学分析会自动地导向采取行动，因为当人们意识到矛盾和克服矛盾的方法时，就不可能不参加革命政党，而这个政党命中注定是人类道德意志的执行者。如果我们真正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历史自动地走向我们大家都公认的最美好制度，那

就没有必要犹豫；除了那些受制于私人利益或眼前利益的人，大家都会加入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既掌握历史必然又怀抱人类理想的政党。至于我，我没有那么乐观，观察现实和分析历史必要条件没有使我无可置疑地走向某种斗争的学说。我属于政治理论家派别，他们认为人们在好与坏之间是不需要作选择的，而是要在不同程度的坏之间或者在不同程度的好之间作选择；我属于人们称为悲观主义者的行列，再说这么称呼是错误的，因为我这种类型的悲观主义者始终希望逐步逐步地改善社会。只是他们不懂得一揽子解决办法。（那些对一种不可能存在的制度深信不疑的人被认为是乐观主义者。）

一旦我们排除了这些混淆或这些神话般的说法，我们就回到有关阶级的社会问题中，这是下一讲将要研究的内容。我们将重提马克思曾经提出而且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怎样划分古代社会的阶级以及现代工业社会的阶级？什么是社会集团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怎样结合在一起？社会阶级怎样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变化？但同时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将摆在我们面前：对现实可能给予马克思上述问题的回答加以考察

马克思在晚年曾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了下面一段话：

>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

社会的过渡。

因此马克思认为他对阶级理论的决定性贡献在于,发现了社会阶级与一定的历史阶段有联系,发现了阶级斗争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发现了无阶级的社会将会来临。

被马克思视作自己对阶级理论主要贡献的上述三个判断,正是我今天给你们概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内容的主要部分。

第三讲

阶级的两个定义

上一讲我力图为你们解释马克思有关阶级的学说怎样具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实际的，几乎是经验性的，他把社会阶级确定为一个整体，其特征决定于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个地位同时被它所担当的技术上的角色和它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所限定；此外，这个社会集体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发现相对于其他集体的一致利益。这个定义对马克思主义者以外的其他一些人来说是可接受的，虽然有所保留。构成马克思学说独特性的是其第二个方面，即以阶级概念为中心内容的历史哲学，根据这种哲学，一切社会的特性由其领导阶级所决定，它掌握生产资料，统治和剥削其他人。在这两个方面之间，对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一种解释构成中间环节。实际上，如果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不同社会集团趋向于汇聚在两个主要阶级周围，那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成为最基本的问题，一切便归结为在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作出选择。

我今天想把历史哲学完全搁在一边，再从阶级的社会学定义出发，你们可以在致力于阐述这个主题的所有书中找到种种定义，我无意加入我自己的定义。对此我建议你们读一读譬如

我的同事居尔维什[1]先生关于社会阶级概念所出版的课本,你们将看到他列举并分析了人们提出的不同定义。我的确认为任何新的定义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模棱两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对概念的定义中确定什么是由于习惯而产生的结果,因而不会引起争议,此外什么是体现与现实相关的断言,从而有可能引起争论、需要论证或者遭到驳斥。我的目的是在与社会阶级有关的辩论中区分两类问题,一类是词汇问题,它不属于正确或错误的范围,而是属于合适或较不合适、恰当或较不恰当的范围,另一类是真正的问题,它由不同的理论家从这种或那种意义上加以解决的,或者它关系到事实,因而应该存在正确或错误之分。

为了尝试这种有相当难度的区分,我将从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出发,这也是我在上一讲中已经暗示过的问题:社会阶级是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还是在任何已知社会中都存在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在有史以来人们可以查证的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熊彼特[2]也持相同观点;其他一些如居尔维什先生那样的社会学家则认为,只有在经济活动占主导地位、工业化逐渐改变全部生存方式的现代社会中才有社会阶级。我想在这两种理论中看一看哪些属于词汇范畴和哪些属于事实范畴。社会学家在词汇方面的对立表现在哪里?他们对一般社会和我们这个特定社会的理解方法上的分歧表现在哪里?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念,所有社会都分成阶级,因为经济基础始终由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组成,就是说既包括所有制,又包括

---

① 居尔维什(Georges Gurvitch, 1897—1965),法国社会学家,结构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②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奥地利经济学家。——译注

专门的劳动组织。在任何社会中，有一个拥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区分。熊彼特的回答是相同的，但是理由不同。他的基本思想是**任何人类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不均等的**。个人的天赋不同，他们担当的职务或从事的行业不同；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必须有某一种人类的英才或社会的英才占据上等地位。因此到处都有处在最高等级的人，他们领导或统治他人，这些人，或确切地说他们所属的这些家庭并不永久保持原有地位；某些人掉下，另一些人上升。这样的社会流动在所有社会里都可见，因为不均等现象到处可见，这是由不同的个人才能以及在不同时代中保证其晋升和成功的不同本领所决定的。按马克思的看法，从来都存在阶级，因为直至目前，从来都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而熊彼特则认为，事情归因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社会的变幻不定。

否认有史以来社会阶级是永存的人以更明确和更具限定性的方式为阶级下定义。居尔维什先生可能会说，最好区分一下诸如**种姓、等级**和**阶级**之间的差异。这三个概念中的第一个指一个封闭的集团，它的特征表现在其成员从事的行业以及不存在随意进入或从中退出的可能性；现代社会阶级不具有这两个特点。同样，古代法国不同**等级**的成员之间存在本质上的法律不平等：出身贵族的人享受各种特权，他服从的法律与针对平民、资产阶级、农民或手工业者的法律是不同的；个人身分按不同等级而有差别。但是社会阶级既不像种姓一样是封闭的，也不由法律依等级方式加以严格确定；如果你们在为阶级下定义时不区分法律地位，那么显然你们不会在所有社会里发现阶级。**社会阶级是区分各种集团的方式之一，在任何社会里都可见**；这种区分方法在各类社会中呈现各自的特性。如果你们选择一个含糊的定义（譬如，“在全社会内部按等级排列的集团”），你们就

会在所有已知社会中找到阶级。相反，如果你们决定仅考虑现代社会中这些集团所呈现的特点，那么，不会在所有社会中找到社会阶级。

这是不是说争论完完全全是字面上的？设想在词汇问题背后没有掩盖社会学、历史学或哲学问题那就过于简单了。为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发现相同的现象？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已知社会的基础和原则说到底是相同的。至少在马克思主义通常的解释中所包含的意思是，经济基础决定或制约社会；换句话说，经济因素在过去占主导地位，今天仍然如此。当人们认为所有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相同的时候，人们就会把阶级置于所有社会中，以此方式来为它下定义。相反，居尔维什先生所确定的概念提醒人们各种社会的主导因素是不同的，或者说他的概念是以此为前提的。

因此，真正的问题通过以下的疑问表达出来：所有社会的结构原则或组织原则相同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显然会引出另一个问题：社会阶级发展到什么程度便可能在未来的社会中消失？如果你们为阶级下定义时参照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最简单的事莫过于，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可使阶级消亡。相反，如果你们以个人才能的不均等和家庭的兴衰来解释阶级，那么同样明显的是，你们将确认阶级这个现象将永远持续下去。当下我不想更深入地进行分析。我只是要说，我根据自己的需要作选择，在今后的课程中我只考察具有自身特征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集团（除非我特意要谈相反的情况）。

现在让我们参考一下有关社会阶级的限定性定义；我们远没有找到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定义。为了继续同类分析，即为了区分词汇的争议和事实的争议，我将取两种定义，引自两位社会学家，一位是美国人，一位是法国人。下面是第一个，我把它

大致从英文翻译了过来：

> 阶级这个词是指在一个社会内部大体上具有相同地位的人组成的一个整体，一个集合体。阶级制度或社会分层制度是阶级有其内外关系的制度。阶级制度不同于权力制度，权力制度犹如某种关系网，其中的行为受命令和约束的影响。阶级制度不同于所有制，在所有制中，对自然物质的利用以及由此获得的利益是留给那些具有特有身分（拥有所有权）的人的。阶级制度也不同于行业制度。阶级制度是各种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体现在人们给予个人的尊重程度，以及依据他们在权力制度、所有制、行业制度中所处地位而确定的角色和定位。尊重就是与不平等感或自卑感相关联的一种尊敬或敬重行为。从逻辑引申意义上说，不受尊敬或不受敬重的感情、蔑视感或优越感，也都是包括在尊重这个概念之内的。

这段文章强调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依据别人给予他的敬重或尊重程度。同时文章假设，区分权力制度、行业制度和所有制是合理的。最后，它得出每个人的地位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每个人都享有一定地位，视他获得敬重或享有威望的情况而定，这是由他所处的整个环境导致的结果，每个人的环境可从三个视角来分析：所有权、行业、权力。这样的一个定义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们首先要承认，提出这样的疑问没有什么意义；问题在于要知道定义是否可接受，是否符合真正的现实，而定义可以使人把这个现实独立出来或者可以使人给予承认；问题还在于要知道定义所包含的判断是否正确。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些条件。我刚才给你们念的这段文章是否符合真

正的现实？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大体上人们可以说，一个社会的不同个人在他们的同胞眼里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威望以及一种社会身分，这个身分可以被称做社会中的地位，或被称做因威望或敬重程度不同而形成的地位。这个现象也许不容易被识别，因为每个人依据社会其他成员的敬重程度所拥有的地位因社会环境而异，而各种不同行业得到所有人同样重视或同样蔑视并没有被证实过；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人们仍然可以说，这个现象是真实的，即使没有恰当地给予定义。此外，按照人们对行业、金钱或权力的不同看法，享有威望的高低程度也是不同的。你们可以想像出一个十分富有的人却没什么声望（譬如强盗之王），或者某一个人从事的行业本身不拥有显赫的威望——例如小学教员——，但是由于他本人、他自身的品质而受人尊重和钦佩。最后，权力不一定意味着具有很高程度的威望：一位工会书记可能对他众多的同胞拥有真正的权威，但不一定受到社会全体成员的深深敬仰。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同意，所有制、行业和权力方面的关系不能混同于社会尊重所形成的关系。

假如这些判断可接受，那么这个定义也就可接受，也就是说这里说的是真实的现象。你们可以按约定的办法决定把在整个社会内部形成的不同集团称为“社会阶级”，每一个集团包括了所有享有相同威望的人。这种集团怎么被明确界定？人们是否清楚地知道每个人属于哪个集团？这些问题确实被提出来了，但是既然现象是真实的，你们就可以自由地以这种方法为阶级下定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位法国社会学家给予的更复杂的定义：

社会阶级是一些阵容庞大的特殊集团，是其下属次要

集团的大综合体，联合成大综合体的基础在于它们的超功能性、它们把整个社会拒之于外的非渗入性、它们各自之间根本的不相容性，以及因它们压倒一切的集体意识和特有的文化行为而形成的严密的结构。这种集团只出现于技术模式和经济职能尤为突出的整个工业社会中，它们还有下面的特点：这是一些开放的、内部分散的、持久稳定的、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只掌握有条件强制权的、事实上客观存在的集团。

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一个更复杂、更难懂的定义；它堆积了一大串标准，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这是些大家都能接受的，也就是说用来指明现象的标准。**社会阶级是一些事实上客观存在的集团**；的确，人们属于某一个阶级，但未曾明确表示加入。我会很自然地说人们选择了他的足球俱乐部，但不会说选择了他的阶级。说社会阶级是**开放的集团**，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去和同样方便地出来，至少假如他拥有自由出入的必要办法。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一个修会或一个公立学校的；相反，谁都不会被禁止属于某一个阶级。所以，同要求具有特殊条件的集团相比，阶级是开放的集团。阶级的**内部是分散的**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例如它们与汇聚在巴黎大学阶梯教室里的大学生构成的团体是存在差距的：因此你们大家都不得不听我讲课。相反，人们从来没有一眼就看到了整个工人阶级。集团的人数太多，以至所有成员不可能聚集在一起。是**持久稳定的集团**吗？就算是吧！如果我是资产阶级的一员，我就始终是，除非我进入另一个阶级，但假如我进入了另一个阶级，我也就会长久是这个阶级的成员。**是无组织状态的**吗？是的。所有政党都有权力组织、参谋部、党员、章法，以及作为阶级

所缺乏的一切东西，因为如果说政党可以被称做阶级的组织，那么它们两者是不可混同的。**只掌握有条件的强制权**，这个提法的含义是，社会阶级一般不能强制其成员做这做那。军队、警察、国家，或者甚至属于文职的集团都拥有强制的手段。阶级能够对其成员施以压力，但是以有限的或有条件的方式。**特殊集团的大综合体**，这个说法指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整个阶级下面可分成无数小的集团：工人分散在众多企业中，每个企业的工人是隶属于工人阶级大综合体的一个个别部分；或者还可以按工业部门、资格水平来划分阶级下属的不同集团。

超功能性的特点也可以被接受，一旦人们了解了这个词的意思。一个单一功能的集团，举例说一个体育俱乐部，它的目标是单一的：从事一种专门的活动，即体育。人们把地区集团或亲属集团，以及一般来说具有多种目标的集团称为多功能的。民族和阶级被说成是超功能的，因为它们不受一种活动乃至多种活动所限定，它们涵盖全部生存条件。

说到现在，我们谈的一直只是一个可被接受的定义，因为它在于抓住现象中众多容易见到的特点。相反，当我们涉及到诸如**把整个社会拒之于外的非渗入性、各自之间根本的不相容性或严密的结构**这样的提法，就不再是目睹现实足以证实和指明的标准了，而是一些会引起争论的未被证实的判断。上述第一个提法意味着，与其他阶级和整个社会相比，每个社会阶级具有自己特有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定位方式。我不是说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但它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可能适合于某些阶级，而不适合于其他阶级，也可能不是所有阶级都具有特定的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存方式。换句话说，定义中的某些标准属于一种有关社会阶级的**理论**；这些标准在研究前并不存在，而是在研究终了时得出的；它们包含的意思是，各个不同的阶级有自己的结

构、生存方式和意识，每个阶级都是一个意识到自身处境的真实整体。事实显然不是如此，因为理论家们争论的焦点恰恰就在这里。

为了从前述两种分析中得出结论，现在让我们尝试着比较一下这两个定义，一个从**威望所体现的身分**这个角度，另一个从**现实存在的整体**这个角度加以限定，因为它们显示了阶级理论可能遵循的两个方向。美国社会学家强调的是每个人所受到的尊重，认为这种心理社会现象是人们所称的社会阶级的整体所具有的特点。第二个定义强调的不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尊敬或蔑视关系，而是阶级构成集体这个现实以及随之出现的阶级意识。现在我们已经指明了两个方向，什么是关于事实的论战？什么是关于词汇的争论？

两个定义都赞同某些判断。两者都假定在当前社会中存在多种多样的差异。从所有权或与所有权关系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互相间千差万别，表现在他们从事的行业、他们赖以为生的手段、他们的威望所体现的社会地位各个方面。此外，这个和那个定义都不言自明地同意，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极其复杂的，因为社会阶级不是从法律上被确认的。在旧制度时期的社会里，每人都确切地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等第或哪个等级；今天，人们知之甚少，所以社会学家乐此不疲的一个活动是通过民意测验作调查，询问人们想要属于哪个阶级。他们想了解自认为属于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或中上阶层，或资产阶级的居民各占多少比例。不同社会使用的词汇是有差别的，哪怕社会结构很相似。譬如借助这些调查，人们发觉美国人更乐于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法国人则更乐意属于工人阶级。从一个方面说，这个现象同人们使用的词汇有联系，我指的是"威望所体现的地位"；在法国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影响深远

的国家，属于工人阶级往往是一个光荣的标志；在美国这样一个从意识形态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工人阶级这个词不具有相同的荣耀。因此个人给予的回答不是总能反映现实的，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困难。个人自己认为属于哪个阶级，他们的这个看法也是人们希望研究的一部分现实。一方面是个人的真正处境，另一方面是他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将两者区分开来该是简单的事。但是他自己的看法是现实的一部分，是人们要加以研究的内容。从何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某人属于他自己声称不属于的那个集团呢？困难是众所周知的：根本的现实究竟是个人的物质环境还是他自己对此的认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回到我刚才力图引出的两种分析方向或定义方向。

第一种即美国社会学家的趋向是**唯名论的**。阶级制度和阶层制度没有区别。阶级不是一个现实的整体，而是众多个人的集合体。通过各种各样的标准区分个人互相间的差别，社会地位或阶级地位只是各种区别之一，主要由心理现象来确定。每人属于什么阶级决定于其他人怎样看待他所处的环境。每人拥有的地位由他人的敬重来确定。这样一种定义把个人的心理及其可能包含的一切矛盾视作现象的本质。（每个人对其地位的认知不总是与他人的认知相吻合。）

第二种趋向是**现实主义的**。它认为社会阶级是一个现实的整体，既由物质现象又由所有人对此现象的集体意识所确定。在这个现实主义的趋向中，人们对阶级和阶层作了区分。人们区分的不同阶层即不同等级的阶层或存在于社会阶级内部，或存在于整个社会中，而这些阶层自身并不构成为一个统一的集体。按照这个观念，阶级的本质就是现实的统一集体以及它对自身存在的意识。阶级是一个历史现实，它具有集体意识，它要完成特殊的事业，我刚才给你们念的这条定义表述的就是这个

意思。

唯名论派必然承认在一切社会中都有社会阶级存在。如果阶级简单地以不同程度的威望为条件的话,在已知的社会中的确一直存在各种等级的威望,并且将来也极有可能永远存在。难以想像一个复杂的社会,其中的不同集团相互可能平等对待。相反,如果社会阶级是一个意识到自身存在的现实整体,如果这些实体的本质在于斗争,人们从理论上就可能想像到阶级特性的变化,即使不说斗争的消亡,至少也是斗争的变化。

因此两个定义在哲学、政治、科学各个方面是对立的。首先,一个强调个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另一个注重于集体现实,这使我们再次面对两者的矛盾,一方是坚持个人现实的人,另一方是关注整体现实的人。

这种哲学上的对立或多或少掩盖着另一种对立,即政治上的对立。美国社会学家假设一切社会中社会阶层的永存性,倾向于降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确实,假如人们简单地把具有类似社会地位或相同威望的人构成的集合体看做阶级,那么阶级之间的界线是不清晰的,人们很容易从一个阶级进入另一个阶级,各集团承认它们间的相异性,但又不认为持久地处于冲突状态。尤其是夺取政权的斗争并不在阶级之间展开;因为假如要这样,给阶级下定义时就必须把它定成为能够夺取政权的。然而,如果你们简单地坚持威望高低所代表的身分,那么将始终是高层阶级握有权力,而从工人阶级的特征看,它永远不可能行使权力。相反,现实主义的定义提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意义,并把它同夺取政权的斗争联系起来。最后,两种观念之间在学术方面的论战是不言自明的:现实主义者谴责唯名论者放弃本质,即整体现象;反过来,唯名论者斥责现实主义者杜撰了一个不存在的,或几乎不存在的,或不均衡存在的现实整体。

我已经给你们指出，有关社会阶级的不同定义在何种程度上与哲学观念、政治倾向和科学解释相联系。怎样从模棱两可中摆脱出来？我们今天暂不涉及此问题，下一讲我将使你们看到极端混淆的情况。在我们从中摆脱出来之前，还要作些补充，我要告诉你们我的想法，下次我们再见面时，我将尽力说得更严谨：社会学家们继续在词汇和定义上争论不休，不是因为他们思维混乱，而是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本身既复杂又模棱两可。如果说有那么多构思阶级定义的方法，如果说似乎人们对阶级谈论得越多，对其究竟是什么却知道得越少，那么部分地说，原因就在于阶级确确实实是不确定的。模棱两可之所以存在于我们的科学中，是因为它存在于现实中。

让我们概要地论证一下这个判断。你们想一想一个集团的存在包括什么内容，就拿工人阶级为例，你们可以在多种现象中作选择：工人与企业领导人或支付他们工资的人相比，他们在劳动市场上是什么**处境**；工人以什么**方式**表达他们对从事的行业、企业或社会其他现象产生的想法、感情、反应；总之，你们可以逐个地考虑处境、态度或行为、认知状况、觉悟状态以及周围环境对集团本身作出的判断。这些不同方面并不是社会学家创造的，它们存在于现实中。我对分析已经作了简化，因为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由无数难以抓住的标准来确定。集团的统一性可能是事实上存在的、处境造成的或行为造成的；这三方面的统一性相互间不存在明显的决定作用。人们可以具有相同的思想方法，但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一个统一整体；某些人虽然在很多方面千差万别，但却认为他们组成了一个统一整体。从来不存在处境、态度、认知状况、觉悟状态上完全一致的整体。当社会学家试图理解现实时，他不可避免地被迫去解释这个现实。在社会学家不满足于观察现实的情况下，他会去改变现实，这样做

也许很恰当。假如马克思没有构想过社会阶级(也许当时尚未存在阶级),那么人们永远不会像今天那样去构想它们。

第四讲

定义、调查、问题

我们一起先回顾一下我们已经进行的研究以及谈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期望避免对社会阶级下一个武断的定义，因为它将会类同于这些人或那些人提出的所有定义；我们的目的不是寻求某一个定义，而是针对有关阶级概念提出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对于概念的**普遍**适用或**个别**适用问题，我们首先区分了**习惯看法**和**理论判断**之间的差别。某些社会学家对阶级下的定义可使其概念符合一切已知社会，因为在一切社会中我们确实观察到，按照人们在社会等级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权力和威望是有差别的。相反，人们也可以在明确阶级概念时使其仅适合于现代工业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部分习惯看法和一个现实的问题(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区分与以往社会的社会区分之间的差别表现在哪里?)。然后我们研究了两种定义，根据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的定义，阶级仅仅是个人组成的集合体，其特点表现于他们在威望等级中所占的地位。我们又研究了一位法国社会学家的定义，在他看来，阶级是一个现实的整体，其特点是它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有确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以及特有的文化模式。最后我们得出的观点是，模棱两可不只是存在于我们使用的词汇中，而且存在于现实本身。

对于社会现实中的模棱两可现象，我将力图举例加以阐明。让我们首先取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社会学家决定把法国所有领取不到二十五万法郎[①]年薪的人组成一个集团，这是一个随意被组成的集团，人们不认为它代表一个真正的统一整体。我们不能断言获取不到二十五万法郎年薪的人意识到自己组成了一个有别于其他集团的集团，不能断言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存在，甚至不能断言他们所有人都具有很多共同的特点。譬如，农业工人的年薪非常可能低于二十五万法郎，一个工厂的非技术工人也可能如此，然而一个生活在农村，另一个生活在城市，或许前者是在一个农民家庭，后者是在城市的一个陋室；两者都有一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但互不相同。我们姑且都同意这类集团是存在的，这是依据统计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决定、与惟一的一个标准相联系而形成的集团。现在举另一极端的一个例子。假定我们考察巴黎的产业工人，他们是法国总工会会员或共产党员，并坚信自己是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这里说的是法国工人中的一小部分。该集团由一些个人组成，他们拥有类似的职业和不太悬殊的工资，尤其意识到具有相同的思想方法（应当承认，也许实际上不如他们以为的那样）。无论怎样，他们意识到自己组成了一个集团，认为他们的集团不同于其他集团，因此他们同时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和他们的独特性。在这个例子中，团体是真实存在的，与人为的团体有本质上的差异，一开始我们把所有获取少于二十五万法郎年薪的人组成的团体就是人为的。

这两种极端的情况是被简单化了。如果只存在一种是人为集团，另一种是真实集团，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不幸的是，或许

---

① 这里当然指的是1957年的旧法郎

幸运的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大部分集团都介于社会学家决定的人为类型团体与意识到自身存在并具有严密结构的团体之间。集团从来不是完全人为的，即使当它们被系于惟一的一个标准，而真正的集团从来不是全面统一的。让我们再来看第一个例子。我们把所有获取低于二十五万法郎年薪的人组成一个阶层或一个层面：毫无疑问，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存在巨大差距。但由于他们生活条件的类同，他们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共同点；他们都赚取微薄的工资，这迫使他们具有某种确定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所有集中在这一层面的人有某些共同之处，这样的集团也就具有了某些现实性。假定我们考察一个表面看来更加人为的集团类型，例如在一个复杂社会中所有年龄在十八到二十五岁间的人。不容置疑，被我们聚集的人中，有些是资产者，有些是工人，有些人富有，有些人贫穷。然而人们抓住了一代人的最小共同点。让我们再来看相对立的极端情况，即工厂的工人，法国总工会会员和共产党员；他们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阶级，并希望加强他们的统一集体，使之更为巩固。在工资方面，他们之间存在着往往是重大的差别，这要看他们是很熟练的技工还是技术不高的工人；人们发现在生活方式上因这些工人的来历、行业、企业不同而有差异。甚至同一个工会的会员或同一个政党的党员也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认识他们所加入的团体。我所说的**现实中存在的模棱两可现象**，就是指在人为的和真实的之间，在对集团的唯名论解释和现实主义解释之间，有一系列中间状态的现象。某一个团体是否现实存在，对于这个问题给予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回答可能极为少见；一般来说回答的是大致情况。为了有一些标准，并使你们不陷入混乱之中，在简单化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区分出三种说法：一，主要由一个客观的和外在的标准（行业、收入）确定的集团，因而该

标准不意味着个人之间有巨大的共同性，他们更没有意识到统一集体的存在；二，由成员之间类似的生活和态度所确定的集团，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统一集体的存在；三，由具有相似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的人组成的集团，他们认识到这种相似性，尤其愿意组成共同团体。

这种社会现实中的模棱两可现象是任何关于社会阶级调查的出发点。总而言之，对一个复杂社会作分析的目的是确定哪些是最真实的团体。团体的现实性或者决定于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类似，或者决定于对统一集体存在的意识。这两种现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生活方式迥然不同的个人有可能感到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相同的人有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属于同一集团。这两种情况是互相交错的。对社会阶级的调查一方面受观察者的好奇心和其哲学或政治倾向所引导，另一方面受现实本身的千变万化所指引。我想迅速地回顾一下各种最常进行的社会阶级分析。

第一种调查在美国社会学界十分有名，我将用几句话给你们作介绍。调查是由一位名叫 W. 劳埃德·沃纳的社会学家做的，最终成果是一本题为《琼斯维尔的民主》的著作，它经常被人们引用，研究对象是美国一个小城琼斯维尔的社会结构。（法国的坎佩尔-科朗坦与该城市相当。）研究的结论是确定六个阶级，这是由三个主要阶级各自一分为二得出的。习惯的方法是分成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底层阶级。沃纳观察到或认为观察到人们可以再加以细分，上层阶级分为上上层和下上层，用同样的方法就会产生两个中产阶级，最后，在底层阶级中也有两个等级或阶层。他不仅把最具实力和最殷富的实业家，而且把长期以来就定居于该城市的、在地方上久已享有无可争议地位的名门望族归入上上层阶级。沃纳把因财富而享有威望和因历史悠久而享

有威望结合在一起。下上层阶级中也包括有时与前述实业家同样富有的实业家，但他们是新兴的、不著名或者不具有出身的特权。中产阶级上层由地道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自由职业者组成；中产阶级下层的组成是次一等的工商业者，或许还包括一定等级的职员，必要时加上高级技术工人。底层阶级上层的成员主要为技术工人，最后，底层阶级的下层由没多少技术或者根本没有技术的工人构成，也许再加上失业者。

我本人曾经了解过一个叫做勒阿弗尔的城市，当时它还没有以布隆维尔[1]这个名字著名，在那里有可能毫不费力地像沃纳一样进行阶级分类。二十多年前人们可以在那里辨别出一个上层阶级（按沃纳的含义），即长期以来就安居在此的新教资产阶级（譬如安德烈·西格弗里德[2]就属于该阶级），其大部分成员都在棉花和咖啡交易所工作。这些先生享有显赫的威望，人们称他们为"山岗人"，因为他们生活在俯瞰勒阿弗尔的山丘上；他们被视为并自视为上层人物。几乎处处都显露出他们高人一等，在网球俱乐部里，有一个专为这些交易所的先生开辟的网球场。人人都承认这些人组成的集团是最具有威望的，情况完完全全像琼斯维尔的一样，其中有两个原因：通常他们有最高收入，他们是新教徒，长期以来定居于这个城市。这个特权阶级的根基是同时拥有财富和悠久传统，但是他们没有能抵御厄运。我居住在勒阿弗尔的时代，正逢世界经济危机肆虐之时，棉花和咖啡交易所濒临倒闭。我目睹了这个商业资产阶级的衰落。勒阿弗尔的下上层阶级是天主教资产阶级。它自己确实认为在社

---

① 出自萨特的小说《恶心》。

②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1875—1959），法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译注

会等级中比上上层的地位稍稍低一些，或者至少古老的新教精英们是这样看的。中产阶级与沃纳在琼斯维尔观察到的非常相似。其上层由官员或次一等的工商业者组成，其下层则包括职员、商人等。我们还可以继续罗列。

沃纳的著作引起了众多社会学家的热烈争论。我不打算在这里更深入地进行讨论，我想简单地指出这样一种分析所提出的问题。琼斯维尔——或勒阿弗尔——的六个阶级怎样被该城居民所承认，或怎样被观察者们套用于现实？沃纳本人运用直接调查的方法达到他的目标。他带领一组社会学家，在小城市内住了几个月，同各类人谈话，向他们散发调查问卷，分析他们的回答。观察者们最终被众人认识，对话便在客体和主体之间展开。也许琼斯维尔的居民趋向于按提问者所期望的方向来回答问题。人们终于使一个小城市居民表示他们认为自己是被分成六个阶级的。

这样的分类并非完全人为。在勒阿弗尔的例子中，上上层和下上层阶级，即新教资产阶级和天主教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他们之间的区分有足够的认知，而城市的其他居民对此感受不深。并非所有人都清晰地认为和体验到阶级区分。绝对无法证明这些人自觉地把自己归于其中一个阶级。无论如何，阶级的界线是因观察者的好奇或兴趣而显得更为突出；在大部分情况下，觉悟的统一整体、有自我感知的团体、统一的意志是罕见的现象。在地区范围内，六个阶级的划分部分地是通过观察者本人的方法被强行套用到现实中的。此外，这种在地区范围内的分类导致对社会纯粹静态的解释，它强调的是不同个人享有的、作为等级原则的威望。这种观念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假如人们认为社会被分成一定数量的“威望等级”，人们就会直接或间接地肯定或提出这些等级区分具有永恒性和必然性，而且

一个没有这种等级区分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最后，难以把地区的分析推广到全国范围。再举我们勒阿弗尔的例子。在这个个案中，存在一种独特的以威望划分等级的方法，它把新教资产阶级放在天主教资产阶级之上，绝不可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全国范围内会有同样的状况。

现在我们来看全国范围的调查。我要简略向你们介绍的第一个是莫里斯·阿尔布瓦克斯[1]做的调查，他就在这里讲授过有关社会阶级心理的精彩课程，几年前人们出版了他的教程。根据莫里斯·阿尔布瓦克斯的看法，社会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通过其对自身的意识区别于其他阶级。另外，社会阶级按等级排列；它们不并列于同一层次，而是层层叠置的。一切阶级都认知自己处在全部等级中的某个层次。什么东西决定了它们的地位？回答大致是这样的：阶级在复杂社会的等级中所处地位的高或低是依据它们对共同理想和集体公认的高尚活动的参与程度来衡量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工人从事物质劳动，他们的劳动使他们之间相互隔离，这类职业离社会公认的崇高标准最远。人们越多参与涉及社会整体的活动，等级地位就越高。工人最远离具有创造性价值的社会活动，因而处于底层。中产阶级从事的活动是专业性的，同时也是社会性的。但譬如职员的工作按某种方式说与工人的工作相仿，因为它虽然不是体力劳动，然而是如此简单，可以说是机械劳动，因而最终变得接近于物质劳动。上层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活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与被整个集体公认为具有高尚价值的社会活动相符。最后，就是阿尔布瓦克斯观念的独创之一，他认为抓住一个复杂社会各

① 莫里斯·阿尔布瓦克斯（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法国社会学家。——译注

集团间差异的最好方法不是参照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是参照其生活方式。他的某些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针对的就是消费方式。他研究了什么是不同集团的特有需要，这些需要怎样因是工人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需要而在程度上有所变化。他把食品、衣物或住房开支的各种分配情况作了整理，严格地确定在每个社会阶级中人们怎样建立预算和怎样生活，他以为这样就抓住了各阶级的特性。

阿尔布瓦克斯抓住的现象是真实而重要的。工人从事物质劳动，他们的心理和态度同通常与其他人有联系的资产阶级有差别。你们将会在阿兰[①]的著作中看到对于这种对立的出色分析。阿尔布瓦克斯把不同集团的特有消费方式加以区分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考察社会阶级的方法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取消我们这项分析的本来目的：阶级冲突，西方式阶级关系和东方式阶级关系间的差别。依据消费习惯，依据接近还是远离社会公认的高尚准则来进行的这种分析必然适合于各种类型的社会。人们到处都会找到上层、中层和下层阶级。也许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因国家和社会制度而异，但是借助这种方法，人们不可能知道阶级关系怎样因经济制度的变化而有区别。阿尔布瓦克斯观察的社会等级可以说是功能性的；在所有社会中人们都会看到他所区分的集团各自具有的特殊功能。

我要给你们讲的另一种经验性研究是四年前正值列日代表大会期间由国际社会学协会进行的，今天它仍具有典范性。下面介绍的就是这种简便而概括的方法：人们以取样开始，详细的办法我略而不说了，当人们想研究某个集体的社会阶层时，要选

---

① 阿兰(Emile-Auguste Chartier, dit Alain, 1868—1951)，法国哲学家。——译注

择方千或一万个被视为能够代表整个这个集体的人。人们向这些人散发调查表，通过采访尽可能地予以填写。人们要求被选中的人回答大量问题，涉及他们的职业、父母的职业、他们的工资、受教育程度等等。与此同时，人们依据各种职业享有的不同威望确立一个等级体系。为做到这点，有多种操作方式，但指导思想是：人们要选择一些在整个集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个人，把一定数量的职业种类提交给他们，假设三十来个，请他们把这些职业按等级顺序排列。人们可以要求这些人划分出几种类型，然后把上述职业归入不同类型中；也可以选取具有特征的职业作为划分类型的"区分点"，然后把其他职业分别排列进这些区分点之间；也可以把上述办法结合起来，最终得到一个以不同威望区分的等级体系。当你们获得了这个等级体系以及前述填写好的调查表，你们就能把对象的回答和等级体系结合起来，确定属于不同阶级的个人在集体中所占的比例。此外，你们就能够发现首先是客观标准之间的关联，例如工资、受教育程度、与所有权的关系。目的是为了觉察到这些客观标准怎样在现实中互有联系，也是为了确定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间的关系。日本人在这类研究中把三种识别结合起来。他们要求不同对象一方面识别自己所属的阶级，另一方面识别这样那样的其他人所属的阶级；然后，他们要求研究人员依据威望程度建立职业等级和阶级等级，他们再把人们的自我识别和根据一些社会学家的意见得出的识别进行比较。通过这样一种方法，你们可以确定经济状况或社会状况同个人对自己归属的想法之间存在的关系。如果在调查问卷中，你们询问了关于对象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情况，你们也有可能作出有关社会流动的某些判断；在一个被称为上层的阶级中，其成员们在何种程度上是从那些已经属于这个阶级的人的子女中吸收的？在社会中向上流动的频率怎样？社会流

动的强度如何？

如此研究社会阶层的结果是使人明确，所有个人如何客观和主观地分属于一个复杂社会的不同集团，以及如何从一个集团进入另一个集团，这变化或者在一代人身上，或者在隔代人身上发生。这种调查的局限性是把研究的目的部分地放在一边，即阶级现实的关键性问题：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个人在何种程度上自认为**主要**属于某一个与其他阶级对立的阶级？上面的调查方法只是间接地触及到下列问题：个人的阶级归属情况如何？集团间的实际差别达到什么程度？当你们问一个法国人："您属于哪个阶级？"你们是否会注意到，法国人认为自己**主要**属于某个阶级还是**主要**属于某个全国性团体？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中，阶级意识都达到何种程度？因为这些集团同时都意识到自身的一致性和与其他集团的相异性，他们互相对立到何种程度？

通过对种种研究方法的回顾，我们几乎达到了预定的目的，这就是引出社会阶级的定义所提出的问题。让我们再从最简单的概念开始。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社会，被阶级的概念所困扰，却又无能力为此下定义。对于这种矛盾，前述分析可以加以解决。我们社会中的障碍不是法定的，人们从一个阶级进入另一个阶级无需跨越法律上的屏障。一个工人的儿子可以合法地在一所大学里学习和成为共和国总统。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复杂社会内部的差异是多种多样的。各集团存在差异，表现在个人的经济-社会条件不同以及威望体现的地位不同。经济-社会条件是参照众多标准得出的结果，其中有与所有权的关系、工作类别、工资、受教育程度。以威望确定的地位不一定是单一的意义；各种官员属于法国社会中的不同集团，其地位可高可低。任何单一意义的威望等级将只具有人为的特性。摆出这些基本

的事实之后,我们将会遇到两种思想体系。

第一种思想认为,西方社会的真相是在集团之间没有法定的区分,这不同于旧制度时存在的情况。也许人们会说,个人的工资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也不同。确实,在一个复杂集体的成员间存在众多不平等,但如果说工资等级的差别十分清晰的话,威望等级却含糊不清,人们从一个等级上升或下降到另一个等级是方便易行的。

第二种思想是追随马克思的,强调法律平等同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人们不说现代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是阶级难以界定,而说基本现象是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同以往社会同样大甚至更大的区别。生活方式不同的工人和资产者各自都组成集团,他们意识到自身的一致性以及与对方的相异性,因而本能地展开冲突。

由此我们再重提与我刚概述的两种思想相对应的两个定义,即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家的定义。两者都与事实相符,至少乍一看来是如此,因为西方社会公民之间不再存在法定区分是事实,他们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也是事实。全部问题在于弄清个人是怎样感受到这些差别是根本的还是次要的。如果这种对比确实存在,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将要在以后的课程中论述的问题:

一,**与个人的经济—社会条件相关的问题**,该条件决定于工作类别、工资等级、财产关系、生活方式等多种标准。由此引出第一系列的问题:这些标准被怎样分类?它们构成什么团体?哪些团体比其他团体更真实?

二,这些通过参照社会-经济标准被客观确定的团体在人们的**心理上**是否**具有真实性**?工人过着与资产者不同的生活,他们在精神上与后者的差别表现在哪里?他们是否有另外的社会准则和另一种理想?

三、这些团体是否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就是说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团体相对立？

这就是阶级概念提出的三类根本问题，对一个社会的不同集团和对不同的社会来说，这些问题必然不具有相同的回答。第一类问题不包含，本质上不可能包含明确的答复。人们总是会在划定团体的界限时遇到一定的困难。这里说的是工人阶级吗？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观察到一些不明确的、处于边缘的情况：从等级的哪一级起，一个工头就不再属于工人阶级？从哪一级工资开始，一个技术工人就脱离工人而属于中产阶级？社会团体的特性本来就不清晰，其界限难以划定。第二类心理差异问题又一次因本质上的原因甚至现实原因而不具有明确的答复。让我们仍然举工人阶级的例子：像法国这样一个国家中的工人对很多问题的想法不同于集体中的其他集团。但是他们同样是法国人，他们具有法兰西集体的成员共同的特征，同时也具有一个阶级成员的共同特征。每当分析时，重要的是要确定决定阶级特性的因素具有什么作用，尽管这些因素也是整个大集体的一部分。至于最后一类问题，阶级意识不可能是全面的。法国工人阶级是否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事实上，阶级意识永远不会出现在全部法国工人身上；仅一小部分人使之具有活力并加以体现。

这一系列问题使你们明白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同意美国社会学家和法国社会学家的定义。假如我同意前者，把以威望决定的地位当做基本现象，我就会立即排除马克思留下的关键问题：不同社会阶级是怎样随着经济制度性质的变化而出现的？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互相展开斗争？另一方面，我也不可能同意我曾引用的法国社会学家的定义，因为他预先假定的事物尚存有疑问，这就是工业社会的成员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个集

体中的一个小集团，并抵御整个集体的渗透，拥有自己的思想方式、某种文化以及与权力的某种关系；这些现象是可能的，但没有被证实。**换句话说，一个定义排除问题，另一个则预先解决问题**。由此，当我同时摒弃了这两个观念时，我认为终于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表达方法，它对问题不预先给予解答。这就是要由现实来告诉我们，在工业社会内部，个人怎样会构成阶级，阶级怎样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又怎样感到互相处于冲突状态。确实，最好还要把阶级意识和斗争进行区分；人们有可能意识到属于一个区别于其他阶级的阶级，但是并不坚信阶级注定要投入一场殊死的斗争。

第五讲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

在前面三讲中,我力图告诉你们对阶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要素。这个尝试对你们来说必然显得抽象而艰涩,也许是人为的,或故意搞得令人难以捉摸。你们可能认为这样做事倍功半。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印象,但这长长的开场白仍然是必须的。整个分析的目的,是向你们提供一个**必要的方法**和一个**事实**。

首先,我很想让你们的思想摆脱常用的词汇,避免因纠缠于词语而难以自拔,帮助你们不把词汇的习惯用法和真正的问题混淆起来。我要你们必须接受的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判断:**社会现实就其本身而言是模棱两可的**。如果难于为阶级下定义,那是由于阶级不像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那样让人一目了然,因为问题涉及的现象有关意识和意识间的关系。你们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视角以定义方式来思考意识间的关系。每当人们思考一些集团和集体组织的时候,可能会有五花八门的观点,因而产生多种分类方法。对阶级概念的透彻研究要求人们能够使之适合不同类型的集团。然而,怎样来区分各种集团,人们可以自行决定标准,可按照集团内意识融合到什么程度,或者集团所从事的活动以什么为目标(重实效的、精神的或超验性的目标),或者集团功能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

以这种理论为指导,我只是抓住了为数甚少的有关阶级的

特点，请你们注意一下：这是一个包括大量个人的集团，作为实体他们永远不可能聚集在同一个地点（人们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一个社会阶级，这同看不到一支现代化军队一样）。一个社会阶级不是组织起来的，也不是法定构成的，人们可能不知不觉地进入和出来。人们不总是能够确认某个人是否属于这一个阶级或另一个阶级，因为每人对自己地位的认知方式仅仅是社会学家可抓住的因素之一。如果有一大群人处于相似的社会-经济状况中，具有类似的思想方法，并意识到组成了一个集团，那么这样一个完美的、地道的实体是可能存在的。然而根本无法证明这个理想的、十全十美的阶级存在于像法国或美国这样的社会中，也根本无法证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不同社会集团都同样接近或同样远离这完美无缺的状态。也许某些阶级更处于潜在状态，而不是真实状态，也就是说虽有类似的社会-经济条件，但阶级意识和共同行动的愿望并不伴随而生。

既然确定和界定阶级是如此之难，为什么社会学家们还要困扰于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呢？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概念几乎和开始时一样模棱两可，一个概念处于一门学科的中心，它的奥秘究竟源于何处？最直接的回答可能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特性。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存在，阶级概念没有被应用到政治领域，它对非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巨大影响，特别是在一个国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后，那么阶级概念永远也不会在理论的或经验的社会学学科中扮演当前这样的角色。况且，在诸如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直到近期都没有什么影响，在几十年时间内，人们几乎不谈社会阶级，至少是不谈从马克思主义含义上说的阶级。

这个解释尚不充分，因为它反过来又引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如此大的影响？我的答复如下：现代

社会当它们既是工业社会又是民主社会的时候，它们都带有双重矛盾：它们确信拥有无限的生产能力，同时又因处处可见和无法消失的贫困现象而不得安宁；它们到处宣布所有人的根本平等，同时又因仍然存在于公民间的不平等而苦恼。

第一个矛盾容易引起错觉。有人过分地估计集体的生产能力，并想像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下，贫困现象就会消灭，这个矛盾使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受到震动。你们在巴黎会碰到一群主张"丰裕说"的理论家，这些愿望良好的人极端无知，他们真心诚意地认为，改变经济结构将会使所有人拥有财富。这些纯属蠢话，甚至不值得认真地加以讨论。我将在课程的后面给你们提供一些数字，是有关各不同国家的国民收入以及它们的分配情况。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富国的收入以绝对平等的方式被分配给个人，他们的收入水平在主张"丰裕说"的理论家看来肯定是不够的。

相反，法律平等和实际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很深。工业民主声称在劳动领域和政治领域人人平等。然而，事实是收入严重不平等，生活方式千差万别。更有甚者：假如可以说，某人过着什么样水平的生活是因为他从事某种职业，某种职业的酬劳微薄是因为它只具有一般的社会效用，换句话说，假如不平等纯属个人的事情，那么这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但不平等是以集体形式显现出来的，不管有理没理。人们感到不平等是由于个人属于被称为阶级的不同团体，这一点显得与工业社会的基本原则相矛盾。个人的命运看来不决定于他的功劳或过失。人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在一开始就不处于类似的境遇，一个复杂社会内的集团因威望不同和参与集体文明的程度不同而互相间存在差距。因此不平等与公正原则不相符。此外，从一个集团过渡到另一个集团是很困难的。从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和集团与

集团间的隔离似乎同平等原则相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社会-经济水平，它通过财产关系来加以解释。同时，它证明反抗是有理的，既然阶级通过其存在本身就否定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平等原则。

从那时以来有长足发展的经验社会学难以找到与马克思主义曾假设的真正集团等同的团体。它发现的不是明确定义的阶级，而是多种区分标准。但实际上大部分社会学家最终在好几个对工业社会有效的判断上取得一致意见。社会-经济条件随工作、收入、生存条件、消费方式而变化，尽管这些不同标准不是严格地协调一致。再说，在社会-经济条件的相近或类似与阶级意识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人们从威望这个角度观察多种集团，社会被分成很多群体，它们不想失去自己的特色，各自都因自认为拥有高于其他群体的某种地位而自豪。依据个人条件或阶级意识的相似程度，把集团按等级进行排列，它们之间的这些区别具有或多或少的真实性。在经验社会学家间，仅仅在一个问题上仍然存在根本分歧：在这些复杂多样的区别中，是否有一种区别比其他区别更重要？是否存在一些大集团，每个大集团的特征都表现在其成员个人具有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集团意识到自身的一致性和与其他集团的对立性？

我们现在要力图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今天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集团，下一讲我们将要研究苏联式社会的主要集团，换句话说，我们要尽力对资本主义式的和共产主义式的阶级关系作一个比较。我的用词没有什么政治考虑，意思是我习惯把我们在西欧和美国看到的社会叫做资本主义社会，把苏维埃俄罗斯社会或人民民主社会叫做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你们更喜欢把形容语颠倒过来，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

我们来提一个很平常而传统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有哪些主要社会集团？请你们再一次注意社会学的一个怪现象或一个反常现象：人们花费多年时间致力于确定社会阶级的概念，可一旦成功，人们却无法说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分成多少阶级。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定义是明确的，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明显地分成对立的阶级，这本来是可以从定义中得出结果的。按习惯可列举出以下的阶级：人们首先辨别出一个上层阶级或资产阶级，具典型成员该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他们对国家的影响占有支配地位；第二个是工人阶级；第三个是中产阶级（或多个中产阶级，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家们没有定见，有些人选择这个词的单数，另一些人选择复数）；最后还可能有一个或多个农民阶级。上述列举首先向我们提示了一个简单然而我认为是根本的看法：从马克思的词义上看，只有在简单地把阶级划分为生产资料占有者和工人的情况下，阶级对立才可能是真实的，才会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的思想所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这一点发展起来的，因为事实上或表面上，在从事工业劳动却一无所有的人和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冲突。我要更进一步说明的是那个杰出的阶级显然就是工人阶级，之所以杰出，不仅因为马克思把他的革命希望寄托在它身上，而且因为它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想像的阶级最相像。确实，它由雇用劳动者组成，这些工厂工人除了少数例外都不拥有任何财产；他们靠工资生活，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支付给他们出卖劳动力的价格；他们从事物质劳动；他们的收入尚不很悬殊，至少在西方社会是如此：在英国或法国，在一个非技术工人和一个技术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距相当微小，一比二之差被视为是极限了。由此，在工人阶级这个惟一的例子中，可以说你们看到了所有的划分标准：财产关系方面的相

同处境、相同类型的劳动、相同水平的收入。工人们大部分都聚集在他们的劳动地点，至少在十九世纪是这样，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居住地点也很集中或者离得很近。一个社团就这样形成了，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收入水平、财产关系方面的处境，这一切使它区分于整个社会。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如此相似，以至于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意识到他们的共同性，随之意识到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对立。上个世纪，对于集中在属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大工厂的工人来说，难以（也许今天有时也难以）感受不到在工厂的雇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的对抗是根本性的。但是这种共同标准的并存现象，我们在任何其他情况中都找不到。我们刚才临时列举的其他阶级中没有一个阶级呈现出能与工人阶级比拟的单一性、一致性、共同性。

譬如，假定我们来谈一谈资产阶级，如同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通常所做的那样，当他们声明自己是资产阶级的时候是深感内疚的。在什么情况下，下列几种人之间存在真正的共同性：旧贵族的后裔、政治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占有者、不占有任何财产但管理生产资料的股份有限公司的雇用经理，最后是成功的艺术家或知识分子？我不说这些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肯定都有最高的收入，因此在生活条件上有某些类似。尽管如此，一个生产资料占有者和一个剧作家的生活方式的相似不会与工人生活条件的相似同样大。换句话说，上层阶级是由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的人组成的，他们担任的职务有区别，我们没有理由**预先**就推理说，所有这些人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一致性。

我们能够对刚才划分的另外两个阶级说同样的话吗？它们是一个或多个中产阶级以及一个或多个农民阶级。社会学家们习惯于把许多非常不同的集团归于中产阶级。有三种类型的职业被列入其中：小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有些是工薪阶层，另一

些则不是)，最后是工业部门管理人员。如此确定中产阶级使属于该阶级的成员既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又有工薪阶层。无法确定的是，诸如雷诺这样的大型企业的工程师和街角肉店老板会感受到他们具有共同性，或者两者会有相似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这么看仅仅因为一份大报宣布必须把几个中产阶级归为一类。列入这一类中的人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以至于我们没有任何权力断言在这些个人之间具有真正的共同性，更不要说阶级意识了。阶级意识在某种环境中产生是可能的；人毕竟不是牲畜，宣传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无关紧要，它能使商人、教师和工程师感到他们之间的共同性。为什么不呢？绝对不能排除这三类人有共同利益，为此只要指出他们的某些利益是与其他各类集团的利益相对立就足够了。但是至少可以说人们难以确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因为在上层资产阶级和所谓的中产阶级这两种情况中，我们的分析没有明显地揭示出存在大的团体，而且每个团体都决定于特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对共同性的意识。

假如我们现在来看农民阶级，我们会再一次发现标准同样不统一。马克思在英国农业中观察到的资本主义结构，或者他进一步认为应该实现的资本主义结构有三种成分，即不从事经营(享受地租)的所有者、农场经营者以及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农业工人。确实，人们可能设想欧洲农业是循着这样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第一个集团拥有土地，第二个作为农场主经营土地，第三个是直接地被经营者、间接地被所有者雇用的劳动者。正如你们所知，事物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了。法国存在一些不从事经营的土地所有者，英国更多。但特别在法国，绝大部分土地是由所有者经营的；因为当由农场主来经营时，议会所制定的法律条文不再有利于所有者而利于经营者了。农业工人数量相对地少。由此，如果人们问，是存在一个农民阶级还是几个农

民阶级时，企图作笼统的回答就显得太随意了。

不可能抽象地确定从事经营的所有者、农场经营者和农业工人在什么程度上具有还是不具有共同性，或者具有还是不具有对立性。对答案的选择取决于多种条件，如确定所有者和经营者关系的法律、经营规模的差别。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根据上述最后一个标准区分农民内部的阶级。在某些情况下，区分具有真实意义，人们确实可以区分出大、中、小三种土地所有者。当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政权时，它随心所欲地把大、中所有者称为富农，并根据这个定义剥夺他们的财产。如果撇开这样的宣传，那么大、中、小土地所有者在什么情况下处于冲突状态或者感到他们相互利害一致？答复因多种不同情况而变化。只要农民是所有者就肯定他们利害一致，是荒谬的论点，因为经营规模大小的差异致使人们对相互冲突的感受甚于相互一致的感受。让我们补充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观点，出自我在几星期前给你们引用的一段文章中：直到近期，农民很难感知他们的共同性，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互相分离。马克思写道：人们生活方式的类同不足以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互相间还应该有足够紧密的关系，才能发现他们的共同性并与其他集团相对立。上个世纪法国农民中的土地所有者对事物可能有共同的反应（是他们选举路易·拿破仑当共和国总统的），但是他们过着分散的生活，融合在当地的社团中，并不构成全国性的真正统一体。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或所谓的阶级进行回顾，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罗列出典型的阶级。人们到处可以找到的两个惟一的集团，一边是产业工人，另一边是工业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但是其他类型的集团不构成被明显界定的团体。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如同马克

思描绘的那样,但是社会的其他部分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同样复杂,或者确切地说更加复杂、差别更大,当时马克思想像整个社会最终都将汇聚到处于两个极端的两大集团周围。

前面我们对阶级进行了列举,现在来提个问题:我们确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但没有准确地给以界定,它们互相是否处于斗争状态?在我们含糊地确定的这些集团之间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作为社会集团,是否每一个都具有某种很容易鉴别的利益?让我们举最有利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例子,即工人及其与资本家关系的例子。如果确实存在一种根本性的斗争,那么我们将是在这两个集团的冲突中才能看到它,因为理论本身的构思就是针对这种现象的。无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在利益上存在根本对立的思想是什么含义?

我们先举个例子:让我们看一看一个私人企业中的工业劳动者的利益。人们可能认为雪铁龙公司劳动者的利益和企业主兼领导的利益是对立的。确实,工人要求得到尽可能高的工资,而老板在期望获得最大利润的范围内试图尽可能地降低成本。第一个印象,也就是表面现象,是工人的收入越多,企业家获取的就越少;雇用劳动者方面要求拿到最高限度的工资,企业主方面期望获得最高限度的利润,两者间有矛盾。但是这种紧张状态是正常和健康的,而且相当明显地具有一定限度。

事实上,企业总利润中的一部分是要被重新投入生产的:一部分国民收入的再投入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过度增加工人工资从而牺牲再投入的利润,这与工人本身的长远利益是不符合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这无关紧要,无论如何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不应该被消耗掉,应该用来扩大生产资料。增加工资是工人的利益所在,合理合法,并且通过请愿表达出来,但是在一个既定的企业中,工资份额部分如果扩大到损

害企业中的再投入利润，工人的利益也就成为泡影。

人们可能会说，工人的利益是使企业中扣除必要开支后分给股东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润部分化为乌有或几乎化为乌有。然而在私人企业制度中，如果某企业不分给股东最小限度的股息，该企业就不再可能在市场上获取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归于资本家的利润部分不是工人的利益所在。因此对于一个私人企业来说，工人对工资有要求，老板尽力获取利润，两者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如果经验证明生产资料的积累能导致工资的提高，这就不是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而事实就是如此，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再投入使生产资料得以积累，工人的工资增加了。所以在企业范围内，因雇用劳动者和企业主各自都想着自己的收入，他们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或斗争，但并非是不可消除的对立。

人们自然会回答说，单个企业的情况没有意义。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存在根本性的阶级斗争，确实如此，马克思从未这样认为。利益的对立是出现在被作为集体看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但只要我们还总是停留在经济领域中，这个判断并不正确，因为无论我刚才对企业的情况所作的分析多么扼要，它仍然对总体状况是有效的。如果你们考察国民收入及其在所有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情况，两个集团之间确实存在紧张状态。然而这斗争也具有一定的极限：必须保留足够比例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一旦这个比例确定下来，作为斗争的真正目的就只剩下收入的等级和利润部分了。譬如，在当今一个工业大企业中，月工资的幅度可能在三万至一百万法郎之间。绝对不能证明这样的等级排列对企业的良性运转是必要的，或许工业社会可以在工资差别幅度小得多的情况下顺利运转。人们也可能对归于股份拥有人的国民收入部分进行争论。这些经济方

面的冲突是真实的，想像这些冲突总会公正地得以解决纯属虚伪，否认因国民收入分配而进行的斗争也纯属虚伪。但并不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在纯粹的经济领域内，因工人集团和资本家集团各自具有互相对立的基本利益，他们就要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在经济体制范围内，两者的共同利益是企业或经济的繁荣、是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的必要条件在于同时符合雇用劳动者和企业领导者的利益。如果企业管理者是被雇用的，大家都会懂得这一点。即使当他们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并获取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况且是微弱的一部分时，这也改变不了如下的重要思想：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领域中，有各种各样的利害冲突，并且是长期的和不可克服的；在企业中，在经济部门中或整个经济领域中，每个集团都力图最大限度地增加各自从国民收入中得到的部分，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竞争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本质相关联，只要这场斗争被人们接受，也就是说只要政治制度允许个人组织成集团、表达他们的倾向和捍卫他们的利益。但在纯粹的经济领域内，同样不可能发现某一种"阶级利益"可被一次性地确定下来，可被一个阶级的所有成员无条件接受，可使他们同其他阶级的成员相对立。被雪铁龙企业雇用的工人有可能优惠地得到比其他企业的工人更高的工资，冶金工业部门和其他某个工业部门雇佣劳动者的收入之间有可能极其悬殊而发生矛盾。无数种利害冲突会造成长期的斗争，这就是工业社会的日常运转状态。

"阶级利益"的思想完全是另一回事。马克思曾是李嘉图的信奉者，他大概鉴于自己的工资理论和剥削理论倾向于接受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阶级对抗。他当时比我们今天更重视企业内部的或者资本家和工人关系中的敌对状态，以及为分配国民收入而展开的斗争（他认为工人为提高他们从国民收入中获

取的部分而进行的战斗是一场激烈的战斗，确实，与二十世纪的斗争相比更为艰难曲折），但是问题的本质不在这里。**在马克思眼里，阶级利益是从政治角度上被确定的。**每个阶级对社会组织都具有自己一定的观念，作为阶级，它企求权力。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期望自身作为阶级得以消亡，在此范围内，工人利益同资产者利益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这不是为最大限度提高收入而作努力，这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而政权正是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核心。

就是针对这个思想，我想简要地分析一下。抽象地说，它的含义是，当工人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并同时消灭阶级对立之时，它自身不再是无产阶级。下一讲我们将要研究，在一个政党夺取了政权，消灭了生产资料所有者以后，会真正发生什么事情。但实际上，无论是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一大批工人将继续在工厂中劳动。在集体所有制中，生活条件、工资、国民收入分配是否会比在私有制中对他们来说更有利？我现在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需要根据经验客观地加以研究。我想说的全部意思就是，在集体所有制中，工厂工人的境遇会得以改善的事并非显而易见。

最初的思想是这样的：作为阶级，一切阶级都想肯定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它觊觎政权，以便按照它的理想来组织社会。但事实上，不存在一种惟一的、绝对必要的、具有无产阶级特色的对社会的看法。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从未行使过权力，在苏维埃俄罗斯如此，在美国也如此，工人在工厂中劳动，不管理国家。在一个社会中，工人阶级不再处于底层，变成了领导者，这是神话，因为这是把依附于某个阶级的政党夺取的政权混同于该阶级的绝对政权。阶级斗争的全部理论是同工人夺取政权这样一种表现形式紧密相连的。然而，工人革命是可能的，一个政党夺取政

权是可能的，但是一旦政党胜利了，数百万人继续在工厂劳动。也许工人阶级的状况在革命后比革命前好，也许相反。在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个阶级的政治利益**这个概念是和下面的假设相连的：每个阶级向往政权，在某种条件下，无产阶级自身可能是领导阶级。

在所有复杂社会中，少数人为夺取国家政权而争斗，当工人阶级认为一个政党的权力就是**它的**权力的时候，它确实希望这个政党得到权力。我不说它是错误的，但如果工人不相信声称代表它的政党，它就意识不到它处在一个自称是工人性质的制度中。革命后同革命前一样，将存在互有区别的社会集团。全部问题是要弄清少数领导者究竟为谁而工作。

第六讲

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

在上一讲最后，我开始分析阶级利益概念，力图向你们表明这个概念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在为它下定义时，一方面可能以最高限度地获取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为标准，另一方面可能以依附于既定阶级的政党夺取政权为标准。在过渡到研究苏联式社会之前，我想深入分析一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概念，我使用的方法是把阶级利益放到集体利益之中，同时指出阶级利益这个词对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来说可能包含什么意思。

我们先从心理学家开始，并假设问题涉及的是一个人的行为。说个人是依据自身利益而行动，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判断，因为不管所论的行为如何，心理学家都可能同意这个提法是正确的。让我们假设某人来听课是为了通过考试：他这样做的动机就是一种利益，因为他力图据此获得顺利通过考试的方法。让我们假设他来仅仅是为了满足听课的乐趣，或者为了享受热烈的气氛，或者为了同他的邻座女友交谈以消遣：仍然可以说这些人来听课是受利益所驱使。在前一种情况下，涉及的是伦理学家视作“具有利益关系的”一个行为，因为当事人想的是一次考试；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说目的是修养或消遣，伦理学家将不会谈利益问题。但众所周知，自有了拉罗什富科的分析以来，不管一个人的行为如何，人们总是**能够**把它引向对快乐和痛苦的比较上面。那些宁肯接受殉难也不愿叛卖的人难道不是作了

这样一种选择吗？因为对于他来说，由于叛变而可能经受的精神痛苦比他将遭受的肉体痛苦要更为糟糕。自然，并不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个人的行为是由对愉快或不愉快的估量来确定的，也不能因此而说人们无法区分怀有明确目标的有意识行为、本能的行为、感情用事的行为。简而言之，利益概念对一个心理学家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既然在他心目中利益只在与动机有关时才能加以确定，而动机则是因人而异的。心理学家想了解这些动机，以及各种人、各种集团、各个世纪的不同程度的偏好，或者还想了解各种类型的动机或各种类别的行为。

现在来看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说，从两种不同含义上把一切行为看做受利益支配同样不存在困难。第一种是纯粹形式上的断言，即如果某个人完成这个行动，那是因为他喜欢这样做，科学地说可表达如下：如果某人来听课，那是因为听课无用或听课无聊的感觉对他来说比听课有乐趣或期望能从中得益的感受更为薄弱。这样一个判断是显而易见的，它是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定义。现在我们过渡到第二种含义，它着眼于现实：一切经济主体都力求获得最高收入或最高福利（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在这种情况下，判断所涉及的是现实，并经常适合于现代社会。事实上，经济学家摆动于两种意义的提法之间，即形式上的和具体的。一种提法是，一个经济主体的一切行为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不可能由利益概念事先确定。相反的提法是，一旦作出选择，人们可以把它叫做个人利益。假设一个人想尽可能增加他的收入，还是会存在取舍的因素，这是当主体不得不从两种工作中做出选择的时候，一种是可给予他一定收入的工作，还有一种是劳动量大但给予他更高收入的工作。在现代社会某个经济主体的一切行为中，出现费力大小和钱财多少之间的选择至少是正常的。每人会作出什么决定？这要通过研究才能观察

到。事实上，现代社会的行为逻辑往往不表现为追求最高限度的收入，因而上述这类分析毫无用处。

至于社会学家，不能把他们混同于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不力求从情感冲动的角度来解释人的行为或者使之概念化，也不局限于分析经济主体的选择逻辑，他们希望同时理解社会中个人的行为、偏好的方式、价值体系，后者决定这些行动以及心理学家研究的情感冲动在具体社会中的具体形式。

现在我们来谈谈集体利益概念。我们已经看到个人利益总是可以由个人的选择来确定。但是当涉及到一个集体的时候，很少有类似的经验，因为一个集体永远不会像一个人那样一致行动。为了知道在一个集体内部众人的满足值是否达到最大程度，必须比较个人的内心体验，必须根据经济学家的提法接受个人满足感的可比性。

当然，只要人们能够在不减少个人收入的前提下提高总收入，按照维尔福雷多·帕雷托[1]的著名论断，为了集体而增长利益的说法是合情合理的。帕雷托确实排除了比较个人内心深处想法的合理性，而是力求确定一个最高点，超出这个点，这样的比较就变成必要的。超过这个最高点，给予某些人的利益将会由其他一些人遭受的损失来支付。在这个最高点之内，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受损失和大部分人获得更多利益，那么事物向前发展就是正常的。这是个逻辑上完美无缺的、社会学上合乎情理的判断，只是我有一个保留：在某些情况下，不平等的突出现象足以使某些人产生动摇，从而大大提高增加收入的满足标准[2]。

---

[1] 维尔福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译注

[2] 我们补充一点，作为合理目的的最高实利是以经济增长本身也就是一种福利为条件的。让-雅克·卢梭对此似乎持怀疑态度，伯格森也表示怀疑。

另一种假设是主张福利救济的理论家们提出来的，依他们之见，如果减少不平等现象，就是说把从富人那里征收的钱转移给穷人，那么一个集体中个人的满足感就会从整体上得到提高。人们从巨额收入者那里抽取 10% 的部分，为微薄收入者增加 10% 的酬劳，在前者心中引起的不满比后者得到的满足更为微弱。无论这个假设正确与否，它肯定来自人们的一片好心，如果我们表示接受，那么减少不平等将会导致增加总体的满足感。就我个人而言，我很乐意接受这个判断，虽然我觉得这种判断以假设的形式表示出来从心理上说没有多大意义，似乎它以社会倾向或者价值体系的形式展现出来更令人信服。支付税收者的不愉快情绪和接受补助者的快乐感相比，是否后者更为强烈？首先，我不能肯定愉快和不愉快是否可比；其次，如果人们力图采用调查和统计方法，也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后果：得到补助金的人可能并未意识到他感受的愉快，而支付税收的人则肯定意识到他体验到的不愉快。

人们还可能为一个集团的集体利益构想第三种定义：符合最大多数人爱好的利益。这个论断不荒谬，但这是俗套。没有必然的理由可以断言绝大多数人的爱好是符合理性或公共福利的。除非一开始人们就假定个人和个人是平等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法律，哪怕它是盲目或荒谬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再是经济分析，而是政治原则了。再说，当人们以绝大多数人的爱好作为集体利益的定义时，人们就远远脱离了最高收入或最大满足感这样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人们该引入的不是帕雷托所称的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是集体的利益，即一个集体的成员自己对本集体福利的设想。当法兰西所有成员的收入都达到最高值的时候，就存在为了法兰西的最高实利。但是法兰西集体的利益同国民总收入或所有个人的总收入是不可混同的，它可

能是强盛、光荣、社会公正;当集体被视为一个统一体时,其利益不由最高的物质利益来决定,它是由每个人根据他的价值观念来构想的

在这里,我们在抽象的形式下又发现了上一讲谈及阶级利益时观察到的两重性。为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实利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无产阶级成员的收入,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则可能表现为要求依附于它的政党夺取政权,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历史性统一团体,它追求一个目标,并受某种价值体系的启示。

实际上,一切现代社会的集体在采纳某个经济政策的时候所作的选择总是同某个个人作的选择相类同 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至少会在一定的费力程度和一定的收入水平之间作选择。对于一个现代经济集体来说,取舍基本上有以下两方面:

一,首先应该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进行选择。根据被节省下来用于投资的国民收入部分的多少,经济增长将可快可慢、投资数额越巨大,当代人作出的必要牺牲就越大,从理论上说(而且所有事物都应是平等的)后代人获得的利益就越多。然而,投资的速度是某种选择的结果,而这个选择不可能单一地、强制性地决定于抽象的利益概念。事实上,选择或者是一种政治意志的目的,或者是无数个人的或集体的决定综合的结果。

二,一切现代经济社会都在各类不同的集体收入分配模式中作一种选择。不管国民总收入有多少,财富的分配是不平等的

假设有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计划局,我刚才指出的两种取舍将由计划制订者作出。在苏联,投资占多少百分比的选择权被看做是政府当局的特权,人们甚至宣布,占国民收入25%的比例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而是强制性的;这个百分比几乎被提到信条的高度 同样,在理想的计划经济中,收入的分配

也由中央政治局来决定。它决定国民中什么类型的人获得什么份额的财富，以及工资等级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在一个非计划化的集体中，谁也不对全局作决定。任何现代经济都无法回避的根本选择不由任何人作出。这个判断看似不合常理，实际上它只是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上述两种选择并非由一小部分人自觉和有意识地作出的，尽管他们拥有将选择强加于人的必要权力。选择的结果确实来自所有个人和所有集团的行为。为分配国民收入而进行的斗争或竞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是相符的，既然这个社会拒绝考虑基本选择由几个人全权作出。

到现在为止，我有意使用个人和集团的竞争或斗争这个词。人们可能会说，在投资和消费之间以及在个人和集团之间的财富分配并不产生于斗争，而只是来源于发生在市场上的现象。但是事实上，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基本选择不是仅仅因个人在市场上的竞争和买方卖方的较量而得以实行的，选择受到集团竞争、工会实力、雇主个人或雇主集体抗拒能力的影响，即使不说被它们所决定。我坚持这个观点。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种个人的和集团的竞争是不正常的，从而取消竞争是合乎愿望的。如果有关经济发展的重大决定由一个计划局自觉地作出，那么也不可能是任何个人的行为，而是由一些相继发生的事件导致的结果，其中起作用的有政党之争、市场竞争、职业组织间的斗争等种种纷繁复杂的现象，它们都应被视为正常现象，并应被完全接受。

但你们将对我说，这一切同我所称的阶级斗争毫无关系。这就是定义问题了。让我们都接受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竞争，并且假定当以下三个补充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这种个人的和集团的竞争就变成阶级斗争。首先，个人譬如工人应该认为他的个人命运不可能由于他自己的努力而发生变化，而主要依附于

他所属的阶级的命运。其次,非特权集团的成员应该坚信惟有暴力才可使他们夺得利益,或直截了当地说惟有暴力才可使他们在个人的和集体的长期竞争中获得公正的结局。最后,个人应该感到自己更多地维系于阶级,而非民族共同体,因为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命运只有在整个社会组织都改变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改善。

我想简要地评论一下这三个条件。我刚才说个人应该认为他的命运更多地依附于他所属集团的命运,而非他个人的努力。确实,工人往往认为[①]他的收入、他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都不会因为他自己可能做了什么而得到明显改善。这种与集团的利害一致在什么程度上压过个人的责任感?一切决定于多种情况,如决定于个人或其下一代的社会地位得以改善的可能性。

非特权者在什么时候认为只有采取暴力手段才能得到公正?在这里还是不存在符合一般规律的判断,对暴力倾向占上风或谈判倾向占上风的不同情况,人们不可能加以概括。一切可以抽象表达出来的就是一句话:惟独暴力行动才有远大前景的信念在一个世纪前比今天更为流行(在西方)。最高暴力的体现就是全面战争,这在五十年前仍是工人的伟大幻想,这个幻想已完全消失,或者因为人们承认它无效,或者因为以革命获取全面胜利的梦想完完全全过时了。

第三个也就是最最重要的条件是,一个阶级——这里具体指的是工人——的成员认为他们的阶级有一种惟一的命运,它只有改变整个社会组织才能完成它的使命。这等于说当阶级对自身的认识具有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时候,就存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自此,问题就以如下的形式提出:社会各集团

---

① 也许应该写"曾经认为"。

在什么范围内趋于接受阶级斗争思想？在这一点上，我想同你们谈几句，我把农民的行为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觉悟相比较。

由于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对社会的态度，他们构成的集团与其他集团的区别比工人更大；他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集团。此外，农村曾经常常是阶级斗争的舞台，但是斗争的关键问题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说的**消灭**私有财产，而是**分享**私有财产。人们在二十世纪见到的伟大革命都与土地问题引起的动乱有关，起因都是反抗"封建主"或大土地所有者。在这个意义上，农村阶级斗争的目的是夺得而不是消灭私有财产；大、中、小土地所有者之间展开的斗争纯粹源于农民是很罕见的。当然，当农村的一小部分人占有太多土地的时候，人们能观察到阶级斗争，中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是虚构的。但是像在1928至1930年间苏联农村发生的那种斗争则是从外部引入的。政府想要让小土地所有者起来反对中土地所有者，以便实现集体化。自由散漫的农民很少心甘情愿地倾向于消灭他们自己拥有的私有财产，他们担心土地私有的原则本身会成为问题。对于农民来说，第二个条件常常得到实现（他们认为暴力是有效的）。相反，第一和第三个条件很少被完全实现。农民通常都认为他们的命运决定于他们个人的努力，而非仅仅决定于他们阶级的命运。他们对阶级的统一行动只是具有极其薄弱的意识。

至于工人阶级，它曾参与并继续大规模地参与个人之间和集体之间为分配国民收入而展开的竞争。工人过去并不总是，而是有时趋于使用暴力和信仰阶级理论。他们直接与雇主接触，他们意识到构成了一个性质相当统一的集团，最后，他们可能认为是少数人掌握了他们的劳动工具，这个事实决定了他们悲惨的生活条件。进行一场革命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观念存在于工人阶级身上，不可能存在于其他地方；这种占有方式似乎

对工人,惟有对工人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所以,人们以前往往见到工人暴力现象,但是直至目前,从来也没有在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发生过成功的工人革命。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暴动总是产生于一些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并与农民运动结合在一起。我们将有机会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完成过一场与它公开主张的思想相符的革命,尽管它比其他任何阶级都在思想上更具有阶级意识。

我们现在对这次分析作结论。说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因阶级斗争而处于四分五裂,从什么意义上讲这是正确的?说这个社会是"矛盾"的,从什么意义上讲这是正确的?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应该**经历个人之间和集团之间的持久竞争,因为它把经济现象放在首位,所有关心自己收入的个人都不得不组织成集团自卫,确信组织起来可使他们得到集体收入中更可观的部分,并确保更好的劳动条件。最后,工业社会创造这种竞争,因为集体财富应该正常地逐年增加,而每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或政治斗争作出努力以争得一份持续增长的财富。至于通过暴力或者为了彻底改变社会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它在某些情况下出现,在某些情况下则不出现。列宁在一本题为《怎么办?》的书中对上述两类斗争作了最好的解释。

在当时,社会民主党既是改良主义者又是革命者,它接受阶级斗争思想,但认为工人组织同时应该改善当时社会中的工人劳动条件,扩大他们在国民收入中获取的份额。它没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经济斗争和推翻该社会的未来革命之间存在着矛盾。让我们用帕雷托的话来说: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为了无产阶级而争取最高实利与争取无产阶级的实利是吻合的。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做到了尽可能提高工人的收入,那么作为组织起来的无产者,它也就是在为有朝一日夺取政权作准备。

经济斗争被看做与政治斗争不可分割。

列宁在1903年发展了造成第二国际过渡到第三国际的思想。他痛心地发现，工人和工会关注于改善他们的眼前境遇，不关心根本改变社会组织，在他的心目中，这种改变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劳动者希望为了自己得到最高实利，在关于他们阶级的实利方面不抱有与列宁相同的观念。由此，列宁得出的结论不是工人阶级肩负革命使命的思想有错误，而是工人运动领袖，即主要是职业革命家和知识分子，应把说服工人将最大限度提高眼前收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利益作为自己的职责。我对这个政治结论不作判断。如果人们认为一党领导下的计划经济制度与收入分配决定于集团间持久竞争的制度相比，前者更可取的话，得出列宁那样的结论就是正确的，也就是最好激励工人不要为当代工人的眼前利益而牺牲工人阶级的最终利益。这是在一定方式上又重提在代与代之间作选择的问题，对此我们在涉及一切经济政策时曾经评论过。或者问题还在于在工人的当前利益和理论家构想的工人阶级或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

我个人想从这个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的改良主义斗争与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但是为了改变社会的政治革命斗争，尽管按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而言是可能的，却不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斗争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工人看到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很像马克思提供给他们的形象。在企业内部体验到的"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劳动者和领导者的对立可作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专断而拥有特权的领导成了所有不幸的责任者。因此个人和集团的正常竞争有可能借助于集体心理现象过渡到马克思含义上的阶级斗争，而这种斗争不是社会结构所固有，而是发生在某些条件下。

剩下几分钟用来为分析苏联社会作个引言。我现在就提出研究该问题的困难:我只是从书本上了解研究对象,使用的方法有一点像我了解一个古代社会那样,而我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有直接的经验。另外,以往对苏联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从事得很少。大部分论述此问题的著作不是大加赞赏就是发泄仇恨。在西方,第二类著作比第一类更多见,但是第一类著作以强烈的热情来弥补数量的劣势。

我首先要讲的是苏联社会学家阐述的两个正统理论。第一个理论认为,在苏联没有阶级,尽管极其明显地存在职业、收入和威望的差异。第一层意思是,这个论断等于肯定每人的状况完全是个人性质的。尽管有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还有工头、工程师和企业领导,但在这样的状况下,职业、收入和威望与个人相连,而非与集团相连。第二层意思是,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不同将趋于缩小,因此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个人现象,而且是过渡现象。无论在个人的还是在过渡的形式下,理论都不可能真正站住脚。自然,每个人在苏联社会中的境遇同在我们社会中一样,部分地决定于个人的劳动和成功。另外,苏联的社会流动很大,这是确凿的事实。有鉴于此,个人命运和阶级之间的利害一致就可能显得薄弱。显而易见,并不因此在苏联就没有在生活方式、收入、威望方面有差异的不同集团。今天,这个事实已被苏联理论家,甚至正统的理论家所接受。他们宣称,在苏联有两个主要的社会阶级和一个阶层(它不是阶级)。这第二个理论是去年在国际社会学代表大会上以如下方式得到阐述的:人们可区分出工人和农民,前者在生产资料属于集体的企业中工作,后者自己拥有土地,不在集体所有的财产范围内工作,因为他们组织成合作社,即集体农庄。两个阶级由于他们同所有权的不同

关系而存在差别。然后是第二个集团，在阿姆斯特丹，我们的苏联同行把它称做阶层，即**知识阶层**，它由企业领导、技术人员、工程师、专家和一切构成工业社会管理人员的人组成，这个阶层的人数不断地扩大。为什么不称它为阶级呢？你们能猜测到。如果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标准，知识阶层同所有权的关系和工人是一样的，本不该构成一个有别于工人的阶级。然而，由于观察者感到两个集团的状况在众多方面是不同的，所以他们使用了另一个概念

第七讲

苏联社会中的阶级关系

在上一讲的最后几分钟里，我向你们介绍了苏联社会学家自己作的划分。他们区别出两个主要阶级，一个是使用集体所有的工具从事工作的**工人**组成的阶级，一个是使用合作社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集体农庄庄员**组成的阶级。此外，他们还分辨出一个社会阶层，由苏联社会的知识分子、经理、高级官员、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知识阶层**。

首先我想让你们看几个数字[①]。苏联官方出版物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统计数字——一种针对集团，家庭也算集团，工人阶级占全民的44.2%（其中有7.4%的农业工人），集体农民占41.2%，最后，知识阶层占14.1%。因此，产业工人阶级占全部人口的36.8%。就业人口的统计数字就不同了。工薪阶层在全体就业人口中占56%，农业合作社成员占30.1%，参加合作的租地农民占7%，参加工业合作的为2%，在服务部门和工业部门从事工作的占4.3%。如果我们采纳这些数字，那么农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拖拉机站——劳动力的比例将略低于一半。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将稍稍超出一半。

对苏联社会学家采取的这种划分，西方人提出什么论点加

---

① 提醒一下，这些数字是1956年的。在这一章末尾的一个注释里可找到更近的数字。

以驳斥呢？首先，参照独一无二的所有权标准，作为社会阶层的知识阶层概念不言自明地构成对阶级分析的一种反驳。如果苏联人遵循他们的学说，知识阶层同雇用劳动者一样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本应与后者同属一类。然而实际上，社会学家确定了一个特殊的类别，恰恰是因为知识阶层和产业工人的生活方式、收入和行为迥然不同，以至人们无法把它们两者归于同一个集团中。我今天无意向你们解释收入分配情况，然而我想使你们对存在于苏联底层和高层之间收入差距之巨大有一个印象。在那里，一个雇用劳动者的月薪过去往往不到 300 卢布，近来仍然如此，平均收入大约 600 卢布。一个大企业的厂长或一个部长的月薪可以有好几千卢布。极少一部分特权者的年薪高达几万卢布，还不算以实物形式获取的优惠，如别墅或汽车。收入或者待遇的等级从一至二十或四十，与人们在美国看到的差距类同。最近我找到一些令人震惊或至少是有趣的数字，可形象地说明在两个时期美国人收入的差距：1900 年，卡内基先生——那时他尚未以自己的名字设基金——免付税款的年收入有 4000 万美元，当时的工业部门内，平均底薪大约是 400 到 500 美元，卡内基先生的年收入相当于 10 万个美国工人的收入。现在的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先生从前是通用汽车公司经理，他曾领取美国最高薪水，即 62.6 万美元，国家从中扣除 46.2 万。当时美国工人的平均收入是 4000 到 5000 美元，由此得出的结果是：1952 年，查尔斯·威尔逊等于 42 个工人，或者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他的薪水相当于 42 个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因此工资差别幅度极小。我补充一点，要考虑的收入不应是**薪水**，而是**利润**。在美国，资本的收入是添加到工资里的（但在苏联几乎不是如此）。在某些领域，苏联的工资差别幅度比美国大。最特殊的例子是军队，美国普通士兵和将军的薪金差距在四五倍之

间;在苏联军队里,普通士兵的年饷低于1000卢布,将军的薪金则超过10万卢布。我对这样的对照不作评论。有很多理由可为这个理论进行辩护,诸如关键问题是有某些出色的将军,究竟支付给他们多少薪金是次要问题。无论如何,在苏联这样一个国家里的待遇差距必定使人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所有权方面的差别不再存在,收入的差距也不会消失,随之生活方式和威望方面的差距也不会消失。

西方人提出的第二条反对意见如下。让我们假设明天农民不再是合作社社员,变成了雇用劳动者,如同他们在国营农场中的身分那样,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并不因此就与工人相同。两个阶级的不同不仅是由于集体农庄的所有制是**合作性质**的,而工业部门的是**公有制性质**的,同时还由于劳动方式的不同,随之生活方式的不同所致。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的第三条反驳意见关系到阶级内部的一致性。譬如在工人内部,是否不存在足以妨碍人们把他们视为统一整体的生活方式上的区别?最后,我们将要详尽考查的第四种批驳是针对一个基本判断:苏联的阶级关系是否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阶级关系,关系是友好的而不是对抗的?

我们现在来谈谈由西方社会学家阐述的有关苏联社会的理论。第一条也是最简单的一条理论断言,对这个社会的划分方法不同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划分方法,是将它分为两个最基本的集团,一边是人民群众,另一边是精英人物。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特别是托洛茨基分子曾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详述过类似思想。苏联社会可能是一个阶级社会,在那里,官僚剥削群众,就像西方社会的资本家一样。

两个社会的这种相似性向你们指出，上面两种理论[1]在我看来同样令人满意或同样不令人满意。它们具有相同的说服力和弱点。如果人们想说苏联社会领导者的收入比劳动者高，但他们的生活费用可能较低，不容置疑这是有道理的。说给予苏联特权者的酬劳是与苏联经济运行状态相应的最低收入，那不确凿，给予威尔逊先生的薪水等级也同样与通用汽车公司的运行状态不匹配。如果从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推论出苏联或西方群众贫困的原因是部分国民收入被剥削者——那边的官僚或这边的资本家——消费了，那么从总体上说，在下面两种情况下，理论都应该说是错误的，而非正确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尤其决定于国民收入在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分配状况以及苏联的劳动生产率。一般的贫困现象主要归因于农业搞得很差。作为剥削者的官僚阶层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对立更多是政治性的，而非社会性的。这种对立也许在苏联比在西方社会更为尖锐，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粗略地描绘都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

西方社会学家阐述的第二种理论企图在苏联社会里也找到西方社会存在的三个典型的阶级，即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如果说这个理论对西方社会毫无价值的话，在苏联就更谈不上价值了。并非因为没有一个上层阶级，假如人们执意说没有，而是因为在苏联比在美国更难以找到一个或多个中产阶级。谁也不知道这三个集团是否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以及每个集团是否真正代表一个真实的共同体。

因而我认为采取某些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的另一种三分法更为可取：三个集团可能是工人、农民和知识阶层。美国社会学家

---

[1] 两种理论都强调剩余价值的事实以及对它的分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符合马克思主义。

采纳这个理论，并增添了另一个阶级，叫强制劳动者阶级[1]，对其人数有各种估计，我对这个阶级将不作任何评论。他们还力图在三个主要集团内部划出阶层。譬如，当涉及到知识阶层时，他们力求区分出当权者、高级知识分子（大企业经理）和中级知识分子。

这样，在分析苏联社会时，人们最终发现我们在分析西方社会阶级时注意到的同类问题：知识阶层是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吗？它被细分到什么程度，而成为多个等级？这个特权集团对自身统一体的意识达到什么程度？是否存在集团内部的分层现象？人们是否能够确定苏联社会等级的不同层次？

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它是由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作出的。他从第一个阶级即领导阶级开始，把它分成三个阶层：党政领导者、知名人士和政党常设机构人员。接下来是第二个阶级，被他称为工人阶级，他以如下的方式对之进行再划分：上面是中间商或供货人（在苏联起某种作用的特殊类别，它向企业提供它们所需的原料和劳动者，游离于计划之外），接着是中级知识分子，中级职员，然后是中级技术工人，接下来是中农和非技术工人，最后是贫农。第三个阶级是关在集中营里的人。这样的排列使你们有一个印象，从中得知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构思苏联社会阶层的一般理论是什么内容。它没有给我们带来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首先我们缺乏通过实际考查进行研究来弄清事实，也就是说来回答下列问题：在社会等级中，苏联公民把职员放在技术工人之上还是之下？谁都不知道。甚至不能肯定有关人会自己向

---

[1] 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消灭了强制劳动者这个阶级，从1956—1957年开始，这个做法又流行起来。

自己提出这个等级问题。即便他这样自问了，可也没有社会学家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况且，苏联的阶级现实比西方社会的更加含糊不清。苏联的各集团几乎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因为缺少两个必要条件：**结社的自由**和**从职业角度关心社会划分问题的社会学家的存在**。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共同体的构成条件是，个人必须有可能自由议论和结社。没有这些自由，党员或官员就难以知道他们是否组成了一个统一整体，因为问题本身就脱离现实。苏联式制度的实质是拒绝考虑各集团是否意识到自身存在并不同于其他集团。究竟有两个还是三个阶级以及在每个阶级内部有多少阶层，我担心为了弄清这些问题而展开的讨论不能引起人们兴趣，也许还毫无意义。人们可以说苏联人的收入、生活方式和威望之间有巨大差距。这些差距以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方面表现在阶级内部的分层上，大的线条是清晰的，而细分则会模糊不清，另一方面表现在大集团的划分上，主要集团似乎由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知识阶层构成。

不管怎样，让我们回到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中能引起人们兴趣的部分：在什么范围内，一个苏联式的工业社会包含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阶级关系？公民们在各种不同职业岗位的分布状况在这两种社会里以同样的方式在发展。随着经济的增长，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下降，工业和第三产业劳动者的比例上升。在苏联社会和西方社会里，工人在不同职业中的比例是不完全相同的，但是劳动者的分布状况基本上可以类比。我们大家都知道，最重大的差别与所有制有关系。

取缔私人占有制度在不同产业部门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在农业部门中，它意味着除了拥有一小块个人的自留地，农民变成了农业企业或为集体农庄提供机械化服务的拖拉机站的雇用

劳动者[1]。在工业部门中，不再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只有管理人员，究竟这两者有关键性的差别还是微不足道的差别，要依据人们对此问题的设想和人们公开宣传的思想而定。最后，在知识阶层中，像西方社会里那样的自由职业者不再存在。有法官、医生，但他们是某个公共机构的被雇用者。苏联式社会的诞生导致无产阶级身分的普遍化，如果这样来称呼被雇用者的身分是合适的话。独立经营者不再存在，在农业中，作为私有者的农民变成了集体农庄庄员；在商业中，商品分配成了国家的事；在知识阶层中，自由职业者变成了被雇用者。

这个现象是令人吃惊的。的确，根据马克思对经济发展所做的描述，应该是资本主义本身使无产阶级身分普遍化，并渐渐地消灭独立经营的中间商人，这些人既不能归入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一类，也不属于被雇用者行列。但是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导致这样一种简单化现象的出现。所以说苏联式革命的目的，或其作用，或其结果就是完成普遍无产阶级化，这是人们原本期待由资本主义来完成、而它却执意不完成的事。

请务必注意！我不说把私有者农民变成集体农庄庄员是好事还是坏事；设想合作管理的效率优于个人企业，这种情况不少见。在法国，人们就想像在国内的某些地区，以农庄取代个人占有将会带来富足（显然，条件是农民接受合作）。我所说的归结起来是，一个苏联式的社会几乎使被雇用者的身分普遍通用，依我之见，这个判断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人们从定义上就排除了个人所有，不仅是对工业中的大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且甚至是对土地的占有。

蒲鲁东晚年时曾预见了这场革命的某些后果。因此革命不

---

[1] 从那时以来，集体农庄获得了农业机器的所有权。

可能不增加个人对集体机构的依赖性。合作劳动者失去了私有者农民面对国家所享有的一定自主权，从而服从于集体农庄的行政权威。而集体农庄自身又依附于拖拉机站，在后者被取消之后，农庄要听命于行政指示和计划指令。苏联式制度带来了变化，变化的性质说明意识形态所起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如果人们能够像我刚才那样自由发表意见，他们就会对革命的功过提出疑问。然而他们不得不以消灭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来确定苏联式社会特有变化的性质，甚至因此而不得不宣告阶级调和。

上个星期我力图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集团之间或阶级之间斗争展开的情况。我现在提出的问题至关重要，这就是：从什么意义上说，苏联式社会避开了我们认为在另一种社会内观察到的对抗？依我看，答案来自于经济增长的理论。

去年我们指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全体民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与集体财富的增长是同步的。或者也可以通俗地说，增加每一份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蛋糕做大。我还要加一句：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从长远看，在一个工业社会里，大家最终都从经济增长得益。这个判断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我说了从长远看，而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凯恩斯勋爵的决定性论断："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翻译过来是："从长远看，我们都是死人。"向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解释说他们之间没有根本性冲突，因为半个世纪之后，他们都将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这个判断对理论家来说是不容置疑的，对实践家来说却是没有说服力的，而我们都是实践家。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是造成竞争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一样，个人或集团在给予农民多少份额以及给予工人多少份额的问题上展开争论，或者还在工资等级、各种产

品价格水平的比较诸问题上产生对立。我们来看一下苏联的工农关系：如果计划部门决定提高其购买农产品的价格，同时保持原有的间接税，它就必须降低工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让我们假设苏联工人的工会同农民的代表进行讨论，他们的讨论方式有可能同资本主义社会里发生的一样，只有一点除外：问题的已知条件在苏联社会里可能更显而易见。

我们的判断是，在集团之间不存在长远的和最终的利益矛盾；但在所有工业社会中存在众多争论的起因。这两个判断一旦被确定下来，我们就要观察在两种社会的阶级斗争发展状况之间的真正差别。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集团的利害一致在事实上达到最高程度的时候，对冲突的意识也就格外地强烈**。历史上最激烈的冲突是在工人和雇主之间爆发的。表面上，争执的焦点在各自的工资和利润份额上，工人可能难以没有这样的感觉：一切归于利润的部分是对工资的榨取，或者相反。当然，在企业内部，集团感受到利害一致的情况在今天已较少见，无论如何，这不是常见现象。然而对国民收入分配进行的研究使人看到，工人和企业主通常在同一时期都受惠。工资的增长非但不必然以降低利润为条件，而且一般来说两者还同时提高或降低。因此出现了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中利害冲突的表象往往揭示了现实。实际上，雇用者和被雇用者之间的斗争一方面归因于一种结构性因素，另一方面归因于两种因情况变化造成的原因。结构性因素指的是，在很多国家，工人的确认为利润原则本身是不公正的。这种感受不可能仅仅因为如下的论据而烟消云散：从长远看，所有劳动者将从经济发展中得益（这种冲突原因在苏联式制度下不存在）。撇开这个恒定不变的事实不谈，雇用者和被雇用者之间的冲突在两种情况出现时是异常激烈的。首

先是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期，即价格迅速变动时期，看到自己工资的真正价值降低的工人将会起来请愿，而且往往遭到其雇主的拒绝；同样，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遭到失业的威胁。造成冲突的第二种情况变化是企业的技术重组。在历史上，这是引起最尖锐斗争的原因。确实，这个现象导致一定数量职业的消失，它意味着或特别在上个世纪曾意味着部分工人被解雇，企业主不再可能雇用他们，因为他们在新的组织结构中不再有用处。失去饭碗的工人起而反对机器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在历史书中你们都看到过工人起来反抗最初出现的机器，反抗今天人们所称的企业技术重组或者某个政治家所称的"转产"。转产在政治纲领中是漂亮的辞藻，对经济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但它常常引发紧张关系。

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集团，它们的利害冲突不那么激烈，但更加错综复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财政对一般人来说几乎不可捉摸。即使职业经济学家也不总是有能力以确定的方式为所有人或为每个人预测最终结果。譬如，当工会争取到了普遍提高工资时，谁也不可能既精确又肯定地说出最终由谁支付增加的部分，以及从哪些收入中抽取这部分。名义工资的提高总是在一年时间中以购买力的上升表现出来，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因分配国民收入而引起的冲突事实上不同于冲突的表面现象。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变化的受害者难以知道谁是他们不幸的罪魁祸首。支持布热德运动[1]的商人揭露财政稽核和税务机关，把往往由经济发展本身造成的困难归咎

---

① 布热德运动：1953 年法国人布热德（Pierre Poujade）创立"法国保卫商人及手工业者利益联盟"，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担心经济结构的变化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反对经济和税务检查，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译注

于政府部门。因此，为了知道如何在心理上形成了冲突，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地说，如果独立经营者受到无产阶级化的威胁，他们倾向于指控有权势的人或税收制度；工资跌落到比工人收入还低的雇员不会汇合到无产阶级组织中，相反还会揭露它们。至于农民，他们更加没有能力确定生活水平相对下降的原因所在，这种下降甚至发生在美国，在那里，一个农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比一个工人的平均收入低得多[1]。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是复杂的，因为国家财政不可捉摸，因为各集团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达到它们的目的，因为变化并不是任何人有意所为，而遭遇不幸的人又不得不找到承担责任者。

那么苏联式制度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国家有意识地为最重要的决定担当责任，是它来决定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和消费的部分，是它大致确定集体财富怎样在各集团中分配。左右所有人和每个人生活的决定由国家做出，这样的体制很难接受个人对集体意志（或所谓的集体意志）提出异议。这些重大选择受制于一种正统观念，这是方便易行的。关于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分配问题，在公众中对此展开讨论的做法直至目前从来都没有被接受过。如果人们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就会指责计划经济的重大方针。人们就什么问题展开讨论呢？答案很简单：就具体问题。

在苏联社会里，攻击集体农庄主席或企业经理是完全合法的。自我批评和批评是被允许的，是这个制度的一个主要方面。

---

① 平均收入数字在美国农业中没有多大意义。它得自于富裕的农民和无劳动效率的农民两者收入的平均数，前者靠的是大规模经营和国家在价格上的支援，而国家的这种支援却挽救不了后者。

在任何国家都不存在人人对一切都满意。必须给人留出发泄的地方，给苏联公民争论的可能，即使不对制度，至少可对社会实践提出异议。请你们打开苏联的报纸：一个企业的领导被指控没有执行计划，工人指责工会书记或会计没有很好履行职责。争论永久地持续着。但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这里的情况是，人们不仅对雷诺公司或雪铁龙公司的管理，而且对私有制的原则展开争论；那里的情况是，人们不容许对根本原则提出异议，因为原则是确定社会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官方思想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一切制度下，保守派支持个别的改革，革命派则倾向谴责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好的保守派会说这样的话：私有制极好，但某某先生是一个坏老板。在法国温和派的所有报纸上，你们将会找到针对某个人或某项措施的特定批评，这是聪明的保守主义的自然表现，是对现行制度的最出色支持。在苏联式社会中，聪明的保守主义者有同样的做法。但是这里指的是老革命者，是当前社会的拥护者。他们的做法类似法国的右翼记者，不攻击集体所有制，但是指责某企业的经理伊万诺夫先生。社会的本质是经久不变的：众多现象在各种社会中会重复出现。

由于这一讲快接近尾声，我想以我两天前在一份晚报上看到的一条新闻作为结束。事情关系到哥穆尔卡制度下的波兰。这份报纸的记者对波兰的政治场景作了一个描述，按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养成的习惯，他从右转向左。他把纳托兰集团即纯粹的斯大林派集团放在极右翼。这样，反对前斯大林主义的人从右变成了左，变得越来越辛辣。这个细节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就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在一份观点正统的报纸即左派报

纸上,人们把词的表面意义颠倒过来了。这是第一次人们不把接近斯大林主义而把远离它的人定为左派。在这种颠倒中,我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至少证明辩证法不姑息任何人:改变立场是再容易不过的事,甚至对于辩证论者来说[1]。

---

① 根据苏联的一项研究(《哲学科学》,1963),工人和职员在1962年占就业人口的73.6%,集体农庄庄员和合作经营的劳动者占26.3%。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计有2049.5万人,相当于全部就业人口的20.7%。(据作者说,本注释是对本讲第一个注释的补充。——译注)

第八讲

从社会阶级到政权

上一讲，我研究了一个苏联式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我很快地回顾了主要理论，然后得出了几种看法，现在我来概括一下。取消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使雇用劳动者的身分普遍化。集体农庄被国营农场所取代以及合作经营者变为农业企业的雇用劳动者，这样，就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和所有权的关系来说，全体劳动者的身分已完全趋于一致。社会差异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因为不是所有差异都出自于这种关系。关于阶级对抗，我强调在一切工业社会中，从长远看，经济增长最终对全体民众是有利的。但尽管有增长，还是存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冲突，无论是当前的还是潜在的。最后，我让你们注意到，一切地方的保守派即主张维持现存制度的人都倾向于把申诉、请愿或批评限制在局部和个别人。然而我们注意到两种社会在这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保守派更喜欢不对私有制原则提出异议，但不禁止革命派对之进行争论。相反，在苏联式制度中，官方思想体系不在争论之列。它断言既然领导者是所有个人的代表，因此大家便都承认领导他们的人体现他们的意志。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无产者就不能举行罢工和起来反抗，因为他们罢工就是反对他们自己，抗议就是针对他们自己的政权。思想体系在苏联式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因为在苏联式社会里，原则的不容置疑是制度本身的组成部分。

在一个苏联式社会里，各集团为争取尽可能高的收入而进行斗争是正式被禁止的。集体农庄庄员和产业工人都无权结社和请愿。更不必说把为最大限度提高收入而展开的竞争同为改变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斗争混同起来，在理论上这不可能出现于苏联。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把这种混同叫做阶级斗争。因此，依据这种思想体系，阶级斗争在苏联式制度中是不可设想的。但是问题实际上也提出来了：现实的制度在什么程度上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我把这个问题分成三个小问题：

一、群众在什么程度上把统治他们的人视为他们的代表？

二、各集团在什么程度上甘愿同意计划部门在集体财富分配上武断作出的决定？

三、在什么情况下存在经济请愿和对制度质疑之间的混同？这种混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本质。

对这类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是不大可能的。为了确实地了解生活在苏联式制度下的人是怎么想的，必须不采用我们刚才所描绘的那种思想体系。按规定，人们不能进行调查，来询问苏联工人是不是认为他们自己就是制度的主人，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属于异端。谁也不可能说出在苏联公民的顺从中哪些是屈从的成分，哪些是热烈拥护的成分，哪些是习惯成分，哪些是害怕或信仰的成分。我们得到的印象可能是不完全的，因为人们都必然明确地表示拥护制度。

我将采取另一种更谨慎的方法，其目的不在于解决表面的问题，而是着眼于人们确实起来反对苏联式制度这样的情况，我们将看到抗议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这样，当这场斗争显露出来时，我们就有可能弄清楚它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对工业城市工人的情况和农民的情况加以区分是恰当的。当工人在柏林、在

一个波兰城市或匈牙利城市起来抗议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出发点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斗争极为相似，示威者完全不指责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原则，而是针对这样那样的生活状况或劳动组织方式。在柏林和在波兹南，骚乱的原因是定额的提高。确实，在苏联式社会中，工资的确定一般是根据某一种被视为定额的产量，因此提高定额就是降低工资。提高定额就是迫使工人挣更少的钱，或者为了挣得同样的工资而强迫他付出加倍的力气。我们最初看到的是我们很熟悉的请愿活动：有关生活条件、劳动组织、劳动报酬的具体而明确的申诉。由此开始，冲突的扩大显然具有某种特定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人们的指控对象远非个别老板或工资不足的时候，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或者对资产阶级加以责难。在一个苏联式社会里，每当我们观察到经济不满扩大到政治请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工人丝毫不责难集体所有制原则（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但是他们揭露制度的特权者。在柏林，一个曾经是工人的部长发表演讲时喊道："我是你们中的一个。"示威者回答他："这不是真的，你不再是工人，你是一个头儿。"在这个具体情况下，工人不认为他们的首领代表他们（我并不从中得出结论，说他们永远不认为领导他们的人是他们的代表）。

当人们从经济不满过渡到政治请愿的时候，就指责不平等现象或领导者的特权。此外人们要求得到马克思所称的表面自由，这种自由在苏联式制度下已经消失，因为在理论上不再必要。德国、波兰、匈牙利工人要求自由组织工会，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要求自由选举。所谓表面上的自由往往对已经享受到的人和忍受不了资本家统治的人来说是不屑一顾的，但在自由已经消失的集体所有制度中却重新获得了

它们的全部价值。永恒的辩证法：人只有当他失去财富的时候才发现他拥有的财富是什么价值。

至于农民，他们的请愿一旦发起，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更为简单，更可理解。在波兰和在匈牙利一样，请愿针对的是集体劳动组织或者集体所有制普遍化的威胁。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特别因为苏联作家自己并不隐晦：农民从本能上是反对集体化的。集体所有制原则被工人接受，或许还与他们的爱好相符，然而它在农村里不受欢迎，因为与那里的所有制不同，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在工业领域中，集体所有制是就生产资料而言的，工人感到这是一种共有制；在农业领域中，必须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而他们几百年也许几千年以来曾热切期望得到土地。

如果这个分析是确切的，那么一旦请愿在两种类型的社会里具体化，经济方面的申诉和对制度本身的指控就可能混同起来。但是因制度不同，人们在这种和那种情况下指控的内容就几乎相反。在我们这里，工人的合理反应在于指责资本家和私有制。在那里，人们的愿望是对领导者的特权而非集体所有制原则提出异议；在农业中则相反，人们对党和集体化都有怨恨[1]。**这种把经济上的请愿和对社会组织结构提出异议——也就是阶级斗争——两者的混同，不被经济制度所排斥，而被苏联式的政治制度所排斥。**

直至目前，苏联式社会一直呈现出一派表面一致的现象。一旦这种一致性突然崩塌，整个制度就暴露无遗。在这方面最令人惊奇的经历是匈牙利事件。一年半以前，从外部看，一切都

[1] 西方的农民难以知道该怨恨谁，因为他们与财产相联系。因此他们抱怨社会、城市、国家、所有人和任何人。

显得全体人民都拥护现制度。然后，在几个月之内，人们不再以纯粹而死板的言辞来表述思想体系，一下子处于分化瓦解的状态，最终又意外地回转到团结一致的局面。事件发生时，大部分可能被视为特权者的人都被归入对立的阵营。几天之内，几乎全民一致起来反对不久前似乎还受到民众支持的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缺乏一致性，各集团可展开经济竞争，不同的民众群体都可表示不满，可对制度赖以存在的根基提出异议。然而，苏联式制度的本质就如我们几十年中所了解的那样是给人以表面一致的印象。古往今来各个时代，人性和社会性的基本特征之一正是集团间和个人间的冲突以及对原则提出质疑，而苏联式制度好像只有在否定这一特征时才能存在似的。它能否容忍对至今都不允许怀疑的下述两个基本要素进行争论？一是由计划部门采取的关于集体财富分配的决定，二是制度本身的官方思想体系。关于第一点，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在苏联，人们至少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总是在讨论计划部门有关财富分配的根本决定。反对公开讨论是因为这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后果。缩减投资部分和增加消费部分是否合适？在马林科夫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时代，人们一旦用这样的语句提问，就会观察到当局把消费部分提高的倾向。越是任凭对基本决定展开讨论，作为苏联式制度特征之一的巨大的投资系数就会趋于削减。这就等于说，计划的选择越少违反公民的自发愿望，人们越是容易允许大家对其选择提出异议。人们越是接近某种消费经济或福利经济，就越能容忍不同意见的论战。相反，人们越是想保持高投资率，就越会缩减消费，越是无法容忍公开讨论长远看来也许是明智的，但眼下却不讨当代人喜欢的决定。

人们是否容许讨论制度的思想体系？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让我们首先把他们学说中的两种成分区分开：

第一种与苏联的实践相符,它是真正发生的事的理论化,经常能够成为讨论的对象。比如,一种日常的说法是:"干部决定一切。"这要归因于斯大林本人,他想强调领导和技术人员在工业建设和集体所有制中的决定性作用。肯定他们在社会中应该具有与他们的职务相当的地位就是为了证明实践的正确。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人们捍卫和阐明这样一种理论以及驳斥反对意见。同样,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人们对追求平等是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这样的判断展开讨论。在苏维埃制度建立的最初年代,共产党员没有权利获得比技术工人更高的工资。从1929和1930年那时开始,也就是从五年计划实施开始,工资等级变成官方学说。如同一个英国记者(《经济学家》杂志的)断言说追求工资平均化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偏见,苏联的理论家则揭露追求工资平均化是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人们可以自由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因为实践是合情合理的,而理论是反映实践的。同样,有关家庭生活以及共青团(带政治色彩的童子军在苏联的叫法)的社会和道德思想体系能够被设计出来、加以论证或遭到非议,但是对制度都没有妨害。

对于一系列被称做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则是禁止讨论的,这就是他们学说中的第二种成分。实际上这是一些斯大林式的、人们能证明其错误的论断。比如说资本主义制度中群众的生活条件不断恶化,这个判断属于官方的思想体系。这样一个判断显然是错误的,这一点人人皆知。以波兰为例子,一年以来,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重新获得了讨论问题的权利,他们到西方旅行以后立即断言,上述判断应该加以修正,因为以这种形式表达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我还想到了一些同样类型的判断:西方的制度现在或将来会因其各种矛盾而瘫痪。在去年的课中,我分析了大量西方经济的矛盾,稍加想像,我还可以找到

很多其他的矛盾。说西方经济不能运转，这是与事实背道而驰的；说在某个时候它将不再能运转，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预言。另一个属于今天官方思想体系的论断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决定于所有制形式。……仅比较一下苏联、美国和欧洲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就足以知道在这两个因素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请好好领会我的话：人们有理由把苏联式制度看做在某些方面等同于或优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我将列举几条理由说明，一个智力健康的人可能拥护苏联式制度，但同时对官方思想体系置之不理。

人们将首先赞赏消灭工业领域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优越性。只要工业资本家存在一天，工人就不可能没有受剥削的感受。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至少是消灭了引起冲突的精神因素，对此你们应该予以承认。此外，这对计划经济十分有利。当国家变成生产资料的绝对主人时，它就有能力确定优先发展什么。我曾力图向你们说明，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最重要的关系到集体的决定不是任何人能作的，它们是个人主动性造成的远非有意的结果。相反，一个集体化的社会允许领导者制定总体计划、确定发展速度、更迅速地发展被视为对集体的强盛必不可少的产业部门。人们甚至可以在理论上进行构想，制度的作用是优先发展对所有人的福利直接有利的部门，但是这样的设想会引起一大堆问题。

苏联式制度呈现的另一个重大优越性是社会税务制度具有透明度。这样，你们能够解释清楚你们给予较少的工资收入是因为你们决定较多地投资。大家都明白制度运作的情况、分配的目的。相反，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大部分再投入所必需的资本是通过个人收入体现出来的。群众的不满一下子就会集

中到利润上,忘记了利润的功能[1]。

为什么苏联式制度不满意这些合乎情理的论证(人们还能够找到很多)? 为什么它不接受对两种制度的利弊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辩论? 人们可以把两种制度看做工业社会的两种模式,可以通情达理地、诚心诚意地比较每种制度的成本和利润,为什么这样的讨论、这样的分析方法和论证方法对苏联理论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对一个于苏联式制度本身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他们早有预先的答复。制度赋予自己某种万能的使命,它期望成为人类的最终制度或至少是通向最终制度的不可避免和不可缺少的阶段。显而易见,客观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抱负是没有根据的。我不说这个制度比另一个制度更糟,我是说它只是各种可能存在的不同工业社会制度中的一种,仅此而已。把它同其他制度相提并论,显然就是对斯大林模式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论断的驳斥,这个论断认为苏联式制度是通向最终制度的惟一道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未来的现实。

这种分析方法也对整个思想结构的根基提出异议,人们难以把绝对权力建立在一些只具有相对价值的论据上。几十年之后,人们将会展开辩论以确定两种工业发展模式的利和弊。无论最后的答案是什么,理论的核心部分将失去,这就是对党的领导人所宣称的绝对权力的证实。为了使党的领导拥有今天他们掌握的自由决定权,他们所构想的未来历史远景必须是一个绝对有效的制度。苏联式制度可能以多种方式发生变化,它每天都在变化,而我们,生活在西方的我们,期待的主要变化是他们放弃世界性的抱负,或许那边的领导不能有这样的期待。

---

[1]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甚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由国家分配剩余价值优于借助于个人收入进行分配。

实际上，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只有一种重大论战，永远是思想观点的冲突。对工业领域集体所有制具有优越性的看法，我们随时都接受，对农业领域的情况，我们有更多的保留，但是这里指的是可加以讨论的组织方法。分歧的根本在于他们希望自己的制度具有普遍价值，并且是未来的现实，而我们至多同意它是多种可能存在的制度中的一种。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讨论不同制度各自的优点，从莫斯科的角度看已经是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了[①] 但是从巴黎的角度或至少从巴黎大学和这个阶梯教室的角度来看，企图把一种制度定为普遍有效的制度和通向人类未来的惟一道路，这是荒唐的狂热崇拜。对话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如同所有的历史对话一样，因为按我的意思，缓和的条件是我们的对话者接受同我们处于同一水平上，并放弃他们追求的绝对特权。然而他们不可能向我们作这种让步而又不彻底改变他们自己的制度。

如果这个分析是恰当的，**我们先后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式社会的阶级对抗问题会引向一个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确实，苏联式思想体系中最必不可少、最站不住脚的论断是把群众和国家混为一体。马克思的一些语录将可对此加以证实。我首先引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的一段话，他把行政权力描绘成“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这就是马克思要杀死的怪物。我再给你们引另一段话：“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

① 在巴黎，非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带火气地讨论了《工业社会十八讲》，在莫斯科，一份报纸在1963年以最标准的斯大林式语言对我极尽谩骂之能事。

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马克思主义者的意图不在于攻克国家,而是首先夺取它,然后消灭它,消灭它是可能的,因为国家仅仅是一个阶级赖以维持统治和剥削的机构,仅此而已。马克思说,因此直到有一天不再有一个阶级剥削其他阶级的时候,也就不再需要国家。革命之后,国家将消亡,因为它只是为允许剥削而存在的。由此引出向苏联的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国家怎么没有消亡呢?

对这个问题能够有各种答案,可以把革命不是世界性的、外部还有资本主义国家这些事实作为理由;可以说还存在对抗的阶级;还可以说无论社会关系怎样,关系到集体利益的职责应该有人担负,因而必须有公务员,人们把担当这些职务的人组成的集团称做国家官僚。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是引出政权问题的第一条路径。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是有道理的,如果这个权力只是阶级冲突的体现,别无他用,那么两者必居其一:或者国家应该在革命成功后消亡;或者它继续存在,如果这样,那是因为还有对抗的阶级。不管怎样,我们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苏联式的社会中,不再存在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确定的阶级,那里的政权究竟是什么?

第二条引出政权问题的路径是经验社会学。我确实已经以含糊的表达方式提到过上层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将称它为资产阶级;在苏联社会里,人们通常把它叫做官僚阶层。托洛茨基分子以同样的力度揭露资产者和官僚。不管人们使用的是什么字眼,都会发现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在这两种类型的社会中都有位于社会等级高处的少数人,不仅表现在他们享有的威望,而且表现在他们获得的收入以及他们行使的权力上。当人们说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时,其概念只是使人联想到某种

基本的对立。在我们这边，少数特权者与国家没有紧密联系，他们是个人巨产的拥有者；在一个苏联式社会里，这些少数权贵好像是国家自身的体现。无论如何，经验社会学应该分析这个上层阶级。

最后，第三条引出政权问题的路径是今天被人们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理论。在政治思想史中确实存在一种流派，它把人类社会中人民群众和少数权贵的区分看成根本性的。重要的社会对立是人民和领导阶级的对立。这个理论在大学里不太受欢迎，我想简单告诉你们为什么它遭到一些抵制，这些自认为学院式的抵制反映出某些属于另一种类型的成见。马基雅维利和他的追随者们认为，人类一如既往，掌权的人滥用权力，权力的得益者变了，而行使权力的方法以及权力带来的利益没有多大变化。这种悲观主义的态度遭到有识之士们的坚决摒弃，不管有理没理，他们认为强调个人和集体这种恒定的本性会致使人类失去勇气和怂恿掌权者变得寡廉鲜耻。此外，这种实用的和心理学的理论倾向于以个性来解释社会，它通常会说每个社会是由少数领导者的性格决定的。这种理论有时甚至补充说，缺乏魄力和强暴能力的杰出人物注定要被判处死刑。这样一种历史观必定没有魅力，它不讨人喜欢，即使是那些它所包含的真理部分。我们还要补充的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理论家们是一些政治家，而不是经济学家，他们认为首要的现象是权力，而非所有制。在我们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几乎到处占据优势，甚至在反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是如此，他们显得像异端分子，像不遵循惯例的人，被看做不懂本质的人。不管怎样，这第三条路径把我们带向与前两条路径同样的地方。多次对集团及其冲突的分析都触及了政权问题。工人难道不是掌握了他们曾经在企业内所屈从的政权吗？在某些社会学家看来，由于各阶级都企求

掌握政权，它们难道不是敌人吗？在这种和那种社会里，少数人行使领导职务，他们是谁？他们是如何被招聘来的？人们在这里和那里是否可以找到同类人？

第九讲

分离的领导者和统一的领导者

上一讲末尾，我给你们列出了三条从阶级斗争理论通向政权理论的路径。我还要重提一下，因为这三条道路同时为我们指出了主要的问题。

第一条路径是主张阶级学说的理论家们(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的，他们认为阶级为夺取权力而斗争。由此引出第一个问题：每种制度的特性决定于在那里行使权力的阶级，这是事实吗？第二条路径是经验社会学所遵循的。它在每个社会里都观察到一小部分人处于社会上层，他们担任最享有威望的职务，获取最高的收入。由此引出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不同工业社会上层阶级的特性？最后，第三条路径是关于领导阶级的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到帕雷托，某些社会学家认为所有社会中的主要区分不是社会阶级的区分，而是被统治的群众和少数统治者的区分。由此引出第三个问题：社会阶级概念和领导阶级概念之间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存在什么关系？

为了讲述得更有条理，我将从分析"领导类型"或履行指挥职责的不同集团开始。俗权和教权的区分将作为我们分析的出发点，这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曾详尽阐述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个区分是根本的，因为说到底，为了统治，就必须强制他人或令人信服。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区分永远不会是全面的；确实，如果统治者使用的强制力不同时具有证明其统治合法

件的一定理由，换句话说，如果强制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使其同胞信服，那么谁也无法进行统治。此外，经验证明，掌握教权的人极少完全放弃在必要的时候以强制替代说服的方便之道。人们可以按照社会中确立的一种关系来分析不同社会，这种关系存在于两类少数人之间，一类人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或什么是好的、制定价值等级、传授宗教信仰；另一类人发号施令，因为他们有能力或有权利运用暴力手段。

如果人们使用一位宗教史家杜梅泽尔先生的思想观点，也许能在这两种权力上添加第三种权力。他证实印欧社会是以一种三元区分为特征的，他们是僧人、军人和劳动者。一个社会主要包括三种人：决定最高真理、阐明学说或宗教的人，持有武器进行战争的人，最后是从事劳动使社会得以生存的人。这种区分适合于整个社会，不适合于只占少数的统治者。在劳动被视为主要活动的当今工业社会中，有三种统治职位，即教权掌握者、军权和政权掌握者以及集体劳动领导者这三种职位。由此出发，我将立即提出依我之见可说明民主式工业社会特征的判断：教权、政权和经济权在那里是分离的，因为行使这三种统治权的集团永久地处于竞争状态。

让我们先来看教权。你们知道，奥古斯特·孔德认为革命后的社会是不正常的，因为它们失去了精神上的一致性。不再会存在有可能把人们的精神归为一统的教理。进行一种思想和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使所有个人重新归附于某种被普遍接受的教义。这样的回归是奥古斯特·孔德的目标和理想，但没有被实现。从精神世界的角度看，今天的西方工业社会与十九世纪初的状况相比同样分裂，或许比那时更加分裂。在那个时代，传统宗教企图决定最高真理，即超验性真理，而学问渊博的人依靠科学，两者的冲突，或至少两者的分离，是社会分裂的根源。在奥

古斯特·孔德的眼里有两种真理，宗教的和科学的。然而，由于它们互不协调，由于教士和学者各自代表的两种思想方法在他看来好像不相容，所以他幻想在科学真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教理，以恢复精神统一。一个世纪之后，这两种思想方法依然存在，虽然它们不一定处于冲突状态（在这一点上，奥古斯特·孔德错了），但并不是自发地相互协调。

今天甚至有第三种教权的化身，那就是“群众的领袖”。我用这个词来指政党或工会的领袖，他们掌握某种理论，有时企图传授一种起码能与宗教真理和科学真理相提并论的真理，即使不高于它们。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西斯式的或国家社会主义式的煽动者。群众的领袖并不都掌握某种近乎具有宗教意图的学说，但是拿马克思主义来说，它被某些人解释为与科学真理或宗教真理相等同的学说。也许它同时兼有两者的特点。不管怎样，相信辩证唯物主义的人把这个学说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认为宗教是迷信，无神论是真理，而历史唯物主义应该在将来取代传统的宗教信条。同时，这些真正的信徒把他们的学说同一种严格地确定人类发展阶段的科学真理进行比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是在历史进程中拯救自己的灵魂。人类是在历史斗争中，即通过阶级冲突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可能的话，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一种学说与传统的各种宗教有直接冲突，因为它不承认一切超验性，并肯定人类的命运是通过社会斗争内在地体现出来的。

政权在西方式的工业社会中也是分裂的。确实，掌握政权的人是一些政治家、文职人员、在政党竞争中获得他们同胞选票的活动家。因此他们只有得到其他两类人——军队或警察的领导（传统的军权）以及官员——的支持才可能进行统治。从政的

人需要某种合法地位。他必须依赖于“一种规程”[1]，他被选定的方式与合法选定的原则应该相协调，他必须以此来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在民主社会里，这个原则就是选举。因此政治领袖就是政党领袖。执政的是一些并不能代表全体公民的人，他们充其量只是大部分人的代表。

官员从本质上说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是根据合理性来进行管理的，并声称代表全部集体成员。因此上述两类人物的区分是植根于现代民主社会固有的特性之中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规程”就是选举。选举会导致个人之间和集体之间的竞争。当选者代表选定他的人，即整体中的一部分。因而他不可避免地是“有偏向的”。由此就产生官员和政治家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官员们想考虑的只是整个共同体的利益，在他们眼里，政治家往往是一些令人扫兴的人，是集体中部分人愿望的代言人。因此人们梦想有一种全面合理的、不附属于个别利益或出自竞选考虑的权力。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官员不存在合法的问题，他的职责是服从命令，应该从政治家那里接受命令，而后者则需要有一种公民授权予统治者的规程。一旦出现授权问题，同时就可能产生必然损害公众利益的局部利益。

为了在民主工业社会中执政，文职政治家必须让军队领导服从他们。在西方，搞政变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这是议会民主制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然而，军权的政治干预并非不可思议，甚至在欧洲或美国的工业社会中，我们至少知道有一个大陆，那里存在总统制或议会制，发生政变的次数多少有点频繁。人们看到政变手段的某种合法化现象或

[1] 莫斯卡的用语。（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意大利社会学家。——译注）

者至少变得习以为常了，它不再是一种悲剧事件，我敢于说变成了政党争斗的几乎例行的插曲。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经济权。公民们是政权的主体又是客体。说是主体，是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选举民主制度的文职领袖；说是客体，是因为他们服从国家统治。作为劳动者，工业社会的公民服从于更接近我们称为“集体劳动管理者”的权威。我们发现这个权威有两类：一类是生产资料所有者，通常被叫做资本家；另一类是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你们只要去比扬库尔的雷诺工厂就可看到工人们服从于某个企业主的权威。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集体的代表，他是由国家来任命的。除了接受集体劳动管理之外，劳动者们被归入第二种组织，这是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的组织，其永久目标是请愿。工厂工人一方面被纳入企业的技术官僚等级，另一方面被纳入民主社会，他们隶属于工会或政党，这些组织的职能之一是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进行请愿。

按照这样的分析，我感到主要有如下几类人在工业社会中显现出来：

一，两类人追求精神权力，我仿效奥古斯特·孔德的说法，把他们叫做**教士**（或传统宗教的代表）和作为世俗思想代言人的**知识分子**或科学家。

二，**政治领导**同另外两类人有关系，他们是官员（或公务员）和军队或警察的领导（往往成为普通官员）。

三，**集体劳动的管理者**可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可能是今天人们称为“经理”的人（为了使用伯纳姆[1]使之出名的字眼），这些人的主要专长是组织或领导能力。

[1] 伯纳姆(James Burnham, 1905－1987)，美国哲学家。——译注

四，最后，**群众领袖**表达和引导现存社会内部工人的要求，除此之外，往往同时还企求夺得政权，甚至还有精神权力。在共产党的领袖绝对确信他们的**学说**是正确的情况下，他们渴望精神权力，这与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书记们不同。如果你们希望听到别的例子，英国的工党领袖就很少有这样的欲望。他们的代表大会开幕时通常作一个祈祷，以现代群众运动的方式象征性地接受传统的宗教。人们很难设想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会以这样的仪式作为开始。更加难以想像法国社会党或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有这种情况。

什么是民主工业社会权力分离的特点呢？

一，**精神权力多元性**。我不说多元是反常的，这是奥古斯特·孔德的看法。可也许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然而纵观历史很少见到如下的现象：同一集体的成员对最高真理的看法有分歧，不抱有某种共同的价值等级观，甚至对生命的深刻含义理解不一。确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是由政治组织和阶级斗争构成的，而基督徒则认为个人的得救或者人类的得救体现在个人灵魂和上帝之间。甚至我们在法国还见到一些人，如进步派基督徒，他们动摇于这两种说法之间，不再确切地知道根本的前途究竟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或者相反，是人类从原罪经过基督降临直至世界末日的发展进程。

二，**彻底的平民权力，掌权者对执政的暂时性表示接受**。在民主制下的执政者明白，他们的地位全靠选举，他们事先就心甘情愿地同意，如果下次投票结局对他们不利，就放弃他们的职位。他们自认是平民、公民的代表者。他们依靠拥有武力手段的人对他们的服从。

三，**以请愿为目的的非特权者的永久组织**。独立于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国家之外的工会是我们时代最具特征的社会现象。

甚至极为反常的是，任何专制制度的改革都以消灭这种现象为起点，因为它对秩序构成了一种长久的威胁。我们终于对这个现象习以为常，忘记了它是多么独出心裁。无论是古代奴隶还是封建社会的农奴都没有想到建立旨在请愿的永久组织。这些非特权者组织的存在也许是对工业时代民主社会最适当的定义。

基于这些研究，我们能够不太费力地懂得发生在苏联式社会中的事。事实上，为了理解革命进程，只要分析一个民主社会和群众领袖这一类人物就足够了。这些人在得到权力的同时，还想成为最高真理的表达者、政治领导、集体劳动管理者，他们不可能不想身兼三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学说高于传统宗教，表述了科学真理，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自身是借助他们在进行统治，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剥削者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应该被消灭。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群众领袖夺得了权力。他们成了政治领袖，他们是国家的体现。但他们扮演的角色同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们不同。后者接受自己是"有偏向的"，仅直接代表一部分国民。对于代表另一些国民的其他人有可能在以后的选举中取代他们，他们是能够接受的。在真正的革命者眼里，这种多元性是不可接受的。多元性的基础是假设有多个社会阶级或者有阶级对抗，而革命者想消灭的就是社会阶级。一旦掌握政权，为了实现这样的统一，他们以消灭政党多元化开始。当选的领导和官员之间存在区分，区分以当选领导的特殊性和官员的普遍性为基础，两者是对立的；从政治领袖变成了整个集体的代表那一刻起，区分就不再具有什么意义。在西方，私人企业与整个集体是分开的。但是经过一场苏联式革命后的企业失去了自主权。企业主将是国家的代表。对全部劳动实行国家控制，因为

劳动由国家任命的官员来管理。所以不再存在社会和国家的分离,或者用德文字眼来说,就是 Gesellschaft 和 Staat 的分离。在这种分析的启示下,二十世纪的一切权力革命都似乎试图重建统一性:最高真理的统一性、变成惟一政党的社会阶级的统一性、社会和国家的统一性。

如果这个分析是恰如其分的话,两种工业社会的根本对立来自于在一种社会中有不同类型的领导,而在另一种社会中人们试图使领导统一化。从表面上看,民主社会是四分五裂的,苏联式的工业社会是集中统一的,后者的政治首脑同时是思想家、群众领袖和管理者。这种对立是把两种永远不会实现的理想典型进行对照的结果。

作为这讲的结束语,我要向你们指出,即便这边的权力分离不像那边的权力统一那么全面,两种典型还是分道扬镳,一个趋向于分离,另一个趋向于统一。

先让我们来看西方社会。首先,随着当前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日益普遍,劳动的管理者和官员的分离并不妨碍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两种职业逐渐混同。无论是法国电气公司、煤气公司还是雷诺工厂,领导者不再是私人利益的代表,而是一些与被指派完成某一使命的官员相类同的人,完完全全像在苏联式社会中一样。在美国,企业主在政府部门中接受高级职位。你们不是不知道,法国的很多高级官员,例如财政部官员,当他们在部里登上权力高峰之后,仍然在当私人企业主。至于行政官员和政治家的关系,在理论上他们之间是存在区分的。但事实上,区分在缩小,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官员不得不重视其上司对于选举的考虑,另一方面,从相反的含义上说,当选的执政者总是不同于在野的政治家。当选者不管愿意不愿意,他变成了集体利益的代表,不可能在作为执政者的同时还是抗议者。这种变化

常常被道德家视作叛变行为，被某些哲学家视作转化行为。在野派不承认理性和普遍性是必要的；执政者则随着正视现实而变得认真而慎重了。

关于政治家之间的竞争，应该懂得多党制只有在斗争下面蕴含着一定程度协调的时候才能良好运行，尽管斗争是真实的。这样一种制度包含着公开冲突，这在一党制中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如果各党领袖在任何问题上甚至游戏规则上都不能达到意见一致，那么设想多党制能够继续存在将是浮浅的看法。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英国，我们法国人倾向于把这个国家看做是典型的民主国家。当保守党和工党因偶然的或不幸的因素而对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不再能统一看法的时候，多党制的运行就变得很困难。权力分离的良好状态以及多党制的健康运行在于把广泛深入的协调和有限而猛烈的冲突结合起来。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群众领袖们的目的越是不雄心勃勃，民主制度的运转就越顺利。让我们法国人再把盎格鲁-撒克逊制度作为典范（请你们不要由此证明，人人都把邻居作为参照对象；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在法国身上寻找民主国家的典型）。在美国和在英国一样，工会领袖和政治领袖都接受民主制的原则。我说这话的含义是英国或美国的工会书记、工党领导不愿意成为一种最高真理的掌握者，他们赞同游戏规则，接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制度。一旦思想的多元化变成殊死的斗争，民主社会的运转就会遭受损害。在安定的民主国家中，非特权者的组织不是革命组织，他们的请愿不超出制度允许的范围，精神权力的分离不表现为不可调和的斗争。民众的政权因其固有的合法性即选举的合法性而被大家所接受。从人们接受政权这一时刻开始，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统一，即所有人都接受权力转移所遵循的规则。社会是民主的，因为人们可能就任何问题展开辩

论，但是由于大家对国家机构本身所基于的原则一致同意或几乎一致同意，故而政权是稳定的。

我已经向你们指出了权力分离中存在的协调一致的方面，考虑到对等的原则，我不得不用几句话告诉你们人们在统一社会中观察到的分离方面。我想到的苏联式制度是同类制度中最地道的，它所包含的统一性比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更加广泛，然而它也不是绝对的统一。政党自认为是高于教会的某种精神权力，但即使革命成功后四十年过去了，教会仍然存在。政党和东正教的关系经历了斗争或迫害以及缓和或和解相交替的阶段。传统的教权也许被抑制，但是没有死去。

至于知识分子，他们也经历了绝对的纪律和相对的自由相交替的阶段。从理论上说，政党带来了优于具体科学真理的思想体系。但事实上，政党发现它面对的既有信奉者，也有利用自己的智慧找到真理的知识分子。而政党自己甚至不确切知道党派真理应该走向何方；这种真理的广泛程度随时代而变。人们能够设想一种强加于所有公民头上的惟一学说，它同语言学、音乐或艺术各学科毫无关系，这种官方思想体系，它妨碍不了人们创作形式主义音乐、撰写非现实主义小说、绘制从西方腐朽艺术吸取灵感的图画。统一意志按不同时代时而稍加强，时而稍减弱，但分离现象永远不会完全消除。没有任何迹象启示我们，政治真理可以长期取代宗教真理，可以在精神活动的所有领域内成为精确的指导和强制的命令。

把执掌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各类人统一起来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同一些人，他们同时是共产党党员、生产资料管理者或政府部门的官员。对于这些人和那些人来说，没有本质上不同的职业，但是在西方导致分离的因素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同样的人身上或某些不同的人身上。一方面是党内人士，另

一方面是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希望像法国财政稽核那样做到合理，而党内人士则为思想体系或群众舆论而操心，如同法国议员为选举操心一样。为再次当选而忧心忡忡的政治家以及因忠于某种信条而思虑万千的政治领导，两者的忧虑想必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在这两种社会中，人们还是可看到两类人的差别，一类是因其合法而掌握政权的人（这里是民主的合法性，那里是革命的合法性），另一类是企业领导（或政府各部领导），他们期望效率并按生产规律和技术合理规律组织劳动。在苏联式制度下，工会领袖和生产资料管理者属于同一种职业。人们从一个岗位过渡到另一岗位是不改变职业的。人们看不到在群众领袖和具有西方特点的生产管理者之间有根本的区分。但是管理者的职务在什么情况下不对思想方法产生影响呢？不管怎样，在一切社会，人们不可能对如下两个方面不加区分，一个是劳动者对请愿的关注，另一个是技术上的必要条件。

最后一句话：请不要以为，我分析权力分离思想和权力统一思想得出两者仅存在细微差别，从而导致进行对比是毫无价值的结论。在我们的头脑中，两种典型都是纯粹的，但是现实比我们所作的想像要复杂得多。

第十讲

对领导阶级的比较

在上一讲中，我概述了苏联式和西方式两种工业社会里关于领导者类型的理论。我可以把它概括为三个主要论断：

一，领导者的主要类型在哪里都存在。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政府官员、政治领导、群众领袖不可能不存在，因为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不能没有这类和那类领导。

二，根据各类领导者是倾向于统一成一个惟一集团，还是互相分离、处于或多或少公开的竞争状态，人们可以得出两种理想的典型。

三，第三个论断在分析中是不言自明的，今天我将它明晰地表述出来。不同类型领导的某些分离现象受到人们的称赞，另一些分离现象则遭到咒骂。被左派横加指责的是存在于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管理者同作为集体代表的官员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构成了人们所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现象，并因资本主义这种叫法而令人憎恨。在一个纯粹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所有者应该同时又是生产资料管理者(这个形式的社会在哪里都不再存在)。在苏联式社会里，从理论上说，生产资料管理者是整个集体的代表，与国家官员是不分离的。

相反，人们赞赏西方社会中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或知识分子权力的分离，以及群众领袖权力同政治领导权力的分离。这

种分离是我们通俗地叫做自由这个东西存在的条件。如果政治领导有权提出一种国家思想体系并强制人们加以接受，这个思想体系所笼罩的领域就不再成为争论的题目。人们猛烈抨击资本家和官员的分离、大加赞赏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分离。但是对于始终被人们看重的具有自由特性的分离来说，遭到谴责的所谓资本主义性质的分离难道不正是不可缺少的吗？

我以后将会重提这个问题。今天我要再次谈谈这部分课程开始时提出的三个问题：

一，是否能以每个社会的领导阶级来确定该社会的特征？

二，根据经验对不同工业社会的上层阶级进行比较会得出什么结果？

三，领导阶级的概念本身在什么程度上是有价值的？

人们怎么能够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比提出两个领导阶级的对立性呢？在我看来，以下便是历史的解释：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理论诞生于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他看到新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形成的。在一定时刻，形成于旧制度内部的资产阶级变成了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它只需把旧贵族赶走就可同样在政治上担当领导职务。按照这个理论，只有当具有新社会特征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范围内已经成熟的时候，一场政治革命才是可能的。当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时，便只有完成最极端的行动，也就是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阶级消灭掉，因为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不符合时代的、过时的经济状态。

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曾设想，无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所处的地位好比当时资产阶级面对贵族阶级所处的地位。但他不可能不注意到一个根本区别：资产者和贵族一样代表一小部分特权者；相反，无产阶级是一大群非特权者。人们不能把无产阶

级反对资本主义同资产阶级反对旧制度完完全全等同起来。马克思注意到了这个区别，从而提出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不是一小部分特权者，而是社会中的广大群众，它才不会在革命之后把权力再次交给另一小部分人，而是取消一切少数统治者。实际上，根据二十世纪的历史现实来判断，苏联的革命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夺取了权力的集团同广大群众不是合为一体的，它借助于人民运动上了台，构成一种新的寡头势力。

不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与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对立不相同，而且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人生哲学之间的差别比贵族和平民的人生哲学之间的差别更小。我们来研讨一下这个乍看上去可能显得很反常的判断。鉴于整个二十世纪充满了马克思主义者同非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苏联式社会同西方社会的激烈论战，人们可能相信人生观的根本对立是存在的。然而虽然政治冲突也许不可调和，但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则没有分别。旧贵族最早是一个军人阶级，它臣服于君主政体后仍然是军人。它认为劳动对一个贵族来说是不相宜的，它的道德观念是崇尚英雄主义和吃喝玩乐。请你们把忙忙碌碌的资产阶级和企求权力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哲学比较一下，尽管论战不止，他们之间的差异却并不悬殊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他们的目标和雄心如出一辙。两者都同样希望最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他们都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两个集团依据各自不同的方法来实施这些原则。无论如何，两种人生哲学都赞赏劳动、富足和进步。

两种人生哲学同时都反对旧制度，因为旧制度体现了社会的静止不变，几乎可以说等级是命定的东西，而且注定要维持下去。资产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断定，社会秩序应该无休止地更新，他们期望高级职务由最称职的人担当。最称职者的一定标

准因社会而异，然而选择标准差异较小。这是具有同一属性的两类人，而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人生哲学却不具有同一属性。

两种现代人生哲学不可调和的争论最终针对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撇开宣传中的失真成分不谈，冲突所包含的只是少量关键问题。首先，什么是工业发展最有效的方法？今天，苏联领导私下里辩解说，苏联式社会的生产增长速度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快。其次，什么是对个人福利最有利的制度？争论引出的论据是理性的，因为双方都不言自明地接受同样的价值标准，为自己定下同样的目标：尽可能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最后，两种制度中哪一种最符合正义、最有利于非经济的文化价值？

我省略了争论中的关键性问题，即所有制形式。这的确是传统的意识形态关键问题。但是今天实际上不再有决定性意义。涉及到工业的高度集中，所有制的本身含义已经改变了。在美国式的或者苏联式的大行业组织之间进行选择几乎无关紧要。相反，知道采取什么方法使生产提高得最快，在什么制度下分配最公正、什么社会最有利于个人福利和思想自由，这才是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

现在我们谈第二个问题，即根据经验对两个社会的上层阶级进行对比。从什么意义上说，西方的上层阶级适合于被叫做资产阶级，而苏联的上层阶级不适合于这个称呼？

资产阶级这个词有多个含义。它先是同贵族这个词相对立，现在人们把它同人民这个词相对立，人民的概念包括农民和工人。第一个对立今天还保留一种含义。在法国某些地区，例如西部，人们还能遇到旧制度的残存者。人们甚至可以说每个西方社会都具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创造和管理经济的人同旧贵族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英国的特点表现在贵族和经济领导阶层的代表以特殊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孟德斯鸠早就对此现象深感震惊。在他著作的不同章节中，随他高兴，时而说没有任何东西像从事商业那样使贵族破产，时而又说由于贵族在农业和工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它会继续存在下去。法国的贵族则相反，尽管作过几次尝试，它常常还是认为从事经济活动对贵族不相宜。英国有一个混杂的领导阶级，非英国人叫它贵族阶级，而英国人自己则称它为middle class（中产阶级）。它是由担负着资产阶级使命的人组成的，但又保留了来自于旧贵族的生活方式。

美国的情况相反，那里没有贵族的痕迹。实际上从未有过贵族：在南方，种植园主是以发展一个类似于贵族式的社会开始的，这个社会被南北战争摧毁了。在德国，普鲁士贵族主要热衷于公用事业：直到当今，它继续在国家事务中起决定性作用，1914年战争时期，它还提供了绝大部分军队高级干部。

根据贵族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对欧洲国家进行比较分析不是没有意义的。有两个国家是由贵族建立的，它是中欧的波兰和匈牙利。最早失去贵族阶级的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在生活方式和价值等级上的众多区别也由此而来。

在苏联式社会中，一切贵族的残余都被铲除，这个现象虽然有其重要性，在对两种社会的比较中却不是决定性的。旧贵族的残余势力失去了权势、影响，甚至威望。人口集中于城市，而贵族只有在它拥有大产业的条件下才真正保有显要的社会地位。匈牙利和普鲁士两个国家的最后一代贵族因占有地产而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彻底被根除和消灭了。在西欧各国的首都，最后一代绅士为外出享用晚餐的风尚增添光彩，但这并不构成典型工业社会的特征。

现在我们来探讨资产阶级（从生存和生活方式看）和农民或

工人的对立　按照阿兰的著名定义，资产者是指不用双手劳动的、不直接同物质接触的、只同其他人发生关系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是资产者。我补充一点，如果我们在莫斯科大学的一个阶梯教室里，我们可能会大胆提出同样的判断，虽然也许会由于大学生们以往的经历而有数量更多的例外，但随着苏联社会的衰老，这些例外将趋向于逐渐减少。如果资产者仅仅是从事脑力劳动或者半脑力劳动的人，那么无论是苏联式的还是资本主义式的，所有工业社会都有资产阶级，社会都由资产者管理、都由资产者统治。当某位著名作家以带有耻辱感的挑衅口气高喊"我是一个资产者"的时候，他可能同时会承认他是苏联公民。苏联大作家只要是守纪律的，都享有比其西方同行更优厚的特权。你们肯定都熟悉一位社会党人，他的名字叫亨利·德曼[1]，我曾听他说，他梦想中的美好社会里，所有人每天有几小时，每年有几天或者一生中有几年将到工厂去劳动。那时，社会将是协调一致的，工人和管理者、无产者和资产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将消除。当这个乌托邦变成现实的那一天，阿兰理解的资产者的概念，即非体力劳动者，就不只是西方社会的特征了，因为人们可能在所有工业社会里找到（按上述含义的）资产者。

非体力劳动者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类别，它细分成众多的集团，互相间差距甚远，以收入多少和职业性质划分界限。大企业的厂长和中学教员的薪金有巨大差距，因而生活方式也不相同。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评论某个行为的人不一定了解行为的主人。有时政治学的教授不了解部长们，事实上不知道

[1] 亨利·德曼（Henri de Man，1885—1953），比利时政治家、理论家。——译注

那些部长是如何作决策的。我记得在一次论战中，我们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回敬曾批评他的一位作家时说，这位作家仅在一个月或一天中竟碰到了那么多政客，比哲学家本人在一生中遇见过的政客还多。哲学家由此看到作家对完美无缺的要求，这是不容置疑的；他似乎没有看到作家对政治缺乏直接的经验但又敢于加以评论的态度。

收入不等只是众多的区分标准之一。根据资产阶级成员是被雇用者还是独立经营者，还有其他的区分。**独立经营**具有巨大的意义。报纸上充满了有关医生职业地位的典型辩论，它是独立经营还是雇用劳动。在论争中，人们使用了令人惊奇的论据。某个医生宣称医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为了保持与病人的直接对话，他同时要求得到随意制定诊病价格的自由。通情达理的人不感到论据之间存在矛盾。医生希望其职业仍然是一种自由职业，这种职业地位同时通过道德和经济方面的论据加以证实，神圣职业的价值相当于每次诊断收费好几千法郎。不言而喻，我指出这些现象并不打算对问题本身加以解决。其他一些区分来自于职业的威望。在某一个地区范围内，诸如在波尔多、勒阿弗尔或斯特拉斯堡那样的城市里，社会分层包括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各阶层依据其活动的功绩或家族的历史处于高低不同的社会地位。

我只发现一种把西方式的和苏联式的资产阶级彻底对立起来的方法，这就是运用安德烈·西格弗里德的定义。资产者主要是拥有储备的人，他的日常生活不依赖于他的劳动收入。但是这种区分方法没有比我们已知的东西增加任何新的内容，它又把我们带回我们最初的思想，即一个像苏联那样的由国家控制的上层阶级不可能与西方的上层阶级有同样的地位。在我们这里，资本的收入补充到获得的薪金中，在苏联那里，积聚一笔巨

额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苏联式的制度中，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内部也存在区分，同西方社会中人们观察到的区分相似。群众和特权者的差距眼下似乎东方比西方更悬殊。一个苏联非技术工人和一个企业领导的生活方式相距甚远，超出这两者在美国的差距。但是这种区别不一定同制度有关联。这可能是由于两个社会的财富不等而造成的。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英国、法国，人们的收入差别尤其是生活方式的差别比今天要突出得多。有理由认为生活方式的差别将到处趋于缩小。然而，等级在一个苏联式社会中比在一个西方社会中更为明显。日趋增多的苏联干部或领导现在都穿一件外面饰有级别标志的制服。在矿上，工人、工头、工程师(按类别分许多等级)等劳动者的等级是严格划分的，每人有众人皆知的明确地位。

最后，在一个苏联式社会里，差别也许同职务而不是同财富相连。如果说那么多有识之士对西方等级义愤填膺，却接受苏联的等级，那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在一种情况下是财富保证了上层地位，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倒过来，是地位保证了财富。在苏联，某个企业的厂长领取高薪，但他担负着重大责任，从事着一种必不可少的职业，为集体提供关键性的服务。舆论同意他拥有特权，作为他为公众福利所作贡献的补偿。相反，当问题涉及西方社会，涉及某个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时候，舆论的感觉往往是，不是资格确保个人的地位，而是他所拥有的财富或他的父母拥有的财富确保其地位。埃比纳尔[1]的图片上描绘的是：那一边，人们有钱是因为他们为集体服务；这一边，是因为人们有钱

[1] 埃比纳尔(Epinal)，法国孚日省首府，是法国著名的民间图片制作业所在地。——译注

才居于高位。现实自然更为复杂。

在西方社会,同样有数量众多的特权者是靠了他们的功绩才拥有他们的地位的。如果他们没有功绩,制度早就分崩离析了。相反,很值得思考一下什么是适合于每个社会的选拔制度。我自认为没有能力告诉你们,企业领导的招聘制度是苏联的更好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更好。在这里,人们引用竞争机制,在市场上论胜负。但这种选拔制度几乎只对小企业起作用。在通用汽车公司,晋升是在行政机构或官僚机构内部完成的,每个人都必须证明自己的才能。在苏联,从理论上说选拔是以同样的方式实行的,谁证明自己有能力谁就得以晋升。余下要知道的是如何证明,向谁证明,评判的人是否公正,头脑中的正统观念或异端观念是否会有一定程度的介入等等。按照人们可以作出的判断看,苏联式社会的长处之一是,寻找优秀者的范围比在西方社会里更加广泛。至少直至目前,那里的社会流动或许更大。

为了结束这方面的问题,让我们用几句话把两边社会领导阶级成员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作多种可能的和必要的比较。例如,学者相对处于怎样的地位?一个苏联式社会里的科学家在物质和精神上处于优越地位似乎是不容怀疑的。科学院院士、专家、物理学家绝对领取最高等级的薪金,他们在经济收入上不低于生产资料的管理者,他们享有崇高的威望。成功作家的境遇则相反,他们在获得利益的同时,要遇到特殊的困难。他们的收入有时高达每年几十万卢布,但必须接受对他们的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所加的限制,这种限制在西方社会里是见不到的。

至于生产资料管理者,苏联的特点是从小企业领导到政府部长,他们属于一个惟一的等级,他们的权威、收入和威望是等同的。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里,至少在收入方面,他们相互间有差异,控制着国有公司的某部部长可能比这些公司的领导挣得少。

西方社会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属于两种等级,而非一种等级,相对地说,在官员等级中,最高收入不是很高,而在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等级中,工资幅度拉得更开

这两种社会的上层阶级间最重要的区别或许表现在政治领袖身上 最有意义的比较是针对苏联、法国、英国、美国各国统治者的人物类型和生活方式。人们可将这样两个人的生活方式、成功手段、思想方法加以比较,一个好比是我们的现任总理[①],他是借助于一个民主政党和议会活动取得成就的,另一个好比是赫鲁晓夫先生,他也是一个党的总书记,但是这个党与西方的社会党不太相同。也许我们得出的结论会使人隐隐约约地联想到马基雅维利式的对照,一个是善施计谋和守信用的人,一个是言行可能较为粗暴的活动家。

进行生活方式的比较会很有趣。在苏联社会里,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完全分开的。大人物的家庭关系属于绝密范围,这使得西方记者能够杜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某某先生的妻子和另一个主席团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这样的杜撰具有真正无知的特点。在这方面,相比于西方的习惯,苏联领导阶级的社会生活具有出人意外的特色。这样一种区别会持久存在下去还是仅仅具有过渡性质呢?苏联的特色归因于一个阶级的革命过去,这个阶级保持了从布尔什维克党继承的习惯(政治是严肃的事,不应该受到私事的牵连)。或许,关键性的区别存于两个社会的成功者属于不同类型的人。在法国的制度中,确保成功的首要优点应该是理解和支配他人的能力,这是丝毫不能忽略的优点,但是不能同超常智力、毅力或果断的性格相混同。议会的政治家们对他们的同事具有极强的分辨能力,其中某些人是能

① 1957年的时候是居伊·摩勒先生。

预测出这些人或那些人行为的真正高手,他们可以估算出一个议会中某候选人将获得多少选票,大概只有二票出入,这再一次证明丝毫不能忽略预感、直觉和妥协艺术的能力。看起来这与在一党制中为确保成功所需的品德是不同的。在那里必须要有高超的行政管理能力,特别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刚强的耐受力,善于作出果断决定,也许还要善于粗暴行事。对这个问题作任何笼统的概括都很困难。没有一种选拔领导者的制度能保证权力将交给最优秀的人,没有一种制度能永远取得好结果。当人们详尽地研究某一个制度中的成功者时,会发现获得成功或遭受失败的一些恒定因素,但是仍然存在与理论不符的情况,如本不该成功的人成功了(也有相反的情况)。在政治上,应该警惕教条主义,任何制度都有出人意料的情况。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马基雅维利含义上的领导阶级,我还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或所有者自身就构成了少数统治者,这一说法是一种假象理论。这仅仅是一种未被证实的判断,这等于断定在西方社会里的资本家是实际上的执政者。人们甚至神奇地描述**华尔街或伦敦城**,说他们操纵议员和统治者。确实存在一群人,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对社会施以影响,然而不应断定这群人组成了**那个**领导阶级,最好要通过客观分析探究它在不同的西方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确切地说,在什么程度上它操纵或统治整个集体。在大部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者自己不担任政治职务,这些职务由杰出人物或当选者承担。说资本家随心所欲操纵政治领导至少要有证据。

至于马基雅维利式的理论,它是粗浅而不完整的,但它恰好提醒人们政权时时处处都是由少数人掌握的,政治权力具有和经济实力同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者讨厌这个理论,因为它

完全不适合于西方社会，却与苏联式社会十分切合。主张马基雅维利理论的人不否认掌权者利用权力保证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在他们看来，权力是首要现象。最符合马基雅维利的解释并且最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革命就是苏联革命。这场革命典型地是由少数人夺取政权，他们既不是生产资料的掌握者，也不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也不是社会意义上的统治阶级的代言人，而是组成政党、夺取国家政权的人。然后，一场经济和社会革命在这些少数人的领导下便完成了。

即便如此，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还是不完整的。在一切社会中，少数人掌握政权是确凿无疑的，他们担当高级职务或占据高位，伴随而来的是最高的收入和威望，但是，一切工业社会的特征就是，**领导阶级达到统一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再存在法律上有区分的等第或等级。以往贵族社会的典型特征是担任军事职务和占有土地是结合的，这种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当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到城市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市镇的各类领导就诞生了，他们是组织劳动的人、操纵舆论的人、政府领导或技术领导以及政治领袖。没有任何一个军人阶级握有武装力量的垄断权，因而不可能独掌政权。

由于在所有工业社会里存在多种类型的领导人物，所以说领导阶级的一般概念不能说清问题，不如说反而把问题掩盖起来了。还是要研究每个集体中各类领导是怎样构成的，它们之间的分离或统一达到什么程度，什么是他们的竞争方式。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导向对各类领导的分析，而对这些人的研究又反过来引发人们分析政治制度。当亚里士多德研究希腊城邦的结构时，他既没有忘记集团的区分，也没忘记制度的差别。因此我们最后要从事的社会学类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包含的社会学。我们从一切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开始，说明社会结构

的不同形态和领导阶级的不同类型,最终我们力图抓住政治制度的性质和运转情况。我们要打消这样的设想:认为人类最终将必然通向一个惟一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设想是,或者永久地对比下去,或者经济和政治结构多种形态并存,这些形态同工业社会的性质是相容的。某种类型的制度在经济增长的某一个阶段被看好,但是"被看好"并不意味着"决定性"的;政治永远不完全决定于经济基础。

第十一讲

社会发展趋向

上一讲末尾，我拟出了作为本讲分析基础的阐述提要，我回顾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运用的方法。我以某种社会类型即工业社会作为出发点，比较了两种类别。亚里士多德也系统地比较过希腊城邦的各种类别：各城邦的经济都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公民都按职业和财富分成众多集团，它们之间的竞争使政治生活持续动荡不安。每个城邦有自己特有的制度和统治方式，而城邦制度被公民集团间的一定关系所限定。每种制度朝着或必然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这就使得亚里士多德有可能概述对各类变革的比较研究。

我们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比较两种工业社会。去年我研究了经济结构模式，前几讲中，我明确阐述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强调了两种社会的对立、一种社会的领导是统一的，另一种社会的领导是分离的。然而我们发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和今天我们要运用的方法之间有天壤之别。这种区别归因于工业社会中经济不断发展的特点，相比之下，尽管以往所有社会的经济在某些情况下包含增长的因素，但在本质上不是连续增长的。在对希腊城邦进行比较时，人们可以假设某种固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当人们比较现代社会时，必须把经济和社会结构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

为达此目的，我们运用两种理论，两者都很简略，并与现实

不相容。第一种是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按照这种理论,社会主义来临的可能性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增加,必然的结果是爆发一场革命 这个论断显然与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相矛盾。因此人们构想了另一种与此相对立的理论。即苏联式的社会具有高速工业化最初阶段的特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独裁或极权的特征将会消失。开始我对这两种理论都不赞同,但正是对这两种理论的思考使我在这一讲中引入了一些新内容,其研究对象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社会发展趋向。

我首先要提请你们注意几个人人皆知的现象,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平凡的事极其重要,当需要反复提到它们时大可不必犹豫。

在西方式的工业社会中,什么是社会发展的重大趋向?第一种可能是被人们不加区别地叫做**城市化**或**工业化**的趋向,尽管两个词义并不相同。大体上,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者比例上升。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工厂在大部分情况下都集中于城市,因而上述两个进程是同步的。为了不限于这种平淡无奇的论调,我要把你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变化完成的两种方式上。的确,劳动力流动时,农业人口在绝对数量上可能没有下降;相反,可能引起的是农村人口比例减少。约二十年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法国被视为一种灾难,人们不禁将此看成反常现象和堕落的根源。

我们来看一看有关美国的令人震惊的数字。1870 年,685 万人从事农业,相当于全部劳动力的 53%。五十年后的 1920 年,这个比例下降至 27% 但在这期间,农业人口从 680 万上升至 1145 万。比例相对下降 50%,而绝对数字几乎增加一倍。只是从 1920 年开始,从事农业的绝对人口数量才下跌,到 1950

年,跌落至700万以下,差不多是1870年的农业人口。但同样数量的人口在1870年占全部劳动力的53%,而八十年以后仅仅占11.5%。在俄国,比例的下跌比绝对数字的减少还要厉害得多。1928年,农民约占苏联全部劳动力的80%(全国人口为1.52亿)。1955年,该比例是45%到50%,但是当时人口为2亿。农业劳动人口只是适度下降,因为仍然还有9000万左右,而五年计划初期约有1.2亿。现在我来谈谈对我们来说最有趣的数字,即法国的数字。我们国家提供的人口转移的例子在比例上发展慢,在绝对数字上发展快,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二十年前人们常常听到的评论。数字如下:如果我们只看农业男劳力,1921年达499万,相当于全部男性就业人口的38%。1954年为335万,绝对数量下降了160万,但比例仍然还有26.7%。这个现象与美国的正相反。鉴于法国人口不增长,所以绝对数量下降极其迅速,而比例的下降相对缓慢。

第二种发展趋向,我将把它叫做"雇用劳动化"。我使用这个词来替代马克思主义词汇"无产阶级化"。这个既深奥又不规范的词仅意味着雇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例增加了,而独立经营者的比例下降了。在今天的美国,该比例达到80%左右,而且还在上升。在比利时,约为70%上下,但是很明显,法国的比例较为低下,在50%与55%之间[①]。社会不断发展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特色,而我们是属于发展缓慢的西方国家,独立经营者对雇用劳动化抵制的时间最长。这种现象与作为土地所有者或农场主的农民人数有关,也与工商业中的小企业主或手工

① 1954年至1962年间,法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点是速度加快。在八年中,130万人口离开农业,使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从27.3%降到20.3%。同时,非农业工薪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160万,而劳动力总人数却没有增加。

业者人数有关 资本主义发展迟缓是法国的特点之一，依据某种复杂的逻辑，这也许算是反常现象。社会发展最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标准的国家却是在西方拥有最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国家 独立经营者人数的众多使经济增长的速度减慢，由此思想界人士流露出不满意的情绪，他们执着于一种像马克思主义学说那样的宣言性学说。

为什么我们说"雇用劳动化"，而非"无产阶级化"？不是所有雇用劳动者都去工厂劳动。而人们习惯于把无产者这个词用于工业劳动者。一种社会类别的人数在所有工业国家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膨胀，这就是被雇人员，他们同工人一样也变成工业社会所特有的。确切的比例是多少？人们很难回答，只是因为词汇没有被明确定义，以及雇用劳动力的统计因国家而异。根据美国的统计，1940 年，职员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约为 17%。不如它发达的国家似乎是同样的百分比。例如，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比例数在 15% 到 20%。1954 年，统计数稍有差别。美国的统计显示办公室职员占 12.6%，但要加上 6.2% 的售货员、13% 的企业基层生产管理人员，在最后一类人中，也许有某些人从前可能会被归为职员。无论如何，我们遇到了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人们把它说成是"管理时代"、"雇用文化"。工业社会的发展不导致体力劳动者人数无止境地增加，但却会引起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人数同时膨胀。工人的比例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增长。几十年以来，美国工人的人数是稳定的。偏向于用雇用劳动化这个中性词的第二个原因是无产阶级化使人联想到劳动条件和劳动者贫困是一致的。而我们观察到的是另外两个特点，即**分化**和**资产阶级化**。

因而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重大趋向是分化，我马上就向你们说明这是两种工业社会所共有的。苏联的统计揭示了被人们称

为知识阶层的人数比例持续上升，在那里属于知识阶层的人，在西方我们叫他们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苏联人自己往往坚持这样的事实：伴随经济增长，需要有日益增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所有现代工业社会都体会到提高全体人民知识和技术水平的需要。在我看来，这是工业文明的优点之一，它必须让所有人学会读书和写字，它必须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中等教育，最后它必须在二十世纪中叶开始不断招收更多的大学生。

但这仅仅是一种分化模式。另一种分化存在于西方的所有者或独立经营者以及被雇用者之间。独立经营者在数量上的优势日趋减弱，但是这个变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任何民主社会里导致这类人的完全消失。人们习惯于用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这样的词语，前者用来指独立经营者，后者用来指工业社会的被雇用者或管理人员，即达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工薪阶层。在西方的欧洲社会中，两类人合起来至少占人口的40%，通常为40%到50%

人们可能会想，雇用劳动化有朝一日是否将发展到极限。我们知道，企业主几乎完全消失是苏联式社会的特点，因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农业、商业和工业中已不复存在。在西方世界，只要仍然有民主社会，这种趋势将会遇到阻力，阻力的大小因国家而不等。每个西方国家的特征正是表现于这种对雇用劳动化的不同抵制程度。

另一种社会分化在于经济部门之间和职业之间的千差万别。显然，冶金工厂的被雇用者、豪华饭店的被雇用者、火车司机或卡车司机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最后，就是在工业部门内部的各种职业间也存在巨大的分化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通过统计数字来研究体力劳动者中的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

非技术工人的比例是怎样变化的。我要告诉你们一两个数字，但特别要你们对此有所警惕，因为在不同的统计中，人们对技术工人或半技术工人的概念并不赋予完全相同的含义。

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看来不但并不趋向于统一，而且正相反。在非技术工人和近似技术人员的工头之间，今天的距离比以前更大。另一方面，专业人员更稀少，可以说熟练工人能够替代他们。根据美国的统计，1910 年的技术工人或工头占全部体力劳动者的 18.8%；1954 年，这个比例上升到 24%。半技术工人从 23.6% 提高到 37%。被美国人称做“服务工人”的人从 10.9% 增加至 19.9%（例如卡车司机属于这类人）。如果人们接受这些数字，更加专业化的趋向就显而易见，但是要有一个保留。在美国的统计数字中，很多被叫做半技术工人的人实际上只懂得很少的技术。也应该考虑到劳动分工的程度。如果分工程度达到弗里德曼[①]先生所说的“小块劳动”，那么统计表格指出工人有技术是白费，这些工人将只会感到受束缚于一种毫无意义的工作，因为工作太零碎了。

我现在来分析社会发展的第四种趋向，我把它叫做**资产阶级化**，因为一部分人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且人数可观。为了说明问题，我将以美国为例，原因是这个现象在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1955 年[②]，约 50% 纳税家庭或个人的收入高于 4000 美元，

---

① 弗里德曼（Georges Philippe Friedmann，1902—1977），法国社会学家。——译注

② 1962 年，近一半家庭（含单身个人）的收入在 6000 到 15000 美元之间（1962 年的美元），400 万个家庭的收入高于 15000 美元。1947 到 1962 年间，有 6000 到 15000 美元收入的家庭比例大幅度上升，但主要是因为从前处于最低等级（4000 到 6000 美元）的人提升的缘故。低于 4000 美元收入的最困难家庭或个人只是略有减少，1947 年占 19.8%，1962 年占 18%，但家庭总数有变化，1947 年为 4470 万，1962

按当时汇率，相当于140万法国法郎 我们可以认为，超过这个数字，生活水平至少是小资产阶级的；而今天有一半左右的家庭可达到这个水平。有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总收入的提高。1929年，个人拥有的财富按1953年的美元价值来计算，达到1184亿，1953年提高到2210亿，两个年代之间增加了87%。1929年，42%的纳税家庭或个人的收入低于2000美元；1953年，穷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百分比跌到22.9%。至于收入在2000到4000美元的，从36.2%降到32.2%。相反，收入在4000到7500美元的，从15.1%升至34.9%。

请原谅我堆积这么多数字来阐明一个不容置疑的现象，美国社会的集体财富大幅度增长，撇开分配方式不谈，财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达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当前，约35%的家庭有4000到7500美元的收入，显然构成为一个中产阶级，至少从生活方式上说是如此。再加上这类家庭内有58%的家长是体力劳动者，因而不光是职员进入了资产阶级行列。另外，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拥有第二份工资，以补足一家之主的工资。无论如何今天有50%以上的工人家庭可得到高于4000美元的收入。

这些就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美国的数字。我还要提供给你们一些有关英国的统计数字。1953到1954年，2000万纳税人中有1260万人的收入不到500英镑，也就是50万法郎多一点[1]。由此得出，60%的人的收入确切地说低于小资产阶级的水平。收入在500到1000英镑的有652.5万纳税人。英国是

年为5860万。仅仅从家庭（不含单身个人）看，有62%的家庭收入在3000到10000美元之间。

[1] 所有这些数字都指1957年的法郎，自1957年以来，法郎贬值了30%左右。

一个相对富有的国家，但是毕竟20个家庭中有19个的收入不到1000英镑。超出这个水平的仅有75万个可征税者（纳税人的3.5%）、总共得到收入18.3亿英镑，相当于总收入的18%。让我们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数字。约3.5%的家庭得到的税前收入约占总收入的18%，但要付6.58亿英镑的税收，他们还剩11.71亿，就是说在纳了直接税的94.6亿收入中占差不多12%。这些数字同时向你们说明了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何等的富有，又是何等的不平等。补充一点，在2000到4000英镑这个档次中，税收几乎要拿走全部收入的一半。

这些数字包含了极大的不精确成分，它们缩小了真正的不平等，因为它们不把作为资本的利润（例如数额可能很高的证券交易利润）和交际费用考虑在内。高于1000英镑的税后收入总数为11.71亿英镑，分配给75万个家庭或纳税者。我们假设对每个超出1000英镑收入的家庭征税，人们就必须将税后82.89亿总数中的4.21亿英镑重新分配给1900万受益者，这相当于总数的5%左右。不平等仍然是巨大的，再分配的做法不能显著地改变群众的状况。此外，工业社会的实际状况是，为达到增加5%的收入，用两年时间使经济增长可能比对高收入进行再分配要容易得多。一旦集体财富的数量被最终确定下来，就要不折不扣地按再分配的概念行事。相反，当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3%的时候，对高收入的再分配比一般增长年份所带来的收益还要少。

现在让我们尝试着评论一下其中的几个数字。美国一部分居民资产阶级化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打算普及美国的经验教训，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生活水平的提高归因于国民收入的增加，然后才是出于不平等现象的减少。人们不可能总是观察到日益平等的趋向，这种趋向只有在采取某些方法和扣除某

些统计数字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国民收入中的工资部分没有明显增加是可能的。为了显示不平等现象的减少，人们把1%最富有纳税人的收入和99%余下者的收入进行比较。下面就是美国统计学家库兹尼茨得出的数字。1913年，1%高纳税者获得总收入的16%。1929年，这个比例稍有增长，为17.2%。1939年，比例下降到13.3%，1948年降为9%。还有另一个数字。1913年，在1%的高档次中，平均收入为5679美元，而占99%的那个群体，其平均收入是296美元。今天是12531美元和1272美元之比。换句话说，从1比20过渡到了1比10。在考察欧洲其他国家的统计数字后，我将可以证明这是普遍现象，但是我们要改变方法，运用推理方法。

为了证明欧洲和美国的发展是一样的，必须掌握一种阐述分配变化的理论。人们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事情的经过在美国和在欧洲是同样的。然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不掌握某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普遍分配理论。实际上，我们动摇于两种不完整的、不令人满意的思想之间：一种是乐观的边际效用学说，另一种是悲观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分析美国的现象之前，我要提请你们注意这两种思路的基本因素。

边际效用理论假设工人工资的确定是与边际生产率的水平相适应，也就是说是与生产效率最差的被雇用劳动者的水平相适应。由此，很容易以如下的方式推理：如果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提高，工资就应该同步提高。事实上，与其说人们划了一道最低界限，不如说是最高界限。如果企业主可自由作决定，他将不会在雇用一个新工人时，给予他的工资的价值超出他所提供的劳动的价值。这是明摆着的事。但是企业主不总是必须按效率最差的劳动者的水平来支付工人工资的。此外，人们可以从理论上讨论中等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的差距。最后，应该考虑在悲

观理论中起重大作用的一个因素，即雇用者和被雇用者双方的实力。边际效用理论提出，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来说工资也会提高。工资提高得和生产率一样快吗？如何分配从最低到最高等级的各类工资呢？理论没有能回答这些疑问。

人们认为绝对贫困化是马克思的思想，的确，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引出一些句子，依照他的看法，随着财富积累达到一个极端，贫困积累将达到另一个极端。但是如果你们仔细地阅读《资本论》，你们会发现贫困化不是严格意义的经济机制，而是社会机制。工人工资是由维持工人及其家庭所需商品的成本确定的。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就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必须的商品。在马克思的构想中，丝毫没有排除工人的实际工资会提高，因为必要劳动时间，即为了生产他必需商品的必要时间减少了。除非剥削率提高，否则工人实际工资将上升，这不超出马克思的构想范围。是什么决定了贫困化呢？产业后备军[①]。马克思这样称呼那些因技术革新而被排斥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工人，由此，技术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削弱了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了企业主的实力。由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产业后备军引起工资下降，尽管生产力在发展。失业现象的持久存在阻碍了工人从生产率发展中得益。如果这样的分析是准确的，人们就会懂得为什么在保留《资本论》构想的同时，又可以不得出贫困化的结论。只要设想对抗力量所起的作用足以抵消并超过产业后备军的作用力就行。对抗力量指的是导致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生产率增

① 利润率倾向下降的规律构成一个矛盾因素、危机因素，也许是灾难性因素，但不是绝对贫困化因素，至多是相对贫困化因素（与资本份额减少相应的劳动份额减少）。

长以及工会组织。

贫困化的假设本身并不荒谬。尽管生产率提高，工人工资下降是可以想像的。这种现象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中，只要劳动力过剩，企业主就能以远远低于边际生产率的水平支付工人的工资。但是这样的构想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不是普遍存在的，因为首先出生率下降了，其次产业后备军缩小了，再次工人组织的力量使马克思赋予企业主的实力丧失了。

越是靠近工业化初期，越有可能出现贫困化现象。确实，投资的需要看来才是优先的。去年我们对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工人的贫困化作了长期的研究。投资的巨大比例排除了被雇工人工资的提高。不要忘记在初期阶段劳动力一般都过剩；计划制订者的目的，甚至当下的目的就是为人数尽可能多的可使用劳动力提供工作。为达此目的，或许必须留出最高限度的资本用于再投资，从而削减每个劳动者的所得。发生在苏联式工业化时期的事，也该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式工业化时期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出现，但是那时候资本是通过个人收入体现的，同时造成利润积累于特权者手中，这是马克思观察到并加以抨击的现象。在初期阶段，投资必须占有最大的份额，个人工资的水平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这是一个需要精确研究的统计问题。无论如何，马克思所描绘的在产业后备军压力下的绝对贫困化在任何制度下都可能产生。这是否就是1928年到1938年间苏联的计划制订者所面对的形势呢？他们也面临劳动力多余的现象，不是失业者，而是在农业部门中或多或少没有用处的劳动者(因为没有他们，人们可以获得同样的农业生产量)。领导者们认为关键是要在工业中招募这批后备劳动力，为此必须保持低工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过程似乎更令人反感，因为企业主是特权者，利用因劳动力过剩而拥有的威力来降低生产成本，也就是

降低工资①。

从根本上说，两种机制并不因此就不相同。

---

① 不算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大量描述的女工和童工。

第十二讲

从阶级斗争到既满意又争论

上个星期我们研究了西方式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发展趋向，得出了四种主要趋向：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行政部门的转移，**雇用劳动化**，职业、收入、境况的多重**分化**，最后是数量日益增多的劳动者**资产阶级化**。我也向你们指出了呈金字塔形的工资等级底部和顶部的差距缩小了。我们今天再从这里开始，并思考一下什么是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过程，由此弄明白同样的现象是否该在其他国家重演。

起决定性作用的事实是总收入的提高。哪怕在分配方面没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化的现象也会出现。只要整个金字塔升高了，工人中的最高层必然会达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让我们回顾一下，1929 年，年薪低于 2000 美元档次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 42.7%，1953 年仅占 22.9%。相反，高于 4000 美元档次的在同一时期内从 21% 过渡到 44.9%，1957 年比例应该超过一半。假定这个水平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半美国居民达到了这样的条件。

为什么不平等没有加剧？按照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现象，富人变得更富比穷人不再受穷更为容易，但事实不像人们试图从逻辑上所认为的那样。下述现象属于个人的经历：已经拥有资本的人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的人相比，前者比后者具有多得多的方便条件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因此有一种表面看来

出人意料的现象。通过个人观察,我们大家都想说,如同我们在法国所观察到的那种制度,其本质是富人在那里越来越富,而穷人则不能摆脱贫穷。然而只须将各代人作比较,人们就看到一种相反的现象,不平等仍然很严重,没有完全消失,但逐渐向平等过渡。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收入日趋集中的倾向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这个倾向在二十世纪不占主导地位,被一些对立倾向所抑制。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我想向你们说明的第一点意见如下:在西方式的工业经济中确实有企业不断集中的情况,但相反的是这个现象不引起收入的集中,表面上看来是反常的,实际上是合乎逻辑的。在当前的美国,100 家最大的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除外)的营业额约为 1300 亿美元,这差不多构成美国国民总收入的 1/3,它们雇用 650 万劳动者,相当于美国劳动者的 1/12。但是同时,它们的资本属于几百万股东,它们交纳 120 亿美元的税收。股息的分配相对低下。用作投资的利润以及税款是一笔巨大的数额。

这些数字不该使我们看不到事实,这几百万股东对企业的运转完全没有影响力,掌握管理大权的是经理寡头势力,广大股东则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大公司也不意味着收入的集中,因为它们内部职责有区分,导致酬劳有区别,换句话说,不存在小部分人获取的巨额收入和大群人领取的极低工资,但却有介于最低和最高等级之间的一系列不同级别的酬劳。另外,工人工会不断地向领导施加压力。国家也在税收方面施以压力,力求减低股息份额,提高总利润中用作投资的份额。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发现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某种交错,这一点我曾在上星期预先告诉过你们。社会因素最首要的就是税收制度。在所有西方式的工业文明国家中,直接的累

进税是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不断增长的部分。在英国，人们要向1000到2000英镑年收入档次提取25%的税收，向2000到4000英镑年收入者提取50%，向4000英镑以上年收入者提取高于75%的税收，最大的部分来自于超出6000英镑的年收入者(从1770万中提取1620万)[1]。

国家不同和"合法"或非法的偷税方式不同，制度的有效性就不等。我向你们承认法国的偷税比例高于英国，虽然在我们的邻国有一些巧妙的方法可减少所交税收，而不违背法律的字面意思。即使把偷税情况考虑进去，直接税仍然是一种缩小酬劳不平等的有效方法。第二种社会因素是通过社会保险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不能肯定它永远会导致缩小不平等。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或许绝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社会保险付款，是由工薪劳动者自己来提供的，社会保险在工薪阶层自身内部达到了工资再分配的结果。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中间进行讨论，操作上的技术问题极为复杂。在此我不赘述。

现在来谈不平等缩小的经济因素，首先，来自于每个经济部门的收入部分是变化的。不断有新型企业诞生，老工业所占比例减少。农业收入的比例呈下降的趋势。地产致富的稳定性已成为往事。这可防止不平等的加剧，一代比一代更为明显，这是因为现代经济结构不是一次性地被固定下来的。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持续变化，这为一些新人提供获取可贵收入的可能性，这也可能使某些巨富变得相对贫穷。

我在谈及雇用劳动化时分析的现象也必然在同样意义上发挥作用。在日益增多的人成为雇用劳动者的情况下，不平等主

---

[1] 考虑到作为资本的利润和种种钻法律空子的"合法"偷税方法，这些数字应该被修正。

要决定于工资的不平等。而缩小工资不平等是很容易的，我把这称做等级底部和顶部之间的差距。资本家的确实收入即利润在总收入中占的份额越少，越容易想像一种日趋平等的倾向。这样我们就触及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现象。

二十世纪期间，人们所说的资本收入与总收入相比呈持续下降趋势。这个现象常常被人们忽视，因而值得加以强调。这个过程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通常有通货膨胀、所分股息下降、遗产税、地产收益降低。对高收入课以高额累进税发挥相似的作用。让我们举几个例子：在 1929 年的美国（数字以当时美元价值来表达，对固定购买力我不打折扣），个人收入总共为 850 亿美元，其中工资和薪金为 510 亿美元，而资本收入大约有 330 亿美元，几乎是总数的 40%。1955 年，在 3060 亿的总数中，劳动收入为 2160 亿，只剩下 760 亿是利润、股息和利息。百分比降到 25% 以下。另一个数字：1929 年，在总共 95 亿美元的公司利润中，公司分发了 58 亿股息，超过总数一半。1955 年分发的股息上升至 110 亿，差不多仅占 410 亿总数的 1/4。在英国，这个现象呈现出同等程度的变化：1955 年，私人税前收入达到 156.88 亿英镑，其中工资和薪金占 100 亿稍出头。混合收入即个体企业主的收入为 17 亿，利润、股息和利息为 18 亿。下面就是分配比例：独立经营者 11%；资本 12—13%；转移资金 7—8%。工资和薪金占 2/3。占 12—13% 的资本收入与战前 1939 年相比降低了约 50%。

上述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现象发生在所有被称为资本主义文明或民主文明的西方国家（甚至在以不同发展道路闻名的国家里）。我要向你们指出法国的发展特色。第一个特色我在上星期已经提到过，那就是**对雇用劳动化的抵制力**，这体现在以下形式的统计数字中：混合收入在英国占 12%，在美国更少，在

法国却占总数的30%以上。按"独立经营者"这个词的含义理解,它所包括的人从严格意义上说不都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融合,就是说尚未把利润和工资区分开的人,因为他们既是自己的雇主,又是自己的雇员。

第二点法国的发展特色是,法国的资本收入部分比其他国家下降得更多。这个判断在外国评论家那里被认为是出人意料的,因为他们通常用法国资本主义的保守性来解释法国的社会困难。这种解释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里的通货膨胀比其他地方更厉害也是确凿的。利率被人为地维持在很低的水平。靠国家的定期利息生活的人都破产了。因此,严格意义的资本收入部分在法国占总收入的5%,而在英国和美国这个百分比是前者的两倍多,这难道不该使人感到奇怪吗?

我们社会的第三个特色值得强调一下,这就是转移收入的比例比其他任何西方文明国家都高。人们把这叫做家庭补助金或生活补助金,大体上说,保尔挣的收入转移给了皮埃尔,或者说收入没有归于挣这笔收入的人,而是通过国家或者社会保险转给了另一个人。这笔资金在法国相当于总收入的15%,几乎是英国比例的两倍,是美国比例的两倍以上。在西方大国经济中,我们观察到一种最不具资本主义特点、同时包含最多再分配成分的经济,从根本上说这是反常现象。确实,一种经济的"雇用劳动"成分越少,对收入进行转移的困难就越大。最难征税的社会类别的确是混合收入类别。我认为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够非常有效地向私有农民和私营商人征税。在一个社会中,如果雇用劳动化很不发达,收入转移却极其发展,这个社会便包含着经济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随后就会以抗议或社会危机的形式表

现出来[1]

如果这些分析是正确的，人们可以得出结论，部分劳动者的资产阶级化和不平等缩小的现象将在所有民主工业文明国家产生，条件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美国发生的事不是例外和不正常的。在欧洲也有强大的工会、直接税制、股息配额的下降、劳动的分化，从而也有再分配。是否可以从这些现象中得出有关不平等的争论一去不复返的结论呢？这个结论好像很荒谬。即使作出人人都通情达理的假设（这自然是一种不真实的假设），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这里有多种原因，我尽量向你们进行解释，以使我在前面阐述中可能无意给你们留下的乐观主义印象得到控制。资本或财富的不平等仍然是巨大的，不能肯定地说资本的分配今天比一代人或两代人之前更加平等。这个事实对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没什么重要影响。新的现象是，尽管资本分配不平等，却可能存在把收入拉平的趋势。但那些认为财富严重不均本身就是不公正的人，有充分理由继续揭露当前的社会。财产的分配仍然以非常不平等的方式在进行，因为人们没有取消遗产，每一代人中还有少数特权者。

再者，我给你们大致描述的变化并不排斥收入不平等现象仍然是严重的，即使假设那些数字都是确凿的。在美国，年收入从低于 2000 或 1000 美元到几十万美元不等。然而，如果最低收入足以保证公众舆论所认为的体面生活水平，那么人们就可以说，等级属于社会结构。事实上，从总体上说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不是分配最平等的国家），在那里 16% 到 20% 的居民所挣

[1] 从我们讲授这个课程那天以来，法国发生的变化迫使我们对这个论断作细微的修正：经济增长和雇用劳动化都加快了步伐。

的收入少于公众意识认为的可容忍的最起码收入①。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众多善良人的反应,他们宣称:在一个财富足以使所有人都能过体面生活的国家里,还有那么多穷苦的人,这是奇耻大辱。

熊彼特类型的经济学家是这样参与争论的,他们对我们说:把五十年来产生的变化延长半个世纪,这部分令人反感的贫困现象也将消失。这是可能的,但并非人人都是经济学家,对这个表面看来在这方面并非最不完美但却值得严厉指责的社会,即使是科学家也可能产生不太理智但更人道的反应。一个像美国那样的集体在理论上有可能消灭极端贫困现象。而这种可能性没有被实现。我不能确信任何社会制度都可完全消除这些残余现象。一切社会都可能包含某种很难缩减的不完美系数,不得不听任10%到15%的人遭到失败,这些人可以说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或者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才能,或者因为他们运气坏,或者因为他们具有叛逆精神。我既不肯定也不否定通过某种适当的组织来消除悲惨现象② 的可能性。我要说的是,经济-社会变化没有使抗议者们丧失具有说服力的论据,没有导致他们热情地欢呼在收入平等化方面至今已取得的成果。

最后,税收统计数字是靠不住的。在英国的例子中,极少数

① 1963年7月,《经济学家》杂志在评论劳动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时写道:"根据美国的标准,几乎有1/3的美国家庭是贫困的。统计学家建议把贫困线划在4000美元收入的4口之家和2000美元收入的单身个人。这样就会有5000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穷人'中包括1100万10岁到20岁的儿童或年轻人,800万65岁以上的人(占'老年人'的一半),1200万黑人(这类人显然与其他类别是交叉的),剩下的是波多黎各人和其他少数种族,还有在落后地区或衰落工业部门中的贫苦的白人。"

② 在美国,种族混杂加剧了部分人生活于社会边缘的现象。白人、黑人、波多黎各人得到的不是同等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没有平等的感受。

家庭正式年收入竟高达5000英镑以上，对此人们不可能不感到震惊 如果人们把税务清单同在公路上行驶的劳斯莱斯小轿车的数量比较，就会对错误的起因出在某个地方深信不疑。资本收益没有被征税，没有列入税收统计中。列入图表的累进税税率分档针对的是扣除开支的纯收入，也就是有弹性的收入，会计师可以在其中施展他的创造才能。随着纯收入的级别往上升，扣除的比例也合法地增加。开支最大的是最有钱的人。这个判断从财政角度看是不容置疑的。从道义上讲，谁都不认为这个判断是令人反感的。无论如何，真正的不平等比税收统计所显示出来的更为严重。

存在于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是否公正以及每种酬劳是否有恰当的存在理由，对这些问题人们还有原则上的争论。很多人认为，来自于资本的收入本身就是该受到谴责的，薪金的不等是合理的，因为它与职务的不同相符合，利润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不是通过劳动所得。当然，批评家不是不知道利润的再分配不会明显地改善广大群众的境况。但是如果不要求再分配，他们就能继续从原则上加以谴责。一旦利润额度不再对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重大影响，谴责的作用就减弱了。从政治角度看，狂热的情绪会趋于缓和，但争论并不因此而变成学院式的。

最后有一种现象使人常常对不平等的争论表现得异常激烈，在集团之间和每个集团内部存在令人反感的不平等。譬如，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农业劳动者交纳极少的直接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可能纳税，因为他们的收入过于微薄。但是成功的农业企业经营者也只交纳少量的税，由此引起雇用劳动者的抗议 从土地上获得的剩余价值可使人成为巨富，可以说不劳而获。不平等就这样产生和加剧了，观察者不觉得这符合于公正原则。也许这里有某些根本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也许

有一天苏联式社会)的本质在于人们总是对收入分配提出异议。他们不可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社会是追求物质享受的，不赋予苦行主义以任何价值。从人们开始注重达到尽可能高的购买力起，每时每刻都在问自己某种分配制度是否公正，这是很正常的。因此人们将继续争论下去，至少只要当绝对富足、各取所需的阶段还没有到来的时候。然而，随着工业社会朝着财富更充裕、不平等逐渐消除的方向发展，论战的紧张和激烈程度都会自然减弱。

因此现在要涉及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不同集团为国民收入分配而展开斗争，有关斗争的形式和特点，人们在工业社会中观察到的是什么趋向？在我看来有如下趋向：**渐渐摆脱消极状态；加紧展开请愿活动；革命运动的势头和运用暴力的癖好逐渐减弱**。我试着对这三种现象作一些说明：

一、渐渐摆脱消极状态：从前，一大部分人按传统习惯生活，把某种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看做命该如此，不指望有所改善。我所说的社会消极性简单地说就是缺乏要求，不期望更美好的境遇。而无疑令某一类保守派大感失望的是，工业社会的特征同时体现为集体财富的增加和众人要求的提高。这种现象是符合逻辑的，正常的，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本质相适应，对此义愤填膺是极其荒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司经理往往遗憾地看到，当其他类型文明国家的劳动者在获得了一定的收入后，就以为得到了他们必须的东西，于是不再劳动，并对可能的额外收入无动于衷。尽管劳动者的这种态度在一个不同的社会范围内从很多方面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一切工业社会希望予以消灭的。人们不可能让法国人学会期望更多地得到，同时却不促使他们去请愿。固守传统生活的居民比例越来越缩小，这符合于我们文明发展的逻辑趋势，而且几乎是必然趋势。

二,同时,我们说有越来越多的请愿活动,越来越多的请愿理由,越来越多组织起来的个人和集团意识到他们的当前收入和周围人收入之差距,于是起来抗议,反对缩减他们的财富或者增加得不够,至少相比之下不如另一部分人享受到的增加幅度。请愿与比较不可分割。与工业文明相结合的民主的本质表现为一种持续动荡的状态。如果人们想消除这些请愿和抗议,就必须采取会带来不祥后果的断然措施,就必须承认某一个特殊集团对何为公正或不公正有最终说了算的权利,必须是一小部分人以上帝、历史或种族的名义迫使其他人闭嘴,并以集体利益为名分配收入。借助某个集团的绝对权威对于工业社会来说永远是可能的或者是一种愿望。**承认冲突,不缓和冲突,这不是工业社会的正常状态,正常的是阻止冲突变得更为剧烈。**

三,由此得出第三个判断:一般地说,诉诸暴力和革命运动的倾向减弱了。在什么情况下,请愿有走向极端的趋势?首先,在工资降低、失业、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还有,如果我们今天假设这些因素同时在美国出现,剧烈的反应将会令人担忧。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种可能性不会产生,因为美国政府将竭尽全力去阻止,包括全面计划化,宁肯如此也不能接受造成大批失业的严重危机。(不言而喻,计划化是以自由经营的名义来推行的。)当前,工业社会或许经受不了如同三十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我向你们指出的趋向是以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规律性增长为条件的,但我们不能把这视为担保。另外,在经济发展时期,工人组织、一般来说还有不同社会集团的代表,不可能不承认和解及妥协比战斗会产生更良好的结果,只要他们除了收入再分配没有其他的目的。美国工会对学说或思想体系不很关注,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不感兴趣,他们宁肯同老板争论,也不喜欢同国家争论,他们时常争取到小时工资的提高。他们为什么还要

运用暴力呢？尤其因为在任何组织中，集体行为决定于一部分领导人，所以更不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大工会的书记们都有令人满意的经济状况以及一定的威望和权力。所谓的革命口号，夺取国家政权的口号会使他们直接处于政治领袖们的控制之下。只要当局一直承认工会独立的权利，不打算以由一个政党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名义任命工会的领导，工会书记们就会意识到自己有更多的自由，特别是个人安全更有保障。

在一种不断发展的经济制度中，不同社会集团处于和平冲突状态是正常的，也是处于持久论战的状态，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然，采取暴力的可能仍然或多或少存在：罢工就是一种。必须在什么情况下人们才可能从有关国民收入分配这个关键问题的和平论战中走出来，并进入英勇、抒情或恐怖的革命阶段？实际上，必须有两种似乎矛盾但密不可分的感情：希望和失望。人们必须处于他们认为从根本上无法接受的处境中并设想有另一种现实。而不管人们为之遗憾或为之庆幸，像瑞典或挪威那样的民主、和平的工业社会既不令人失望，也不使人满怀希望。社会处于半满意半抗议的状态。人们接受整体，反对局部。这种既满意又争论的状态离革命的气氛最遥远。

二十世纪中叶，希望和失望同时从工业社会消失，如果有人为此感到遗憾，那是他的自由，也许这两种感情同时离去是不可避免的。总之，也许法国（它不完全符合我刚才描绘的和平争论标准）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怀有希望的人和感到失望的人都很多。也许在我们这里存在所谓的革命气氛是缺少思想上的怀疑主义所致。我这个人非常乐意批判救世主降临说，可我有时还是禁不住怀念失望中孕育巨大希望的时代，虽然在我看来既满意又争论归根结底是今天最可令人接受的社会状态。最可令

人接受,但不是最令人振奋[1]

---

① 1963年,法国也符合了和平争论的标准。只有在一些小宗派中可找到革命者,而共产党人则从来没有像这时候那么保守过。

社会发展加快了速度。1954到1962年,农业经营者的人数下降了24.4%,农业雇工下降了28%。1962年,前者仅占劳动力的15.7%,后者占4.3%,而1954年各占20.8%和6%。同样,**雇用劳动化**的进程也加快了:工商业部门中老板的数量在上述两个年代之间下降了13.1%,而高级管理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增加了37.4%(在全部就业人员中的百分比从2.8%上升至4%),中级管理人员、职员和工人分别增加了30.8%、16.3%、8.8%。

第十三讲

客观区分、社会差别、阶级意识

在上一讲中，我研究了西方社会的两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引起集体财富分配发生变化的进程，这些变化产生的后果对各集团为国民收入分配而展开斗争的性质有什么影响。我有意跳过了经济现象——资产阶级化，以及社会现象——相对和平状态之间的中间环节。今天我要来谈这个话题。

简单地说，我将做四方面的分析：

一、个人或集团生活方式的客观区分；

二、这些集团间的社会差别；

三、每个集团的自我意识以及对自身是统一整体的意识程度；

四、各不同集团对它们的存在和互相分离的接受程度或拒绝程度

我要尽力为上述四个互有联系但又没有严密关系的提法确定含义。

关于第一种现象，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它基于收入的不同。在财富不平等和生活方式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关系，但同样多的钱必然有同样的使用方法，这也不确实。你们大家都了解莫里斯·阿尔布瓦克斯对各社会集团的开支分配所作的研究。一般来说，同样的收入，工人比小资产者在食品上开销更大，在住房上花费较小。在社会学研究中，开支分配和生活方式并不比生

活水平更不重要。趋向于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并不能抹去生活方式的微小差别。

第二种现象更难定义。因缺少更恰当的词,我把它叫做**社会差别**,我首先要求助于你们可能想到的直接含义。当您遇见某个人,与您是一国的同胞,但是他的职业及收入与您的迥然不同,您几乎会本能地感到他和您之间的差距。当西方旅行者跑到印度这样的国家,他会产生强烈印象,因为在各处下榻豪华旅馆的旅游者同流落于街头的穷苦人之间往往有天壤之别,在他们之间不再存在可以替代的最小共同点。差别悬殊到双方都不再可能意识到人类的共同性。我记得新德里的玫瑰清真寺和为我作向导的穆斯林,真好像他不认为自己和我是同类,我感到自己是突然从另一个星球掉下来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鸿沟是不可逾越的,以至在法国您不可能抱有这样的印象。因为资产者和工人的极端差别与鸿沟相比毫无共同之处,可它存在于寄宿加尔各答街头的穷人和大资产者有时甚至是印度共和国的社会党领袖之间。法国的极端差别永远消除不了人们的共同感。在所有现代社会里,人和人之间同时都存在双重感觉,**共同感**:我们属于同类、同一民族、同一宗教,**相异感**:工人和资产者不完全属于同一世界。

第三种中间现象是**集团的意识**。通常在最不顺利的人身上没有这种意识。再举印度为例,最穷困的人也许意识不到属于某个特定的(除了他们种姓之外的)共同体,他们可能因其贫困而彼此相隔离开。在收入水平、客观的生活方式和条件类似的人对他们共同性的意识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最后我要求你们把集团意识(或阶级意识)的强弱程度和对集团间分离的接受或拒绝严格加以区分。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工人感到自己属于无产阶级,同时断定他付出的劳动或履行的

职责不比其他人所做的价值小。他感到自己属于一个工人共同体并认为在整个社会内部作这样的划分是自然的。我考虑到的情况不是想像出来的，根据已有的研究，英国工人有阶级意识，但并不因此就反对社会等级。也许法国的形势是向相反方向发展的。

我们知道了如何区分这四种现象，现在我要从每个现象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发展趋向。

首先，经济发展趋向对生活条件的客观差别有什么作用？人们禁不住马上回答，如果收入的不均趋于缩小，生活方式的差别同时也应该缩小。大体上从长远看这是事实。但是这个判断太显而易见——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以至没有多大意思。应该在这个范围以外去寻找答案。

我将要先问自己：在什么程度上经济不平等的缩小会趋向于消灭极端贫困现象？关于这一点，我看答案是这样的：直至目前还没有先例证明贫困社会能够消除悲惨的生活条件，这些集体还是非常不平等（也许共产党中国正力图创造一个例外）。这个判断对于道德学家来说是令人不快的，从良心上说是令人反感的。人们可能想像，普遍贫困现象越是突出，社会越是平等。事实上，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事情正相反。从人均收入很低的意义上说，被称做不发达国家的社会财富是贫乏的，分配极为不均。例如在印度，消灭极端贫困的现象是绝对不可能的。出于人道主义本身考虑，应该使人们把力量放在创造财富、改善农业、实行工业化上面，而不是去援助几百万无法拯救的穷人。我知道这个判断是可怕的，但事实是，人们不能设想平等的政策出现在一个与财富相比之下人口过剩到超出一定极限的国家。

如果我们把不发达国家放在一边，原则上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它们，如果我们观察西方国家，另一个判断值得强调一下：在

总体经济增长和“赤贫现象消除”之间没有精确的比例关系。赤贫现象的消灭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或在英国比在美国更有效，虽然美国拥有更多的财富。换句话说，消灭贫困的必要条件是整个集体最起码的发展，但是这个必要条件尚不够。

怎样解释我刚才给你们指出的明显的反常现象？首先，美国同其他国家相比是一个特殊情况，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多民族和多种族的国家，直到目前，它一直支持无产阶级中受剥削最重的阶层的长期存在，这个阶层的地位低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如果可以说的话，也低于产业工人。这就是严重阻碍强烈阶级意识形成的因素之一。今天在南方或在靠近墨西哥的州里，仍然生活着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中的最低阶层，或是有色人种，或是来自于邻国的人，他们几乎不能从全体美国人民的高生活水平中得益。第二个原因完全不同，就是美国直到现在没有家庭补助金。它赞同并认为由于家庭成员人数的差异而造成生活水平的悬殊是正常的。某些工人家庭有双份工资，收入可达到6000或7000美元，相当于200万到250万法郎[①]，这意味着高生活水平；相反，一个有众多孩子却只有一份工资的家庭是贫穷的，有时接近于赤贫。直至目前(人们看到一种逐渐变化过程)，美国的国家思想体系始终同意进行竞争，并根据斗争结果优胜劣汰。这个思想体系并不意味着收入的分配应该主要由满足需要来决定；满足需要是个人之间竞争的副产品和结果，被认为是公正的和符合集体利益的。这些现象正缓慢地发展变化，但当你参观美国的时候，你会感到那里的不平等和种种差异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更为突出。在这方面，战后变化最大的国家或许是英国。

---

① 相当于1963年的3000到3500法郎。

五十年前，从实力看，这个国家处于世界最前列，它自己也这么认为。它拥有一个扩展到各大洲的庞大帝国，但同时有1/3的英国人吃不饱。五十年后的今天，英国变成一个二等强国，一个控制不了其港口的进出的岛国要依赖主宰海洋的强国。因此英国要依赖于美国。但是在这个衰落时期，它几乎消灭了吃不饱现象，英国人从来没有生活得像现在这样平静和舒适，尽管时而有罢工发生[1]。我认为我刚才作的对照可能对某些民族主义思想家思考这个问题时有裨益，他们还没有懂得二十世纪的经济或社会现象不再像以往可能的那样决定于政治力量的关系。外交官在国际会议上享有的威望和人民的生活条件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法国的情况处于中间。显然这里比英国有更多的贫穷现象，主要原因有两个。还存在住房危机，这是由四十年来的政府管理一步步形成的后果。1914年以来的房租立法导致今天的紧缺，这是可预见的无情事实。种种事件和战争等又自然地加剧了这种状况。当前的努力使情况逐渐有所好转，但还会有很多年，同样收入的家庭将呈现极端的差别，因为有的拥有住宅，有的则生活在旅店。第二个原因是法国今天仍然是一个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国家，它的某些经济部门和地区还没有现代化。在某些乡村地区，农民生活在极度贫困的条件下，他们紧紧地抓住小块土地，企图保持一种习惯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些现象只有通过普遍的现代化才能消除。相反的是，法国比英国更有别于美国，它实行家庭补助制度，把按家庭必需来分配收入的倾向推到极端。从消灭极端贫困现象的意义上说这是有效用

[1] 英国社会内的社会差别仍然极其明显，人民和权势集团之间的差距是相当大的

的。

现在我们提出下面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缩小经济不平等的结果能使不同社会集团的生活条件逐渐走向一致？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突变概念、界限概念。你们也许记得，当我考察美国的收入分配时，我指出了收入高于4000美元的美国家庭比例。选择这条界线包含武断因素，但是具有某种意义：存在一些突变点或突破点。最低工资的任何提高不都立即趋向于拉近生活条件。收入必须达到一定高度，使人有可能一方面差不多像所谓的资产阶级那样吃穿，另一方面还有余钱购买耐用消费资料。如果总体财富增加了，整体水平提高了，生活条件有可能趋于一致，而统计数字并不反映不平等的重大缩小。当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根据数字断定有平等化的倾向时，他们不一定总能发现当事人所感受到的社会现象。当工人家庭几乎能够像小资产者那样吃住时，心理学家确实可为统计数字提供进一步证明。这等于说生活条件趋于一致的倾向是基于总体财富的增长以及不平等的缩小。两个变数都起作用，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在美国，造成表面上一致的是这样的事实：不管不平等达到什么程度，日益增多的工人家庭掌握足够的收入，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宅，吃得像资产阶级一样，甚至可以说穿得同他们一样。

如果是这样，工业社会确实在朝生活方式一致的方向发展（再一次说，其中有种种必要的保留）。在瑞典，这种趋于一致已经非常令人震惊，但是暂且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美国（那里有50%到60%的居民生活方式趋于一致）放在一边，任何处于中间状态的西方国家，如英国和法国都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即总体财富的增长导致客观上相似的生活方式阶段。今天，收入的不等在英国和在我们国家一样，造成的结果仍然是完全不同的

生活方式，这现象暂时不可克服。任何社会改革都没有能力在短期内使差距缩小。最大限度地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是可行的，却不能产生被期望的或可期望的生活条件趋于一致。

我补充一句，这样一种最大限度是难以确定的。在民主制度下，再分配因特权阶层掌握的防范手段而受到限制；在专制制度下，再分配则受到掌权者同时又是特权者这一事实的限制。权贵们从理论上说有可能把收入再分配给最穷苦的人，但应该在给予穷人补偿的同时也给予他们同样多的能力，抽象地说这可以想像，历史上却罕见。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下面的判断。在最富有的社会中，我们看到人数不断扩大的一部分人在可观察到的生活方式上越来越相似，如果人们设想经济按近十五年来的速度继续增长，小资产者的队伍将壮大，同样，上述的相似性将更为突出。但是当前，在绝大部分西方国家，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方面的问题，即物质差异和社会差别之间的关系。两种差别的缩小不成比例关系。我将以英国的情况为例。收入的差距明显缩小了，首先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其次大体是在工人工资和非体力劳动者的薪水之间。尽管从经济角度甚至社会角度看互相靠近了，今天各集团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在我看来差不多仍然和过去一样不同。特权集团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巨大差别依然存在。英国领导阶层和民众阶层之间的差别依我看明显地大于法国（然而在英国，人们接受与对方的这种差别）。

英国的传统几乎是贵族式的，我觉得英国的上述特点是其残存的传统造成的结果，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切制度中最顽固维持社会差别的是教育制度，它仍然是完全不平等的。先来看

一看"公学",法国人通常说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们是私立学校,在那里寄宿的是特权阶层的孩子。上等人家庭的勃勃雄心往往是让他们的孩子能在这些名牌学校里受教育。一般家庭的孩子也有可能领取助学金上"公学",但人们是在不改变教育体制的前提下来增加这样的社会流动的。一个小资产者的儿子必须适应他同学们的半贵族作风。

中等教育按同样的思路加以组织,即**文法学校**和其他中学的区分。如果法国的一切中学不提供 A、B、C、D 所有等级,而是某些学校专门为 A(或者 A 和 A')等级,另一些专门为 B 等级等等,那么法国的制度也会像英国的一样。换句话说,优秀学生将集中在某类学校中,几乎所有大学生都会出自于这些学校,而其他所谓的现代学校或技术学校将汇集 B、C、D 各等级。惟一包括全部这些等级的学校叫做**综合中学**,这类学校在英国是有争议的,有时引起激烈的论战

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教育制度把学生分成等级,是否可以说从他们年少时开始,制度就把社会阶层间的差别扩大了。一两年前,有一篇关于精神生活的社会学文章,研究不同集团口头语言的特点和上层阶级特有的词汇和发音。作者举例列出特权者使用的词以及一般由小资产阶级和民众阶层使用的同义词。这类现象的趋向不是在社会集团间制造斗争,而是使人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隔离感,因为没有更恰当的词,我称之为社会差别。此外,上层阶级保留了某些贵族习惯或半贵族习惯。当然这个阶级是旧贵族和中产阶级(英语中的 middle class)混杂的结果。假定它是贵族阶级,这就是一个从事工作的贵族阶级,而不是一个奢华或闲暇的阶级。不管怎样,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大陆上的资产阶级。

况且,给法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无论社会差距多大,这

些彼此不平等的集团却维持相互的沟通。这种状态能持续下去吗？这是另一个问题：社会流动越大，想使社会地位升高的欲望越强烈，可能将越是难以既维护平等社会的原则，又保持差别的现象。当前，英国干了一件靠不住的好事：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缩小经济不平等，同时又顽固地、谨慎地保持社会差异。这种结合不管能否持久，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榜样。

在美国，如果排除种族和民族差异的因素，社会差别当然相对较小，部分是基于人民的心理。在英国，直到最近，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还被看做符合正常秩序，甚至几乎是永恒的秩序，而在美国，经济不平等是严重的，但是官方的思想基本上是平等思想。人们能够和平相处是由于普遍的信仰，在法国我们把这种信仰概括为一句格言："所有士兵的弹盒里都有元帅权杖。"思想从来都没有忠实地合乎任何社会的现实，但是思想却完全有助于填补事实不平等和法律平等之间的距离，或者克服两者的矛盾。此外，美国从来没有过严格意义上的贵族。最后，全民族的思想方法是中产阶级的思想方法。绝大部分美国人自认为属于这个阶级。它是代表全社会特征的阶级，随着收入有足够提高的工人数量的增加，把自己算在这个阶级内的人也增加了。因肤色不同或甚至原有国籍不同，社会差别是巨大的，但有关与工业社会结构相关联的现象，美国的差别比英国的小。

第二类问题关系到阶级意识的强度。下面是最重要的问题：众多个人的生活方式相似，却尚未由此导致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属于一个叫做阶级的集团。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知识分子谈论阶级意识时往往把它归于工人阶级，但一般来说，知识分子自己没有这样的感受。况且，特别因为他们更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才谈论阶级意识，就是说他们虽不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但在思

想上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对阶级归属问题，有的小资产者回答说属于中产阶级，有的回答说属于工人阶级。在上述两种情况中，他们的阶级意识似乎都不很强烈。由此产生下面的问题：从什么意义上说阶级意识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化？

我不认为可以看出一种惟一的趋向。现象是多样化的和矛盾的。在西方社会里，集团倾向于组织起来，二十世纪中叶，各集团比以往更意识到并更有能力捍卫各自的利益。甜菜生产者、冶金工人、小商人都感到被利益连结在一起，他们更多地感觉到属于某个确定的经济-社会集团。但他们并不因此就觉得这个经济-社会集团与其他集团相分离，是一个根本上独特的集团。

最重要的问题是阶级意识在产业工人身上的变化。对此人们讨论得很多。我不打算给你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作为客观的社会学家，很难从外部去研究这个问题。并不是社会学家没有做过这件事，而是往往他们在工人身上没有发现他们事先归于工人的某种意识，或者发现了他们先前不承认的某种意识。因此我仅仅作几点至少在我看来可能成立的说明。

我们来看英国的情况。对此进行研究的英国社会学家比他们大陆上的同行有优越性，他们不很关心马克思主义，这使他们对研究对象抱有更客观的态度。

首先，工人阶级内部的等级发生了变化。当前，在技术工人和其他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比在一个世纪前缩小了。工人贵族在人数和重要性上都失去了优势。熟练工人构成绝大多数[①]。正如你们所知，上个世纪的英国工会运动往往是由工人中的优

① 这些判断不是对所有工业部门都合适。如果说上个世纪的"熟练工人"几乎不再存在，那么机器检验员和准工程师成倍增加了。

秀分子组织和领导的。工会聚集其成员更多地是按技术级别，而不是按工业部门。今天英国的工人阶级变得更加清一色。在同一时期内，工人组织中原有的无产阶级特色也趋于消失。那些以保卫、请愿或文化为目的的自发组织被当今的工会所取代，后者一方面要比前者强大得多，另一方面则更缺乏自主性，更失去了上个世纪工会所具有的工人阶级特色。社会保险成了国家管理的领域，工人创立的互助组织不再存在，已由国家行政机构取而代之。

最后要讲的是一个可能被你们诅咒或者赞颂的现象，即对可能存在的工人文化的排斥，代之以你们将称作半文化或假文化或大众文化的东西，这种文化在广播和电视中传播，确实被全体民众接受，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并且肯定有效。当前，根据观察家告诉我们的事实，电台尤其是电视（在英国，后一种媒体主要是大众娱乐工具）传播的内容不具有某个特定阶级的特色，而是社会上层文化经过某种普及化的产物。因此，平民阶级的自主活动越来越少，同时，极少数被称为有教养的文化人（他们声称对大众传媒工具中播出的内容感到厌恶）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非常大。

英国工人阶级是清一色的，但几乎被剥夺了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说这个阶级或多或少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呢？不容置疑，英国工人阶级是这么认识自己的。但是这种阶级意识目前没有了好斗性，不再像过去那样以原有的文化行为显示出来。也许电视文化（或多或少）更有价值。无论如何，电视文化不是人民大众创造的，他们接受它，请允许我大胆地说，他们不得不承受它，不管这是掌握**大众媒体**垄断权的国家强加给他们的，还是因得益于民主制度而存在的某种多样化。在后一种情况下，大众传媒工具不具有“政治性”。悲观主义者会说通过

非政治性达到具有政治性。似乎"中性"的电视节目是使人民脱离政治的极妙办法。

我们该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当工党执政的时候，工人在什么程度上感到他们自己是执政者？我们回到了无产阶级和政党关系的著名问题。当艾德礼先生或盖茨克尔先生居住在唐宁街十号的时候，英国工人是否感到自己进了政府？实际上，他们似乎继续说"我们和他们(或光说他们)"，不管这个"他们"指的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无论怎样，相比之下，当从前的工会总书记或工党议员执政时，工人更多地感觉到是参与了公众事务的管理。对此很难加以判断，因为必须深入人们的意识。应该以一种谨慎的说法承认，不管执政的是什么政党，国家总是既遥远又有权威。归根结底，个人自己管理的只能是他们周围的事务。不能由此得出工人政党上台没有任何意义的结论，也许这是人们可以给予工人阶级上台执政概念的惟一含义，但是必须知道这样的上台执政是通过中介的，也就是象征性的。

接下来，我还剩最后一个问题需要探讨。差别可能被人们接受，这是英国的情况，或者可能像法国那样被人们拒绝，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我将在下一次讲课中要阐述的问题：决定人们对集团分离采取何种态度的可变因素是什么？社会内部的流动在什么程度上有利于这种或那种态度的产生？

第十四讲

阶级和社会流动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讲最后我们讲到的那一点。我区分了社会集团产生分离的四个方面:收入不同,生活方式有差别,各自意识到区别于其他集团的共同点和特点,最后,接受或者拒绝这些差异。

我给你们谈的第三个方面是意识到自身的共同点,而我避免对发展趋向作一般的判断,因为我们从事的研究不允许有过于明确的断言。社会部门不同,观察到的现象就有差异。在通常被叫做中产阶级的集团内,人们会发现代表部分人利益的组织,可能是商人、医生、教师,他们越来越有组织,于是就有了示威、抗议、请愿的手段。然而在一个规模大到足以用阶级这个词来形容的集团里,人们却看不到对自身共同点的觉悟。在危机时期,不同集团起来反对无产阶级或者反对上层阶级的事时有发生,但在正常时期,出于利益考虑而组织起来比意识到属于"中产阶级"更为明确。同样,我几乎不认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和平时期会非常突出。相反,在激烈冲突的阶段,人们会聚集力量反对革命威胁,但在这种情况下,恰当地说这是一场政治斗争。

关于工人阶级,我首先有保留地强调不断增长的趋同性,其次强调资产阶级化趋向,以及今天的工人在工会或文化活动中渐渐丧失主动性和无产阶级独特性的趋向。在这两种现象中,

第二种是普遍的，一切有诸如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工具进行传播的地方，无产阶级吸收的不是它自己创造的的东西，而是外部强加于它的东西。上个世纪工人优秀分子独有的创造成果似乎到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相反，时而观察到的趋同方面也并不普遍。在美国，差别依然很严重，因等级不同和原国籍不同而异。如果说在所有国家里熟练工人是可以互相替代的话，新工业包含的往往是技术要求更高的任务。

至于"无产阶级意识"，这是一种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指两种经验。或者人们针对的是工厂中劳动者的经验以及他们与机器和企业领导的关系；或者人们想到的是工人的政治经验，工人对他们与全体同类的关系和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看法。第一种经验取决于多种变化因素（车间的组织、技术熟练程度、领导素质等）；至于政治经验，它主要决定于组织，就是工会和政党，总之是取决于启发工会和政党领导行为的思想体系。

我们就此过渡到最后一个问题，即非特权者接受不接受集团间区分的问题。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心理现象，它不单纯决定于已知社会的公正性。在我们看来极端不公平的阶级不平等有时已习以为常或者成为明摆着的事，至于其他一些不平等现象，人们常常拒绝接受，依我们看，它们即使不算公平，至少也是不可避免和有限的。

人们观察到两种根本不同的接受形式：一种是传统的、未经思考的，另一种是有意识的。如果你们想到过去的社会，如果你们访问一些今天的不发达国家，你们会发现下层集团的成员视他们的地位为当然的事。有时他们几乎意识不到这点。他们同其他人的地位之间存在的极端不平等好像是命中注定。经济发展的结果动摇了这种态度。它摧毁了人们对一种"天经地义"的秩序的信仰。因此，随着经济增长，社会愈加动荡不安，这现象

丝毫不出人意料，却使不知不觉转而赞同某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家震惊不已。即使如果以往的消极接受不被有意识地接受所取代，那么在社会经济条件有可能改善的同时，反叛倾向也会加剧。经过思考以后接受职业和集团的分化，并以此逐渐取代逆来顺受的态度，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人人都接受职业的不同，但并不都接受集团的差异。但有时候，集团承认他们之间的相异性和必要的合作，即使不把收入等级和威望等级看做绝对公正，至少也认为与人类生存能相容。

怎样对可观察到的变化加以分析呢？关于这一点，我只能把可变因素反复罗列出来，因为任何简单的理论都解释不了为什么直到今天英国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差别，而法国工人却不接受，一个国家的差别不比另一个更突出。首先起作用的是劳动者对劳动的满意程度，这取决于劳动的组织方法。表现在思想上的反抗情绪往往是技术错误或者专横作风引发的。我不认为只要劳动组织好了，法国社会就会被非特权者所接受。在美国相当盛行的一种理论提出，如果人们起来反叛，错误就出在某种心理紊乱或者缺乏对集体的适应能力。革命者因"失望"而受折磨，这是可以由其个人历史或他生活的小环境或大环境来解释的。这样一种观念意味着正常人就是完全融入社会的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我们倾向于走到另一个极端，并认为真正的人是以反叛精神作为标准的。如果存在一种真理的话，或许它就在这两种理想之间的某个地方。

第二种可变因素与第一种相关，就是劳动者对他们领导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发表明确的判断。最近在法国对工人阶级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其结论幼稚之极，令人联想到"儿童读物"，所以我对此抱有怀疑。根据这项研究，大部分工人对企业领导给予肯定的评价。这是可能的，而我不把这当做普遍现

象。必须采取更精细的手段来证明结果的可靠性。大多数拥有汽车的人都惯于说最好的牌子是他们汽车的牌子。同样，对很多工人(或士兵)来说，承认他们领导的优点令他们感到自豪。这样的现象不是难以觉察的，但是因为过于复杂，而不可能通过一般的民意调查方法抓到。

也许关键问题是个人或集团对社会整体采取的态度，对收入分配公正性的看法以及对人与人之间人道关系的看法。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不考虑到思想体系。政治观点与每个人对其社会地位的觉悟是不可分割的。从一个集团坚信某种学说为真理的时候开始，这个学说就变成了不满和反抗的理由。同时，我们懂得了少数积极分子怎样通过活动和宣传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感受自己生活经历的方式。我们脱离了抽象的社会学，然后发现了历史的范畴。某个工人阶级在反抗中生活，可能不归因于单纯的收入分配或社会结构模式，而归因于成为一个集团真理的思想体系。它正确与否是次要问题。为理解个人感受自己社会地位的方式，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们对社会的设想。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看，思想体系是有效的。

列出了所有这些可变因素之后，我并不因此就认为我们能够抛掉在前面倒数第二讲中所提出的判断。在充分就业持续增长的工业经济中，因为有强大的工会，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或许会产生阶级对抗的"淡化"，而非冲突的激化。这不能肯定，因为某些历史、心理、民族方面的因素有可能促使工人群众起来反抗，哪怕周围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西方式的工业社会促进斗争的淡化，不支持使用暴力手段或幻想世界末日般的大动乱。

当前，我是否可以说，历史环境有"双刃"效果。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例如法国的，转变成半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这种皈依部分地是由于苏联的实力。我们这里看起来十分激烈的冲突该

归于外部原因。但是许多观察家津津乐道的这种分析至少有一半是错误的 保守派应该对苏联的存在感恩戴德，它的存在使法国的革命派选票失去效用，因为把他们与一个政党的命运拄在一起，而党内除了一部分正统的共产党人，谁也不期望上台执政。确实，革命思想一旦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联系上便明显地遭到削弱。在德国，革命思想失去影响，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边界线那一边的）苏联的现实存在，而经济发展是次要原因。历史事实在两个方向上起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它把不满情绪推向一个看来十分可怕的思想体系。更多的情况是，它打消了工人阶级从事革命的一切愿望。有史以来，革命愿望从来都是对未知事物的期望。革命思想第一次在一个已存社会中体现出来。它没有从这种体现中得益，它不可能得益。真正的革命者是那些否认现实以创造新颖未来的人。如果人们对所要创造的未来已经有所了解，它就不那么振奋人心了。

你们可能很惊奇，我在分析集团之间的关系时，把集团分离和集团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搁在了一边，我指的是人们从一个集团流动到另一个集团的方式。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与前述研究有联系，至少从两个角度看是如此：一方面，越有机会往上升，个人就越有可能接受他们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认为从一个集团流向另一个集团很容易，这样的想法不管是否正确，它提供给保守派一个正当理由来反驳革命派：何必要搞动乱，既然在集团界线并不分明的当前社会里，人们轻而易举可在社会等级中往上爬，即使不在一代人中，至少也在上下两代人中完成。

在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可能得出的某些结论进行阐述之前，我必须致力于一项不讨好的任务：确定用语的概念。要区分**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第一个用语涵盖职业或地区的变化，不牵

涉等级的升降，第二个用语包含社会等级方面的提升或下降。两种现象在概念上和实际上都有区分。

美国的横向流动大。由于战争或者工业的某次飞速发展，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劳动者从一个海岸向另一个海岸转移是常有的事。可惜的是关于欧洲国家很少有相关的研究。从某些迹象看，横向流动比人们想像的要大。在法国一个外省城市里，人们发现居住在这个城市却不出生在那里的人占很高的比例。

第二种区分是**隔代纵向流动**和**同代纵向流动**的区分。同代流动指的是同一个人在其生涯中从一个职业的某个等级上升到另一个更高的等级。隔代流动是父子地位对照引起的结果。由于必须抓住父子二人在相同年龄时期的职业，所以研究有难度。

第三方面，必须区分**毛**纵向流动和**净**纵向流动——不常见的用语。我们来假设一个人口停滞不动的社会，其劳动力在职业中的分配是稳定不变的。每当一个人升到比他的父亲更高的等级时，另一个人就必须降到较低的等级。为了严格地使这样的双向流动处于平衡状态，还必须在思想上设想该社会有均匀的出生率。的确，只要社会上层的生殖率较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存在，不需要有对等的向下流动。事实上，大部分现代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有利于向上的纵向流动。

如果回到我们假设的社会，一切流动将都是净流动。相反，我们只要假设报酬高的职位比例在增加，就会出现向上的纵向流动，这仅是两代人之间劳动力分配产生变化的结果。当你们直接比较儿子们和父亲们的职业时，你们研究的是毛纵向流动。当从毛数中扣除了因就业人口分布的变化而产生的数据，得到的就是净纵向流动。如果人们成功地把不由社会结构变动决定的变化抽出来，就将了解到我所说的净纵向流动。大部分的研究针对的是毛率，因此流动比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社会结

构变动。如果农民的儿子本人也是农业劳动者，他们的比例在美国比在法国或德国低得多的话，这种区别部分地反映了美国比法国和德国的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速度更快。

接着，我想引入**精英人才流动**的概念。这个词语指的是非革命时期领导层的更新。社会上层的职位不是无限期地掌握在同一些家族的手中。力图测出“周转率”是很有意思的。与此相近似的还有另一种现象，历史学家比社会学家对此更感兴趣（但也许是错误的），那就是在政治危机时期少数执政者被替换。为加速精英人才流动，人们找到的最有效办法之一显然是赶走在位的人。在革命后的俄国，少数原有的领导者被另一部分来自于政党的少数人所淘汰和取代。（对于少数政治领导者来说，这是全面取代，对于其他各类领导者来说，这是部分取代。）此外，斯大林怀有的奇特想法是，通过实施清洗长久地保持迅速而持续的流动状态，1936年的那次清洗是规模最大的。我这样说可以有十分把握，因为正如你们所知，现共产党总书记在他那著名的报告中曾再三地强调“大清洗”极端过火。他解释说，人们对待党或国家的领导错误地使用了恐怖手段。在社会学家眼里，被当做统治方法或管理方法的清洗手段，其作用和结果是加速精英人才的流动。

最后，我将在下几讲中研究各类领导相对重要性的变化。每个社会把某一种类型的人物放到等级的最高层，占有某些职位的人处于头等地位。你们或许听说过几年前引起轰动的一本书的名字，詹姆斯·伯纳姆的《组织者的世纪》。其中的论点是，一类新人正崛起，占领社会的上层职位，他把他们称做“经理人”（人们用管理者或组织者来形容这个词）。无疑，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占据头等地位的人的类型在变化。现代社会是由专职政治家、工会总书记、政党领袖们统治的，从被遴选方式、受教育

情况、待人接物方面看，他们与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丝毫不可同日而语。

有关社会流动，美国和欧洲所作的社会学研究都针对以下两类问题：一方面，人们力图分析高级职务任职者的选拔方法，另一方面，人们期望确定从一个社会类别向另一个社会类别流动的频率。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概括这些研究的成果。首先从技术上说，研究是艰难的。最好进行有价值的选样。然而，人们从来不能肯定作怎样的选择，也就是说被预定的样本是 1000，2000 还是 3000 个对整体来说才算具有代表性。每当人们研究向上或向下的纵向流动时，应该确定一个等级阶梯。然而整个社会的等级划分是相当模糊的，人们不知道它是否是惟一的。最低一级的非体力劳动者是否应该排在最高一级的体力劳动者之上？怎样的流动可以被称做大流动或小流动？理想的社会是否包含最大限度或最低限度的流动？如果人们期望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一个工人的儿子同一个大资产阶级的儿子拥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大学教授或内阁总理，任何今天已知的社会都不接近于这种描述。与完美流动的理想社会相比，工业社会是相对凝固的，但相对于封建等级社会，它是流动的。

在提供给你们一些数字之前，我要概括地讲述某些判断，在我看来这是从已经进行的研究中可能得出来的。

一，实际操作上很难把净流动孤立抽出来。获得的结果往往说的是毛流动，它们表明社会结构的变动。在工业社会中，造成这个现象的决定性因素或许要到这些变动中去寻找。最有利于为一个集体的所有成员创造向上流动机会的，是报酬较优厚的非体力劳动职业在比例上得到提高。时至今日，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动的速度比净流动速度更快。

二，在一切已知社会中，弹盒中有元帅权杖的士兵极为罕见（除了在革命时期）。众多美国人认为每个劳动者都有成为总经理的机会。也许社会奇迹是必要的，但不应该随意相信。人们想必会遇到数量很少的例子可说明这种虚构现象，但是从总体的比例上说，这是少见的。在大多数社会中，向上流动是逐级完成的。农民的儿子很少会变成一个公司经理；相反，更常见的是他会从事某种非体力劳动的职业，成为小资产者，然后再轮到他的儿子往上升①。如果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观察三代人而非两代人，这样的研究必然更有意义。各国发表的著作不总是揭示旧大陆欧洲和新世界美洲之间的显著差别。也许美国与欧洲的不同更多地表现在思想上，而不是现实中。差别不是没有意义的：也许这里因传统悠久而自豪，那里因成功地完成自我创造而感到骄傲，这为我们展示了固有的民族特性以及社会威望方面的细微差别。

三，如果说社会流动被确定为从一个集团（例如工人集团）向另一个集团（例如“白领”集团）的过渡，这种从体力劳动向非体力劳动过渡的常见现象，在欧洲各国之间甚至在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判断直接违背人们通常作的描述：相对于凝固的旧大陆，美国是一个极其流动的社会。其他一些数字揭示出，以有向高级职务晋升机会为特征的美国流动比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流动都大。

四，人们曾经思考过，如果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不像一个世纪前或半个世纪前那样频繁流动，在美国是否有可能出现社会集团僵化、晋升机会减少的趋向。在各种层次上作的研究未曾发现任何明显的变化。这样我们就遇到了对第二种虚构现

① 参见本节末尾的注释。

象的描述:美国不久前还是开拓者的天堂,现在正朝着与欧洲国家类似的凝固结构发展。美国人对他们的过去和现在的习惯设想也都是错误的。波兰或意大利的移民到了美国曾经有过无穷尽的机遇不是事实;晋升的机会今天都消失了也不是事实。不可忽视的是,提供机会的方法和所需资格不再完全相同。五十年前,不经专门培训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比今天大;相反,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今天比五十年前更大。不久前,人们虽没有接受过文化知识或技术方面的基础教育,却能够在经济领域中担当重要职务,这在今天的社会里变得越来越难。在同一时期内,向一切社会阶级的子女开放的教育体制得以发展。

在英国,战争刚刚结束时,人们就想到由于受教育机会的增多,大批工人的子女进入中等和高等学校,从而将大大加速社会流动。然而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接受持续中等教育的工人子女和资产阶级子女的比例仍然极端不等。这个现象归于多种因素。如果说在中学里某些孩子比另一些孩子差,其原因不一定要到出身中去找。人们不能绝对排除因社会阶级不同天资就不等的假设,但人们不能进一步论证这种假设,虽然获得的成功因社会阶层而异,但生活条件的差别对成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使我们想到一个很普通的判断:孩子因其生活环境而大大受益或大大受阻。另一个因素也起作用:家庭的大小。一个工人家庭的独生子比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上中学。存在教育面前的巨大不平等,这与社会本身的不平等相关。这使得我们马上就接受一种基本的思想:只要社会集团因收入和生活方式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别,无论是怎样的教育制度,平等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说到头,一个完全处于动态的社会应该是彻底平等的。可以这样说,在平等程度和流动程度之间有一种联系或者相互作用。当我们还远离其中一个的时候,我们

离另一个也同样遥远。

最后，我想告诉你们几个数字，这是从个别调查中得出来的。关于美国在两个时期间的流动比较，我将引用纳塔莉·罗戈弗夫人的研究[1]，其成果建立在对1905至1912年间和1938至1941年间一个县（马里恩地区）中婚姻许可证的分析。在这个例子中，作者区分了我们叫做**毛流动**和**净流动**的概念，换句话说，她为了确定流动的含义，考虑到了上述两个日期之间劳动力在不同职业活动中分配的变化状况。

结论是1910年至1940年间的净流动没有很大变化。确切地说，变化是从流动越来越扩大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关于被美国人称做professionnals即自由职业者的那些人，流动可能增加了四分之一（换句话说，由于这类职业的数量不断增加，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数增加了四分之一，因为他们的父辈没有做过这种工作）。在这两个时期之内，所有体力劳动职业和非体力劳动职业各自的内部流动大于其中这一类流向另一类。换一种说法，重大的障碍存在于工人和职员之间，哪怕前者是熟练工人，后者是低级职员。另一项由西摩·M.利普塞特、莱因哈德·本迪克斯和F.西奥多从事的研究[2]值得加以引用。研究对旧金山海湾奥克兰市的955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选样有意排除了两头：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家庭。

父亲一生干的是体力劳动，其子女中有47%是从事非体力劳动的，而对于父亲为非体力劳动者的人来说，这个比例上升到68%。这个例子中21%的差距相对地说是较小的。

S.M.利普塞特和纳塔莉·罗戈弗在他们著作中所主张的普

---

① 《职业流动中的最近趋向》，自由出版社，1953年。

② 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952年1月和3月。

遍论点是，净流动（即扣除社会变动，扣除劳动力的不同分配而得出的结果）在美国同在德国、法国或英国一样从来都没有多大差距。

下面的表格对美国、法国和德国进行了比较。

美国

父亲职业	儿子职业		
	非体力劳动	体力劳动	农业劳动者
非体力劳动	71	25	4
体力劳动	35	61	4
农业劳动者	23	39	38

法国

父亲职业	儿子职业		
	非体力劳动	体力劳动	农业劳动者
非体力劳动	73	18	9
体力劳动	35	55	10
农业劳动者	16	13	71

德国

父亲职业	儿子职业		
	非体力劳动	体力劳动	农业劳动者
非体力劳动	80	20	
体力劳动	30	60	10
农业劳动者	13	19	69

姑且认为这些数字有代表性[1]，它们揭示的重大差别只是涉及到仍然从事农业的农业劳动者的儿子，他们在法国和德国各占71%和69%，而在美国只占38%。但这个差别实际上可以归因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归因于美国劳动力分配的变化速度更加迅速。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巨大差异的是毛流动，而不是净流动。如果人们研究城市体力劳动者的儿子，在他们中间，美国和法国都有35%、德国则有30%从事非体力劳动职业；这三个国家各自有61%、55%、60%的体力劳动者的儿子仍然做体力活。但是还要弄清的是社会中的实际状况是不是更多地表现为毛流动而非净流动。而且，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整体的比较只是提供上升和下降现象的粗浅概念。在这两个群体各自内部，有不少差别。

S.M.利普塞特还运用了把一个丹麦城市奥胡斯（调查是由T.盖格做的）和一个美国城市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州）进行比较的成果：

奥胡斯

儿子的职业	父亲的职业			
	Ⅰ	Ⅱ	Ⅲ	Ⅳ
Ⅰ.自由职业者、业主、高级管理人员	38	23	14	32
Ⅱ.职员和商人	20	28	12	12
Ⅲ.体力劳动者	41	48	73	52
Ⅳ.农业劳动者	1	1	1	1

[1] 法国的数字来源于全国人口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人口V，3）。美国和德国的数字来源于民意测验。

印第安纳波利斯

儿子的职业	父亲的职业			
	Ⅰ	Ⅱ	Ⅲ	Ⅳ
Ⅰ.自由职业者、业主、高级管理人员	33	21	10	11
Ⅱ.职员和商人	29	42	17	15
Ⅲ.体力劳动者	38	37	72	70
Ⅳ.农业劳动者			1	4

这里的数字还是没有很大的差别。体力劳动者的儿子分布于奥胡斯的四种职业中,比例各为 14、12、73、1。而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比例各为 10、17、72、1。最惊人的现象是向下流动的频率高:父亲从事第一类职业,他们的 100 个孩子里面,在奥胡斯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各有 41 个和 38 个向下流动到第三类职业。最突出的差别表现在农民的儿子身上:在奥胡斯只有 52% 进入第三类(体力劳动),而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则有 70%①。

---

① 关于在教育面前的不平等,所有国家都有大量的数字可说明。例如,这里有一个 1940 年的统计,是有关纽约的一所中学的。

学习水平	家庭收入			
	2500 美元以下	2500—4999 美元	5000—8999 美元	9000 美元以上
高水平(占学生总数 1/4)	41%	41%	60%	76%
中等水平(占学生总数 1/4)	19%	26%	27%	56%
低水平(占学生总数 1/2)	11%	13%	27%	44%

这里指的是进入高等学校的中学生比例。因此,在收入低于 5000 美元的家庭中,只有 41% 的孩子按考试成绩属于高水平,可继续学习。对于最富有家庭的孩子来说,这个比例高达 76%,就是说几乎加倍。换句话说,如果学习成绩相等,富人家的孩子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我们掌握一些统计数字，是关于法国中等和高等学校学生中农民和工人子女的比例。

"在法国，1936到1937年和1943到1944年两个时期之间，进入中等学校的工人阶级子女的比例增加了4倍（相对于每年进入中学的孩子总数）。1946年以来，即在全面入学率大大提高的时期，这个比例稳定在12%左右，相对减少了一些。"（让·弗卢，《社会阶级在求学中的角色》，载《智力和教育》，巴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1962年版，第100页。）这是科学和技术人才局同瑞典国民教育部合作，于1961年6月11日至16日在瑞典孔格尔夫组织的学术会议上的一个报告。《人口》杂志（第十七期，1962年，第9页至第28页）发表了对于六年级的一个调查结果，它证明了前述论断。在传统中学和现代中学的六年级学生中，务农者的子女在1936到1937年占1.7%，1943到1944年，这个百分比上升至8.2%，但是1956到1957年又跌至6.8%。同样，工人子女的比例从1936到1937年的2.7%上升至1943到1944年的14.5%，但是1956到1957年又下降到12.3%。

最近，在《人口》杂志1963年第三期中，吉拉尔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等级和教育民主化的重要论文。他根据学业成绩，父母的职业、收入和愿望，以及家庭的规模研究了进入六年级的孩子的比例。"从总体上说，孩子发展方向的确定同时基于他们的学业成绩和他们出身的家庭环境，学习能力和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混同的。关于这一个现象，我们将不试图在这里去解释，更不去加以支持和批评。但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明显事实。"

阿兰·吉拉尔先生还作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是关于从事各种类型职业（公职、文学艺术界、政界、工业和商业界）的大约2000个知名人士的社会出身。研究结果被写入了在196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在法国的社会成功》（法国大学出版社）中。在这些被研究的人中，父亲是工人的占2.8%，是农民的占5.4%，是商人或手工业者的占10.6%，是职员的占3.7%。要补充的是，在这些"知名人士"的父亲中，工人都是熟练工人或技术工人，而其中的农民不是农业工人。因此，工人、农民、商人及手工业者这三个集团总共提供了19%的知名人士；职员、公务员、中级和低级管理人员提供了19%；企业主、自由职业者和高级公务员提供62%。如果我们把有关社会职业分配的这些数字与1954年的人口进行对照，我们可以说当时62%的知名人士来自于占5%的人口，或者说81%的知名人士来自于15%的人口。比例相当于76%人口的农民和工人仅提供8%的知名人士。

人口分布和成功者分布之间的对照令人震惊。但是这样的对照只有通过与其他时代和其他现代社会进行比较才具有其真正意义。

关于工业领域高级管理人员的招聘问题，美国有很多研究，我们只引述其中一部分：梅布尔·纽科默教授的《大企业经理，成功因素，1900—195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涉及到428个公司的863人；W.劳埃德·沃纳和詹姆斯·C.阿贝格伦的研究选取了更多的样本（属于大型企业的8300个人，他们至少有500万美元的毛收入）：《美国工商业中的职业流动（1928—1952）》，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共315页；《美国的大企业领导》（哈珀）。门罗·伯杰在《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对这三本著作进行了评论。

第一个结论既不新颖也无争议，那就是工业界领导人的父亲属于特权阶层的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些阶层在英文中叫做 owners，executives，professionnals，就是业主、高级管理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在沃纳和阿贝格伦调查的8300个人中，有2/3的人出身于这些特权集团（1/8的人口提供2/3的工业界领导人）。劳动者的子女只占8300个领导中的15%。如果我们取860个最高级的领导来看，比例从2/3升至3/4，工人子女的比例则从15%降至2%。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达到最高等级是很罕见的。

关于1928年至1952年间的变化情况，研究的结果不都吻合。沃纳和阿贝格伦认为，在工业界领导人中，工人子女比例从占1928年工人集团的11%提高到占1952年工人集团的15%，业主或高级管理人员子女的比例从1928年的58%下降到1952年的52%。纽科默的数字就不同了：业主或高级管理人员子女的比例从1925年的56%过渡到1950年的63%，而工人子女的比例从6%到8%。关于自由职业者的子女，不吻合更加明显。根据沃纳和阿贝格伦的调查，在工业界领导人中，自由职业者子女的比例从13%升至14%，而纽科默观察到的是从23%降至18%。在我们不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不注意流动系数（某个社会类别的子女从事某种职业——如果劳动力在职业中的分配纯粹是不固定的——的人数比例和实际比例的关系）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沃纳和阿贝格伦涉及8300个案例的结论包括了中级管理人员，而纽科默选择的将近900个人全部占据最重要公司的要位。换句话说，根据人们观察的对象是一个更广泛的集团还是人数非常有限的精英人物，流动情况有所不同，或增长，或没有增长，也许甚至减少了。所有的研究都证实，为晋升到最高职位，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在1928年的抽样调查中，32%的人大学毕业，1957年为57%。最后，以被雇用者身分开始从业的工业界领导的人数和比例大大提高了。根据纽科默的统计，该比例从1900年的1/5（在313个经理样本中）增加到1950年的2/5（在851个样本中）。况且，这里说的是众人皆知的变化。越来越少的最高等级工业领导是旧式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或企业主。

第十五讲

从社会流动到人才流动

上星期，我们研究了社会流动中的几个问题，今天我想概要地重复一下从这些分析中得出的主要思想。

一、各种集体经历的都是毛流动而非净流动。因人口增加，专业性职业的绝对数量也增加了，经济发展使专业性职业在全部职业中的百分比提高。人口发展和经济增长为下一代提供越来越多的晋升机会创造有利条件。同样，特权阶层出生率较低有助于向上的社会流动。

二、所有经济发展和权利平等的现代社会都包含规模相对巨大的社会流动，或许比以往集体的流动更大，尽管有关过去的统计数字不足，因而无从作出明确的判断。在现代社会，人们发现1/3的工人子女不从事体力劳动，但他们并不都一定居于社会等级中比体力劳动职务更高的职位。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职业相互间是双向流动的。总之，由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动，从工人阶级中脱离出来变成容易的事。

三、这样的流动到处都很有限，与理想化的完美流动或噩梦般的流动相距十分遥远，所谓完美流动就是给工人子女和经理子女提供成为企业领导的同等机会。任何社会都与这种状况相去甚远。对于大多数个人来说，社会地位是一个持久状态。最初处于等级下层而最终位居等级上层的人数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寥寥无几，除非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这个比例在苏联式的

社会里或许更高一些,但是统计数字不明确,在那里向上流动性大,人们为极有才干的工人安排晋升的机会。在西方社会里,即便通过接受教育往上升也不是极常见的现象,因为学习成绩因家庭环境而异。

四、当前,社会晋升主要看文凭。在接受中等和高级教育的机会日趋均等的前提下,或许向上流动会加速发展。然而在已知社会里,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

下面是有关英国的数字。我们通过英国的教育结构来解释这些数字:小学或者是私立的(总体上说,资产阶级的子女进入这些学校),或者是公立的(往往是平民阶级的子女进入)。有一代人,初级学校的孩子中有 14.7% 升入了中等学校,这个比例在私立小学中高达 89%,这明显地揭示了录取标准的阶级性。下面还有一个有关当前英国的数字:所谓的上层阶级约占人口的 15%(这个百分比与苏联知识阶层的 14% 几乎相当),25% **文法学校**的学生和 44% 中学结业班(五和六年级)的学生来自于这 15% 的人[1]。实际上,每一代 65 万个孩子中,16 岁时在校学习的仅 10 万名,17 岁时在校的仅 6 万名,18 岁时在校的仅 3 万名。学不到结业的人在非资产阶级子女中是大量的。中学最后一年级有 60% 的学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每年有 1.7 万学生从大学毕业,毕业生总数年增长仅 3%——极其微弱的比例[1]。

在英国的例子中,我们发现一个新问题,即激励人们晋升的必要性。向上流动并不总是全体人民的理想。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容易找到工作并立即就得到体面酬劳的男孩和女孩并不

---

① 这些统计数字是十来年前的。我引自于马克·艾布拉姆斯的一篇文章《更年轻的一代人、机遇》,1956 年 5 月。

总是期望继续长期学习 目前英国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总数可能低于社会的最适宜状态。在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里，报酬不平等现象的减少对刺激人们向上流动起了削弱作用，以至人们宁肯尽量招收足够数量的大学生，而不使考生失望，适应向下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社会越是具有流动性，资产阶级的子女跌到被视为下层的社会等级越是常见。

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进行这样的分析，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为了看清远景，我将描述两种可能的未来景象，让你们从中作选择。

第一种是经济完全平等，从而代代都有大流动的社会。教育面前的不平等明显缩小，一个资产阶级的子女从事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人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消除，不同威望形成的等级也渐渐消失。

人们可能设想这类社会的不同变种，例如经济上一律平等，但社会领域却存在相对重大的不平等。人们在美国已经看到，随着收入渐趋接近，每个集团想突出自己特点并确立自己威望的欲望增强了。社会集团在客观上越缺少差别，它们越是要力图标新立异，寻找适当的理由意识到它们的价值或优越性。它们在寻找**身分**：经济平等和冒充高雅相结合。

第二种工业社会的理想类型将是迥然不同的。人们也会观察到物质平等的趋向，由于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这是必然的，但是流动的规模很小。社会上层通过缩小收入不平等想方设法使社会下层满足，但同时这些社会集团在精神领域里是互不相干的，差不多类似于今天的《泰晤士报》读者和英国私人电视台观众之间的差距。少数统治者在才华出众的孩子中招收必要数量的大学生，以保证社会精英人才的一定更新。实际上，惟有这些掌握了知识和权力的少数人才能管理一个相当专制的等级社

会，同时，经济领域的生产能力容许缩小收入的不平等。这个设想也不是完全武断的，我们在西方社会，甚至于在苏联社会里看到了某些方面。

苏联社会接近于专制制度的社会类型，少数统治者确保足够数量的向上流动，但同时又维持两种人之间存在的重大差距，他们分别是广大劳动者和少数操纵机器或人的学者或党内人士。

如同一切所谓理想的典型，上述描绘只是对我们目前观察到的现象作了一些调整。我将不在这两种情况中作选择。总而言之，我不知道工业社会的未来将是怎样的，或许，真正的社会集体将从两种设想中吸取某些因素。无论如何，这些设想把我们引向一个问题，我把它叫做精英人才流动问题。

随着经济增长，领导人的类型有怎样的变化？我在这里提的问题不是通常的含义。社会学家不以这种方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我使用的概念有关系，而且大部分时候，社会阶级的问题同领导人类型问题是混同的。

然而，在我当下所思考的问题中，某些局部现象已被三位作者观察到，他们是帕雷托、伯纳姆、熊彼特。第一位在他的社会学论著中用下面的话提到这个问题：谁统治现代社会？掌权的是什么集团？这些少数人怎么变化？帕雷托从下述观点出发：每个集体都有一个领导阶级，集体的特征主要决定于领导阶级的特性（从词的心理学含义看）和它运用的手段（由此产生诡诈和强暴的对比）。在他看来，现代资产阶级是懦弱的，对此他深感愤慨和厌恶（而大多数作者是因资产阶级不公正和使用暴力而义愤填膺）。他揭露他们总是喜好妥协而非战斗，习惯于把胜利拱手让给平民阶级代表。根据他的这个看法，人们可以把他

视作法西斯主义的鼻祖，尽管在墨索里尼上台的时候，他对墨索里尼不是太有好感。在他看来，有可能替代资产阶级集团的是民众的领袖组成的集团，他们是工会书记、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以及群众政党的领袖 我认为这个理论的错误在于设想现代社会被掌握在一个领导阶级手中，而社会的特征表现为各种类型领导之间的竞争（确切地说，他们的统一是例外，而不是惯例）。

第二种理论是詹姆斯·伯纳姆在他的著作《组织者的世纪或经理革命》中提出来的。他把马克思主义观念和帕雷托的观念综合起来．每个领导阶级不一定都是清一色的，其特征表现为由某一个集团或某一类人占主导地位。上个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这个世纪，关键性的变化简而言之为：**经理或组织者取代所有者**。这个过程怎样来完成呢？为了弄清过程，我们可以观察两种企业。上个世纪典型的企业是属于个人的，由一个人创建、拥有和领导。只要想一想马克思所熟知的纺织工厂就可以了，在二十世纪，我们也见到过类似的工厂，如初创时期的雷诺或雪铁龙汽车工厂。企业是一个人的事业和财产。所有者又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按照伯纳姆之见，在现代社会里，私人企业越来越让位于规模巨大的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有几十万股东的产业，极少数经理管理企业，股东们不起任何作用。

还发生了另一种变化。在现代的大型工业企业里，人们可区分出四种人。首先是被人们叫做金融家的人，他们的高度才干体现在买卖金融股票、操纵证券（交易所买卖的证券）的能力。他们确信自己把不由他们管理的企业控制在手。第二种人是技术人员或工程师，他们使设备运转，拥有科学知识并懂得如何运用知识。第三种角色是买卖人或商人。最后第四种人既非金融家，又非技术人员或买卖人，然而，伯纳姆和其他很多人认为他们占据着首位，我们把他们称为组织者或经理。这类人在公有

和私有的公司里都存在。一些法国名人的名字就在你们大家嘴边,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他们轻而易举就从一个私人汽车公司的领导岗位转到铁路公司或撒哈拉石油开采公司的领导岗位上。他们的杰出才能正是在本能上擅长于工业领域的创造以及生产资料的组织和管理。他们就是现代社会领导阶级的出色代表人物。

伯纳姆还阐述了另外一个思想:差不多在所有地方,工会、政党和政府中的职责同经理的职责是相仿的。总之,美国工人工会的领袖是什么人?同样,他是群众的操纵者或工业协议的谈判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领袖的才能部分地说是组织者或经理应该具备的才能。

这个理论包含某些真理的成分,但在我看来在好几个问题上不确切。伯纳姆关于上个世纪私人资本家是欧洲社会领导阶级的描述是错误的。他们在德国、法国,甚至英国都不是统治者。他们确实在生产资料的管理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作为社会意义上的领导阶级,构成他们特征的是,他们不愿意亲自担任公职。说私人资本家是十九世纪的领导阶级,说经理取代了他们,这就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统治者。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个理论还意味着,这些组织者一起构成一个社会集团,意识到集团的存在,有执政的欲望和政治观念。这些经理有很多共同的心理和社会特征,往往有利害一致的感觉,因为他们感到都是一起推动社会前进的人,但他们远远没有形成一个相当于政党那样的组织。当我有机会同公有或私有大企业的领导人聊天的时候,令我吃惊的是他们是如此缺乏确定的政治观念(我为他们更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而感到遗憾)。如果掌握经济权力的人清醒地知道他们期望什么样的政治,事情将变

得多么容易！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希望政府为他们确保一个安定的环境，他们只需在这种氛围中使企业运转，或者当他们是私有者时，只需创造出利润和发展他们的企业即可。并不是说他们作为个人没有思想或政治倾向，而是每当人们可能具体地研究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例如在法国采取的决定，人们永远都看不到他们的意见是统一的[1]。

最后，经理本人不执政，上个世纪提出的问题还是存在着：究竟谁在统治？

不管怎样，组织者类型的人越来越比个人资本家占上风，这是事实。不同类型的领导人越来越趋同，这也是事实。工业家、工团主义者，或许甚至还有军队领导人都变成了组织者，因为当今社会的本质表现为对群众进行管理。领导一个国家行政机关或一个私人企业要求同样的素质，必须有同样类型的人才，说到底需要有相同等级水平的人才。并不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军事经理"与"工业经理"意识到属于一个共同体。人们只是承认以不同渠道晋升到最高层的人具有某些相似的特点。

我现在要谈谈第二位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社会学家熊彼特。他的理论与伯纳姆的理论相反。他的基本判断是，作为属于资产阶级的资本家本身从来没有**直接**参与过政府管理，也许除了在英国，我认为这是事实。在他看来，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初，欧洲社会的发展特点表现为工业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处在一种传统制度的保护下。从德国的例子看，这个思想立即可得到证实：资本家在帝国国会中不占据首位，他们不进行统治。他们让普鲁士贵族的后裔或官员行使军事和政治职务。熊彼特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增长，企业主地位削弱了。因此他提出了一个

[1] 1955年，关于摩洛哥的独立，人们曾经作过一项详尽的研究。

接近于伯纳姆的思想，但是他以另一种方式表述出来。依他之见，企业主曾经基本上是一个革新型人物，他们构想新的策略、企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而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里，企业主不再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变成了管理者，更关注效率，而不是创新或无限量的利润。领主的生活排场和昔日资本家的雄心因税收制度而成为不可能。由个人领导的私人企业正在衰落。我们过去熟知的资本主义被削弱了，也许已经寿终正寝，因某一类领导人物的活动而受到阻碍，这类人就是知识分子，熊彼特本人就属于这类人。建立在市场机制和追逐利润基础上的制度将不可能保持下去，因为社会气氛越来越对之抱敌视态度。而这种气氛是那些处于敌对状态、持批评态度的异端分子创造的，他们不知道管理的必要性，不懂得资本主义的运转规律，同时因追求真诚的理想主义和行业利益而厌恶市场机制。知识分子在公众舆论中散布他们的观点，说这样的企业主、利润和大公司该受谴责。如果舆论不接受，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毫无根本变化地长期存在下去。

还要补充一点，这个理论没有预见到一种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苏联式制度，这可以原谅，因为某些社会的工业化姗姗来迟，苏联式制度提供了一种不可能引入到西方的迅速工业化方式。熊彼特只是设想了一个私人企业主越来越少、计划性越来越强的工业社会，因而，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将在那里趋于消失。

让我们尽力把三种观念的部分结论汇聚起来，勾画出一种领导类型变化的理论。

我们首先可以肯定，以大土地所有制或军事职权为基础的传统贵族随着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衰弱了。衰亡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一种工业化经济的完整体系中，农业的地位缩小了，并

且工业社会自身的性质破坏了对旧有权威原则(出身、传统)的消极接受。衰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时常被推迟。至少直到 1914 年,德国的贵族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容克地主阶级只是在 1945 年军事失败和俄国占领后才真正被摧毁。从长远看,可以认为在所有工业社会里,这类人的影响将日渐减弱。

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教会的**政治**权力也趋向于衰弱。我将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因为这里说的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也不是必然的事。在西班牙,教会保持了强大的权势,想必它的作用同传统的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的缓慢有关。西班牙还处在现代文明潮流的边缘,它正缓缓地汇入这股潮流中。然而,其他一些例子也促使我们去思考。我们来看波兰的例子:按苏联的方法实施的工业化没有阻碍教会保持着重要影响,在 1956 年那场几乎称得上是革命的事件之后影响更为巨大。当然,这种影响是历史赋予的,因为教会是民族遗产的护卫者。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今天仍然反对少数领导人和国家。无论如何,重要的是提请大家注意,在这方面没有自然产生或必然发生的事。工业社会可以是一个信教者社会。在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古老信仰的留存之间不存在心理、道德或社会方面的不相容。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就是一个主要活动为经济活动的社会,一个其国家趋于世俗化的社会一般来说不让教会保留从前可能施加的政治影响。

如果我们赞同前述这两类人(私人企业主、教会人士)正走向衰亡,一切工业社会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生产资料管理者、群众领袖、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千变万化的复杂关系。

上述第一类人现在怎么样?在这个问题上,我只限于重复与伯纳姆、熊彼特和其他很多作者共同的看法。趋势是涌现了一种不再主要为资本家的人。在现代经济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

企业以及高度集中的工业实体(铁路、电力、煤气、化学企业、汽车等)规模如此之大以至它们不再是个人的财产。管理这些私人企业或国家企业的人具有的特点用经理这个称呼来概括。他们并不一定是一位工程师,而往往是没有科学或技术方面的资格。人们很容易从直觉上辨认这类人,而较难向不熟悉他们的人作抽象的描述。大公司的领导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相替换的。他们不以某种技术才能而同具体企业连在一起,他们拥有的是“使”大公司“运转”的非专业性能力,这种能力自然必须以掌握某些知识为条件,但这可能更多地指全面的文化,而不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必须具有的优点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们要有能力听取,这是一个非凡的美德;要有能力采取决定。大公司经理顾名思义不可能对企业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可以说他是一个领导委员会的头,其不同的成员向他作汇报,而他能够进行综合,采取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把整个企业调动起来。

决定在某一个日期生产一种既定式样的汽车所引起的后果是重大的。在一个完全计划化的社会里,人们几乎确信可卖出所有产品,因而从表面上看采取决定不是那么严重的事。在法国,决定包含着风险,意味着打赌。而作决定的是一个人,总之是独自一个人。

生产资料越来越由这样一类人管理,这个现象并不导致任何确定的经济或政治制度。如果我把我的思想推到极至,略微夸大一些,我可以说你们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如果不考虑铁幕的存在,从地球的这一端到另一端都找得到这类经理。他们能够适应民主政体,或没有思想体系的专制政体,或极权政体。他们更喜欢哪种政体呢?也许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在一个既定社会的例子里也找不到答案。偏爱什么政治制度决定于每人的个人伦理观和他生活在其中的制度的运转方式。

是否能够捕捉到政治领导类型的发展趋向？如下第一种判断看来对大多数西方工业社会是非常可能的：它们选拔人才不再像上个世纪那样局限于少数人。英国选拔政治领袖长期以来一直十分局限，部分地说现在仍是如此，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或现在都来自于一个范围狭小和结构相对严密的社会阶层。随着政党的发展以及没有财富的人有望获得职业成功，"政治阶级"的寡头特性通常就减弱了。把人民或无产阶级作为依靠的政党为来自于更平民化阶层的人提供晋升机会。此外，某些工会与政党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们打开了另一条从政的道路。在英国至少有三条道路通向议会。首先，还存在古老的传统的晋升阶梯：出身于上流社会的人，又是伊顿公学的学生和牛津或剑桥的大学生（例如他在那里学习了近东或远东的语言），在英国的某个选区有一份产业，而且他的父亲、祖父或叔伯父曾是那里的议员，他继承他们，被选为议员，最终升到内阁中的某一个等级。这是保守党政治家典型而理想的晋升历程。

工党提供两条道路：第一条是曾经勤恳和忠诚地尽责的工会书记走的道路，他们在某个时候有机会在工党候选人必定会当选的选区里参加竞选。所以我们在下议院中发现众多工人活动家，他们来自于平民阶层，有时将会在事业上大有作为。这一类人里，欧内斯特·贝文是最出类拔萃的例子。

还有一条是工党知识分子走的道路，他曾接受过高等教育，不一定毕业于牛津或剑桥，但来自于任何一所国立大学，他加入了工党，稍有机会即可在一个当选可能性极大的选区里参加竞选。选择候选人在英国政党内是难以捉摸的，它同时决定于地方委员会和党中央领导班子，地方比中央的作用更明显，在一个政治上的保守性没有消失的国家里，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志。一般来说，这样一个人来自于下层。他个人可能没有财产，他不

需要在自己的选区里有政界的父系亲属或一份产业。

法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晋升渠道更多。没有我刚才描述的从伊顿公学到内阁总理的理想道路，因为我们没有与英国相类似的教育制度。不管人们位居棋盘中哪一处，在期望进入政界的法国人面前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方式。比较一下在美国、法国、德国人们迈入公共生活的方式，哪类人投身于公职，哪类人获得成功，这将是很有意义的。

选拔政治家的范围渐趋扩大包含着怎样的后果？我在这一讲最后要谈的主要问题是熊彼特提出的，他对议会民主的可能性抱悲观态度，理由是他看出资产阶级当选者的无能。在他眼里，贵族擅长于统治，工人领袖的统治能力也还说得过去，而资本家或知识分子是一些平庸的统治者。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缺乏如下基本的素质：善于同普通人交谈、同他们建立真诚的关系，以个人权威使人敬服。他们在行使权力时不怎么果敢和具有威力。总之，由知识分子或工商资产阶级管理的工业社会不大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他想像一种新型的人将成为头面人物。

我避免对这个问题作武断的预见。我只是要指出我们熟悉的当选者完成他们使命的条件。保持议会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很大，尤其因为当选的政治家与其他类型的领导人不发生搏斗，以至造成你死我活的冲突。特别当群众领袖接受走议会道路时，民主制度有更大的可能性保存下来。在不同类型的领导者不顺从于同样规则、不使用同样手法的情况下，任何制度都可能受到威胁。在群众领袖归附议会实践的地方，我认为困难都不是不可克服的。我想到了英国，那里的工会书记、社会主义者领袖最终都接受传统的贵族礼仪。保守党议员满意地看到威斯敏斯

特地致力于使工会书记们接受这类教育。威斯敏斯特象征的是传统。

第三个必要条件是经济问题不过分复杂，对外政策的冲突不处于不可调和状态。由资产阶级当选者领导的议会制度本质上说适合于和平和繁荣时期。这个结论像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要完成的任务越简单，制度的成功率越高。

这个平凡的道理等于抽象地提出三个变数。的确，熊彼特的悲观主义可能在三种条件下被驳倒：群众领袖接受资产阶级的方法；经济管理者向政治家提出的问题是可解决的；最后，不要过于频繁地发生如同我们在 1919 年到 1939 年经历的那种危机，不要发生相信诚意和妥协的领导人与渴望权势和信仰暴力的领导人之间的对抗。希特勒和斯大林互相理解，内维尔·张伯伦不理解希特勒和斯大林。经验已经证明：如果你们让喜好调解的人和生性粗暴的人接触，将不啻于油气混合一触即发

1 指英国议院。——译注

第十六讲

展望西方各类领导

上一讲我们开始讨论各类领导的变化问题，用日常的语言可用一个简单的问题表述出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谁被指定来管理工业社会？因城市人口的集中、军事职权削弱和大土地所有制的衰落，传统贵族必然势单力薄。国家几乎不可避免地世俗化，教会的俗权逐渐衰弱。无论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是什么人，他们对作为劳动者的公民行使权威，确切地说他们是经理和组织者，而非所有者，他们不构成一个意识到自身存在、有确定的思想体系和特有权力意志的集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让当选者即专职政治家进行统治。

在民主社会里，专职政治家是什么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经验揭示了政党间的长期竞争，在某些社会的内部则有不同类型政治家间的竞争。"精英人物的流动"表明这样的事实：不只是接受游戏规则的所有政党为了成为执政党而展开斗争，而且各自信仰对立的思想体系的少数人也展开斗争，并提出不可调和的竞争方法。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话来表达这个思想：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民主社会内部，我们目睹了**议员**和**政治煽动家**的斗争。

我取这两个词有确切的含义。我把两者对立起来，前者是依靠选举产生的当选者，他们拥护二十世纪式的代表机制，后者与"基层"有直接接触，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代表和化身。法西

斯党的领袖希望成为从希腊词义上说的政治煽动家、群众的引导人，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屈从选举程序和议会方式，但是不认为这就是他们所担当的角色的本质。一个希特勒或一个墨索里尼在自由选举中获得了几百万张选票，他们二人谁也不承认投票的选择证明了他们权力的合法性。两个人都求助于更有效和更彻底的权责，这表现了群众和党的直接关系。

在所有工业社会里，议员和政治煽动家这两类人的冲突是可能的。冲突是根本的，因为他们反映了人民和政府间存在的两种代表方式和对话方式。法西斯党或苏联的领袖不同于传统贵族，当选议员也与贵族不同，或许更有过之。同议员一样，政治煽动家也依靠人民意志，他甚至会说人民意志只有通过一个政党作为直接代表才能得到纯粹的表达，而不是透过多个政党的幕布，多党的基础是集团利益、社会阶级或思想倾向。

我刚才说明了冲突的特征，从长远看，它在工业社会是最典型的，是希腊作家们研究过的冲突的现代翻版。希腊作家确实在民主城邦里看到了僭主们的长期威胁，这些人求助于人民意志，批评民主政治，揭露它如同寡头政治（应当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事实），最终打算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愚弄手段自许为城邦统一体的化身。请允许我提醒你们一句名言，我曾经有机会从拿破仑三世那里引用过，如果希特勒知道这句话，他会乐于拿来为己所用。那个最后当上法国人皇帝的人在成为共和国总统之前流亡伦敦时写下了这句惊世骇俗的名言："民主的本质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一切政治煽动家，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内心深处都认为民主的本质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

什么类型的领导人将占据优势？我不像熊彼特那样彻底悲观，我认为这种对立的根源在于工业社会的结构。依据不同情况，两者之一，或者议员或者政治煽动家，比对方有更多的运气

获胜。现代集体永远有一种公开或潜在的冲突，一边是合法的议会代表，另一边是一些图谋煽动或专制的政党和个人，他们宣称自己主要体现了统一意志。也许民主社会的稳定要求这两类人的结合，这两种代表方式的结合。

因此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我已经说起过的一类领导，即群众领袖，他们并不总是煽动家（从我赋予这个词的含义上说）。在什么范围内，工会书记、人民政党领袖会同意归附于多党民主制？或进一步说，在什么范围内，他们愿意继续作为当选议员还是愿意变成政治煽动家？

这个问题的提出可能关系到领导，或者也可能关系到群众。有时是领导，有时则是群众显得最温和，最尊重传统的合法程序。

英国的领袖看来一般都准备好归附于民主体制，往往比他们手下的群众更保守。如果说法国的现实正相反，这并非胡说八道，但也没有得到证实。我想提出下面的判断（我带着各种各样的保留大胆地提出）：领袖们越是接近知识阶层，他们越可能比群众更革命。在工党领袖中，通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最左，而出身工人的则代表温和派。总而言之，在基层和高层，对多党制的接受程度不一定相同。

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和苏联式国家的共产党领导都认为，反叛是西方政治煽动家以及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反革命和美国代理人“制造”的，这个论断自然十分荒谬。如果群众没有作好准备，领袖们永远制造不了一场革命，但他们能够促使群众趋向温和，或者唆使他们采取暴力。

至此，其他一些关于这类领导的问题被提出来了。第一个是工会书记和人民政党领导人的培养问题。在今天的英国，人们常常说，如果贝文晚出生半个世纪，他或许会得到进入伊顿公

学和牛津大学的助学金。这个判断未被证实，但它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随着法律更有利于"平民子女"的晋升，更富有才智的人先后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增加了。从此，群众领袖将从何而来？第一个答案由当今英国的经验提供给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民政党的领袖是大学毕业生，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担任相对高级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即便是左派政党也会由那些就收入和社会地位而言属于上层的人领导。这样的现象很可能产生保守的效应。

说实话，事情不那么简单。为获得助学金进入伊顿公学和为成为工会书记两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是不完全相同的。人们可能设想群众领袖仍然是在对学习没有兴趣的人中间选拔出来的。但动乱的原因之一仍然会是才华横溢的个人不得志。为所有人提供的晋升机会越多，促使革命产生的原因就越不起作用。也许在这方面西方社会和苏联式社会一样是朝同一个方向发展的。我觉得领导者们真心坚信所有富有天赋的孩子都应该接受高等教育，只要他们在政治上循规蹈矩。那么，才华得以充分发挥并确保在社会上事业有成，这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所有理论家从来都这么说。这就是一个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任何制度下)最符合于保守政治既定利益的，莫过于左派政党所期望的改革和民主化了。

随着工会和政党等民众组织的更加壮大，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就可能形成。工会和政党的官僚化在英国这样一个国家里是很容易观察到的，其后果往往是处于基层的人越来越不承认他们的领导是代表他们的，领导们在晚年往往被称做先生(Sir)或甚至阁下(Lord)。因此某些领导机构虽在理论上的职能是请愿或发表不同政见，但它们至少在下属群众的眼里已经变成了管理机构，离它们最初的革命宗旨越来越远。在多党制

下，这样的变化不可能走到极限，即变成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在那里，所谓工会组织就是国家的体现。但是在英国或美国那样安定的民主制度下，从今以后工会的一个职能就是既管理群众又发动请愿。再一次说明这样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它产生一些后果，那就是非正式的罢工频繁发生，以及与正式工会领导对立的领袖人物涌现出来，他们直接由工人选出，也许工人们更把他们看做自己的代表。

尽管这个分析很简练，但是它使我们面临惟一的一种可能，我在前面的一讲中曾讲到过：工业社会即使处于民主形式下也可能导致某种功能性等级制度保持不变，同时又促进平等社会中的流动。

现在我过渡到另一种类型的领导人物，即知识分子。我先讲他们是因为他们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确实起着重要作用，也因为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的衰落部分地归因于他们的态度。很难给他们下定义，在不同国家中和不同制度下，人们赋予这个词的含义各异。因此我建议你们从形式上的、超历史的概念出发。有史以来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还是艺术。也许还可以补充说，只有当这一类人不与教会人士混同的时候，他们才具有独立自主性。基于这个有意模糊的定义，我将指出我们当代的某些专有的特征。

一，工业社会的特点表现在非体力劳动职业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奇迹般地增长，所有这些职业都要求具有最起码的专业知识。因此人们就想把一切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归在同一类中。

二，知识分子若具有一种可直接用于集体劳动的专业资格，这样的人就越来越处于最上层。现代社会把学者或技术人员视为最有用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倾向是求助于知识分子

(或者苏联人所说的知识阶层),这不是指以其无偿的活动、无私的创造或研究为特征的文化人,而是相反,这里指的是另一类,他们掌握着于经济运转不可缺少的学问。在苏联,知识阶层包括全部管理干部。

三、文化传播者的数量过度地增加。有越来越多的教师,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上学孩子的比例上升,有越来越多的记者,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读报的人数增加了。因此或多或少自以为有知识分子资格的文化普及者层出不穷。

我们社会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个专业人员。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也许在你们看来哲学家今天几乎全都是哲学教授是显而易见的事;这种现象不是普遍的。

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他获得了一种可利用、可传授、必然是局部的学问。冶金工业的技术人员掌握一种可利用的局部学问。同样,今天在所有国家里,有很多文学工作者,他们也掌握一门技术,他们把时间花在重新编写别人写的东西上:rewriting(重新编写)成为一种报酬丰厚的职业(往往比原作者的所得更优厚)。重新编写的专长象征着一种技术性倾向,甚至象征文学创作的能力。在美国杂志里,文章不具名是因为写作的是一个班子。《时代》杂志是一部真正的集体创作,不只是因为每期由众多编辑合作编成,而是从众多编辑共同协作写每篇文章这个意义上说的。

同时,传统习惯上的知识分子抵制这种发展趋向。当人们提及知识分子,不只是指医生、工程师或律师等有一定学问的人,人们同时想到他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学者或预言者,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像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所赋予的。我要举一些离今天很遥远的

例子,以免得罪任何人。

人民阵线时期,人们在讲台的前方或人民群众队伍的前列看得见两三个法国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一位大哲学家或一位大小说家,他们通常讨论一些自己一窍不通的经济问题。当群众叫喊的不是“警察和我们站在一起”,而是“知识分子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了那些知识分子所肩负的神圣使命,况且这些人还拥有特殊才能或掌握原子科学。

根据这些因素,对这类人给予一个什么定义更合适呢?你们知道在这方面我是唯名论者,我认为没有一个意义恰当的词。我将不强加给你们任何定义,但我要给你们指出几个可能的、可说明部分问题的定义。

第一个定义也许随事物的发展而最说明问题,为了简便起见,我叫它苏联式定义,它把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看做是相似的,知识阶层以其技术能力和在工业社会中行使的管理职责为特征。

第二个定义实际上是在工业化第一阶段被人们承认的。哪里引进了西方文明,哪里的人就趋向于把所有进入大学的人,所有大学毕业生叫做知识分子。在北非,人们只要在有限的几年里经常到某个学院的阶梯教室听课就配得上这个头衔。他们从某个意义上说应该得到这个称号,因为他们获得了一种可委派他们从事某种职务的能力。

在那些既非苏联式又非准苏联式的国家里,困难就出现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在那里被用在政治冲突中。最早的场合之一是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派在一定的时期被当做“知识分子派别”对待。在那个时代,我是否可以说,他们以其神圣使命的名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他们的对手则谴责他们不懂得社会秩序的必要性。很容易在一些当代的事件中听到同样的对话,知

识分子以道德标准的名义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某个部长以带强制性的现实的名义谴责他们（"亲爱的教授"）。

在美国，同类的争吵出现在A.史蒂文森第一次竞选共和国总统的时刻。在那里人们找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词用来指在法国被叫做知识分子的人，人们命名他们为"egghead"（书生气十足的人），字面意思是"秃顶"，这是个贬义的绰号，理论上适合于那些参与政治却又对公共生活的严格要求缺乏了解的人。如此使用这个词有双重意义：它指文化人（小说家、记者、教师），但在他们自己和赞扬或指责他们的人看来，只有当他们不仅是某种专门学科的专家，并且**因他们职业的关系而在他们职业以外**企求一种道德或政治权威的时候，他们才会是完全意义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在法国的通常含义属于第二种：所谓知识分子是那些担任某种职业的人，但条件是在其职业活动以外，他们以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

不管你们取什么样的定义，这类人将永远不会被严格界定。以苏联知识阶层为例，你们将问什么是最起码的资格足以允许人们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担任非体力劳动职业的小公务员或者"抄写人"却不属于这类人。反过来，你们将会问在法国什么职业有资格获得这个称号，知识分子合法追求的是什么类型的精神权威。正如你们所知，社会分类从来没有明确的界线。知识阶层最终会混同于全体非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派别与精神权威的模糊概念相混同。

谈了这些以后，我们终于要讨论下面的问题：这类人对政治和对工业社会的发展本身施加什么影响？

我的第一条意见是撇开熊彼特简单化的、论战性极强的理论。说知识分子本质上是反资本主义的，他们在资本主义周围创造了一种敌视的气氛，他们注定要将它摧毁，我认为这是过于

抬举他们(或过于败坏他们名声,随你们怎么说都行),这尤其是把他们本不具备的统一和协调归于他们。在所有政党内,也许除了布热德先生的党,人们都找得到知识分子,因为所有政党都有一些理论家,顾名思义,所有理论不管是右的还是左的,都是由知识分子构思、发展、解说的。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党派,但曾经有过一个像巴雷斯[1]和其他一些人那样的反德雷福斯派组成的派别。

这第一条意见不排斥第二条:知识分子不是均匀地分散在各政党内。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于美国人对统计的兴趣,我们得以用数字来加以说明。人们在美国看到中学和大学的教师中约有 2/3 投民主党的票,这不出人意料。在艾森豪威尔第二次总统竞选运动时期,人们在华盛顿开玩笑地说:绝大部分报纸支持将军,而所有记者则站在史蒂文森一边。这个笑话同时说明知识分子采取行动受到的局限,在这里,采取行动的特有含义是对当代问题表态和参与行动。他们的意见不可能总是得到自由的表达。至少对记者来说是如此,雇用他们的人的意志可能比他们自己的个人倾向分量更重。但是仍然不排除西方国家知识分子的主导倾向从总体上说是人们所说的左派。他们大多数是理性主义者,渴望民主、平等,倾向社会主义,他们与工业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合拍的。

工业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他们,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们主要作为自己观察到的一种倾向的代言人。但确凿的是,他们在我们社会担当某种批判的职责(我认为熊彼特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过去或现在,只要当时的制度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他们都采取某种行动反对它。然而近来一些事件证明他们可能会在

[1] 巴雷斯(Maurice Barrès, 1862—1923),法国作家、政治家。——译注

别的地方攻击其他一些制度[1]。而对社会主义的指控过去是由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说出来的。

在当今苏联式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享受不到完全的言论自由，我这么说还是很节制的。他们有可能担负的批判职能只能在近几个月内极其偶然地在铁幕另一边的一两个国家里得以发挥。但一旦某些匈牙利人或波兰人，甚至共产党员有可能发表意见时，他们使用的方法证明：如果你失望地以为我们这里的思想家们所偏爱的消遣是对现有秩序提出异议，所以西方社会具有不可救药的缺陷，而铁幕那边的知识分子必定颂扬他们的社会，那你就错了。当然就一般而论，这里的知识分子把装饰布的反面显露出来，而那里的知识分子是美化装饰布。这里的知识分子更喜欢当反面英雄，而那里的知识分子必须充当正面英雄。这里是揭露，那里是辩护。对比显然十分强烈。这将会延续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应该长期存在下去，不管在什么社会制度下。

像G.奥威尔[2]那样的悲观主义者设想改造社会的实践将给未来带来不幸。他预见到会出现专制的等级社会，在那里，能言善辩的煽动家将以赞颂伪装的东西为己任，以及用完全与事实颠倒的话来粉饰现象。如果你们还记得，这就是他在题为《1984》的书中阐述的主要论点之一。对人性，甚至于对知识分子，我没有那么严厉，或者你们喜欢说我更有信心也行。我认为从长远看，他们的反叛本性最终将占上风。不管西方社会现在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他们眼下致力于使权力和特权的得益者问心有愧。他们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播撒这些骚动和不安的种子。

---

① 暗示匈牙利知识分子在1956年革命中的作用。

② 奥威尔(Georges Orwell, 1903—1950)，英国散文家、小说家。——译注

在这方面，法国知识分子或许是世界上最具知识分子特色的。在很多社会甚至自由社会里，他们担当的辩护职能比这里完成得更出色。每人将自行决定他更欣赏怎样的知识分子阶级。

结束之前，我要就我到现在尚未涉及的军事领导人说几句话。从前，掌握武装力量的人往往是统治者。时间不允许我哪怕只是简单地勾勒一下工业社会中军官的社会状况（把他们在南美、近东、欧洲的作用进行比较将会很有意思）。我们还是只限于西方国家吧。

在目前民主工业社会中，军事阶级在政治上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自十七世纪革命以来，英国的军人几乎不起确定的政治作用。德国军队在帝制内部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期望对魏玛共和国施加影响，当然军队避免了议会的控制，通过它参与行动或反对参与行动来进行干预，但是将军们始终觉得自己没能以他们应该具有的身分统治德国，始终认为城市化的、大众化的现代社会需要一种权力。在他们看来，统治工业化的、即使是独裁式的第三帝国，必须要有政治煽动家和某种学说。我们在那里发现一个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已经观察到的现象：打败民主派的僭主们与其说是军事领袖，不如说是演说家。在我们社会里，政治煽动家毫无疑问是非军人。

永远如此吗？我愿意以一种半社会学半哲学的方式说，当我们社会里的军人可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和证明自己合法的时候，他们就能够重新成为统治者。我想到1940年法国失败后发生的事。当时的形势如此紧急，以至国家几乎自动地归于一个军权，我甚至可以说归于两个军权，一个在法国，一个在国外。前者在几个月或几年期间幻想进行没有思想体系的统治。莫拉

斯[1]在那时解释说，人们终于摆脱了荒唐的制度，在那种制度下，要求人们对不了解的问题发表感想。维希时期，人们以为可以从行政上领导一个现代社会，不需要任何其他合法的理由，除了已经掌握权力这个事实本身，而且执政者是理智的、充满良好愿望的，尽管他极其年迈。我认为这个制度在非常情况之外是不可设想的。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军队曾尽力不直接参与政治和非军事斗争。1789 年以来的任何起义都与这情况不相符[2]。军队曾两次镇压骚乱，但接受的是文职领导的命令（1848 年和 1871 年）。确曾有过一次拿破仑二世的军事政变，但这是共和国总统所为。而且他难以找到同意援助他违宪的将军。鉴于法国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分歧，为捍卫军队统一和它与民族的关系，惟一的办法是不参与内部争斗。这并没有排斥大多数军官持右翼的观点和在各种场合发表己见。

当前，在西方世界，军事领袖可以对文人政权所作的这样那样的决定施加影响，他们在等级中处于令人尊敬的地位，但他们不代表拥有足够权威的一类执政者。然而他们在两种特殊情况下可能进入权力范围。首先是在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当惟有掌握武装力量的人似乎有能力统治的时候。其次是更为罕见和偶然的情况，即当一个现代集体内部危机严重到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解体的时候。那时人们就很想过渡性地求助于军事指挥权，是危机使之复活，就像消失的社会死灰复燃一样。

补充一句，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减弱了军人的政治机遇。原

---

[1] 莫拉斯（Charles Maurras, 1868—1952），法国作家、政治家，二战时支持贝当政府。——译注

[2] 课程的开设在 1958 年事件之前，第二年的课程提到了 1958 年事件。

核武器在内部斗争中是不可利用的，这是万幸。常规武器的运用在上个世纪末曾经结束了街垒战，而今天它的运用却因游击战而受阻，这种古老的作战方式在二十世纪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对不同类型的领导人物的研究中我想得出的结论是方法论方面的结论。关于未来工业社会的领导，我没有能够作出任何明确的断言。谁也不知道未来，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社会学使人们懂得某种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政治体现形式，从表面看这样的体现很正常。但通过研究总是发现相对抗的力量、处于竞争状态的各类领导、各种制度并存的可能。换句话说，由经济和社会特征确定的工业社会不意味着某种既定的政治结构。**不存在由经济-社会结构确定的单一国家制度**。假如我们想超越说明这类社会根本矛盾法则的一般判断，那就不要停留在一般性水平上。

从定义理解，社会学是研究一般现象，至于历史学，在它触及特殊和具体现象这个范围内，它是超越社会学的。为了理解法国社会政权采取的形式，应该从分析经济结构开始，然后指出社会紧张状态，阐明不同类型领导的思想方法，最后再把现在放到历史中，因为不参照过去就无从了解当前的法国社会。换句话说，归根结底应该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我要说最高的职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条件显然是，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其次是一个社会学家，最后是一个哲学家。

第十七讲

评苏联式制度的变化

在前几讲中,我力图得出西方制度中社会发展的趋向。这项研究的困难在于资料汗牛充栋和经验多样繁杂。有些现象到处或几乎到处都存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至少和总财富的增长成正比;在大多数情况下分配给少数上层的收入部分在减少;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仍然或多或少地严重存在。但是除了这些几乎普遍的特点,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肯定不同国家的发展是相同的。关于工人阶级的一致性,英国和美国的趋向或许不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人们观察到国民收入的进一步再分配、有效的社会法律以及极端贫困现象的几乎消除是相结合的;在美国,生活水平的提高首先是由于总财富的增加,但仍然有相对严重的贫困状况;最后在法国,尽管普遍都发展,但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如果我们看苏联的情况(而不是卫星国,它们有完全不同的问题),研究遇到的基本困难是缺乏资料、经验单一以及经济增长还没有达到相当先进的程度。

一位法国哲学家因出了一本有关黑格尔的书而出名,成为国家高级公务员,我近来读了他的一个报告。以下是主题的概要:惟一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还大致相似的制度是苏联式的制度。确实,马克思所考虑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确保一切剩余价值的积累,从而把消费收入减少到极

端低的程度。生产力大幅度发展，与此相关的生活水平却未达到足够的高度，这将激起民众的不满，最终发展成反叛，马克思预言了这一时刻。而报告人补充道，在那些继续保持高速度积累和尽可能降低群众购买力的国家中，事情的进展正同马克思曾预言的那样。西方则相反，马克思预见的演变没有出现，不是因为他是错误的，而是因为他是正确的。聪明的实业家已经明白马克思有可能获胜，于是用行动推翻他的话，这间接地说明他有理。这位辩证的哲学家想表达的意思是，企业主们确信，只有提高国民收入中的分配部分，资本主义制度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才可能避免群众起来反叛。福特的行为是对马克思的驳斥。福特是美国实业家的典范，他们自愿地资助政治经济学的教授们从理论上驳斥马克思，但是幸亏他们没有注重那些学院式争论，而是从实践上驳斥马克思，因为他们承认如果让经济顺其自然地发展，就会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制度就会崩溃。

这个报告的目的是把十九世纪西方国家内部无产阶级的状况同二十世纪不发达国家的状况相比。它旨在说服西方实业家这两种情况是相同的。这位总是以辩证的方式说话的哲学家又说，至于工人阶级，企业主了解他们，而政治经济学教授不了解；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教授们比实业家们更了解工人。因此只要实业家们懂得有必要把发达国家的部分收入分配给不发达国家，就足以驳斥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理论指出西方国家注定垮台不是因为内部无产阶级收入不够高，而是因为不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够高。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个报告，从作者的阐述看，报告把明显的事实和反常的现象混杂在一起，两者各占多少比例尚待确定。马克思被人们从实践上所驳斥，因为他在理论上有道理，这个判断是一句风趣的俏皮话。也许马克思错了，甚至在经济学的理

论构思方面就是错误的，也许被雇用者的收入随着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自然提高，如同今天大部分经济学家所确认的那样。总而言之，这种比较至少提供给我们对苏联式国家的社会发展提出下述问题的方法：它们将来是否会把集体财富的一部分以与西方同样高的消费收入形式进行分配？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原因是俄国经济史的特殊性。一种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开始于沙皇统治下的1880—1890年，一直到1914年。这第一阶段的经济可与西方经济相比较：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发展最快，它大约占全部工业的2/3。这个发展因敌对状态而突然被中断，这就是革命和战时经济阶段。新经济政策以后开始了一个以恢复原有经济和给农民实际利益为特征的时期。1928年是俄国历史上农民境况最好的年份。正是因为农村里产生了一个富农阶级（或资本家阶级），正是因为农业劳动者消费了过多的收获部分，人们才过渡到五年计划阶段[1]，这掀起了我们去年讲到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1928—1939年阶段，占巨大比例的集体财富被用于投资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迅速积累十年之后，战争爆发了，伴随而来的是破坏性后果，紧接着是1945—1950年的重建阶段。我们明白在这整整二十年期间，形势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利的。从那以后，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在此期间，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工业增长10%，总收益年增长5—8%）。同时，与1950年的最低限度相比，工资也提高了。

这样，我们就谈到一个根本问题：从1928年到今天，苏联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增强国力。以一种福利思想的名义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事情是否朝着与西方经济相似的方向变

---

[1] 至少这是斯大林五年计划政策体现的经济合理化。

化呢？这个提问题的方法不符合意识形态习惯，但我向你们保证，这符合事实，甚至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私下里发表的言论。不要以为这标志着成见。所有客观地研究两种制度的人都知道疑问是这样提出来的：苏联经济将关注扩大福利还是仍然被国力问题所困扰？

对于这个问题，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给予了令人惊奇的回答，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悲观论调来针对苏联。尤其是一位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在一年前向我断言，论战是政治范畴的，不是严格经济范畴的。确实，在一种全面的计划化体制中，断言人们**不可能**减少投资部分和增加消费部分将是很荒谬的。从制度的特征上说，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化规律应该是经济范围内的，那么在苏联，这个规律就只可能是政治范围内的。这位经济学家的论点如下：要保持极少数领导阶层的绝对权力，就必须维持低下的大众生活水平。

我不认为贫困化规律在苏联式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确凿。我怀疑的理由有两个：首先我不认为普遍的福利增长将严重危害少数统治者权力的稳定。其次即使这个反常的判断成立，我也不认为任何制度的国家领导会十分聪明地早早预见到他们行为的后果。确切地说，提高生活水平是为了使群众满意。必须有敏锐的思想才能预测到其中是否有潜在的威胁，而我难以把这种品质归于国家领导这样的实践家。

在这个所谓的贫困化规律以外，判断说苏联式制度**有可能**把人民的生活保持在相对低下的水平，这是不容怀疑的，理由是领导人享有行动自由。苏联的国家领导人不需要承受议员、工会和报界（报界是存在的，但是它们对统治者的回答恰恰是统治者建议它们回答的东西）的批评。从短期看，这种驯服便利于公众事务的管理。悲观主义产生的原因就在此。只要人们优先关

心国力而非福利的现象存在下去，就应该继续建设重工业，也就是说放慢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此外，随着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展，它应该给亚洲国家以援助。这么说，如果领导人继续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我们可以设想扩大福利将是缓慢的。

有一些问题仍然会提出来：不管计划把什么确定为优先，经济增长难道没有使普遍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吗？统治者的政策难道不该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化吗？换句话说，苏联式制度下的经济发展难道不像西方那样是自动地趋向于一方面提高消费，另一方面改变领导的心理？上述问题针对的是可能发生的渐进而和平的变化。其他的变化有可能来自于一次根本性的改革或一次革命。

在匈牙利，当人民群众一致反对政府中少数人的局面形成，起义就爆发了。秩序又重新恢复，但已不同于以往。被外国军事力量强加的制度不能被视为真正的苏联式制度。在波兰，革命没有从共产党手中夺取政权，但它引起了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大变动。现政府暂时放弃了土地集体化，同意农产品由农民出售，不再通过行政渠道收购上来。波兰领导人亲自宣布，从前对消费的牺牲走得太远了，铁幕那边把25%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不再被遵循。

对苏联式制度中的革命我不作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阐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革命应该爆发，不管怎样，我假定避开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我在想是否经济增长把两种类型的工业社会带往同一个方向。各种征兆提示人们作出肯定的回答：

一，很多年来，苏联领导人肯定，重工业和军备的发展必须伴随被分配收入的提高。那么，事实是五年来苏联的工资看来每年都有提高，1950年到1955年间相对地快一些。苏联的计划明确地预计群众购买力将得到经常性的提高。似乎人们打算

从集体财富中提取稍多一些比例部分给予农业，甚至给予轻工业。

我们不要扯得太远。当前的经济政策基本上还是同过去的一样，25%用于投资仍然是官方的信条，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几乎很缓慢，这使得普遍消费水平同时得到提高。3000万公顷位于亚洲的处女地得以开垦想必带来额外的农业产量。总之，对农民的政策变得灵活了，支付给生产者的某些产品的价格明显提高。如果谨慎地判断一下，从现在开始，即使经济发展的方式继续同前些年一样，群众生活水平的缓慢上升还是十分可能的。

二，当前政府的社会政策趋向于同时满足处境最困难的阶层和特权阶层。斯大林刚去世，重点就放到了耐用消费资料上，这尤其是"新型资产阶级"所期望的。最近的一道法令规定了提高最低工资。在我看来这两项措施都具有特点。按苏联的统计，几百万被雇用者的收入属于最低收入，低于300卢布月工资，相当于12000法郎[①]（如果一个卢布的购买力大约等于40法郎的话）。最低收入将视职位和地区差异变为350、300或270卢布不等。平均升高33%在预算中需花费80亿，因此这关系到将近800万劳动者，他们的工资按西方的标准是非常低的。

平均主义原则在三十年代前后被谴责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但在当前的结构中，有两种原则是对立的。一方面人们倾向于根据各人的产量把工资的差别大大拉开，而另一方面，人们又依据资格确定等级。第一种倾向曾被推进到极端的程度，以至最终与第二种倾向背道而驰。基薪很低，面额外薪金超出标准，其所占比例最后竟比基薪还高。工人往往不注意提高他们的资格，反而总停留于低水平，但额外工资超标。根据现在的资料，

① 指1957年的法郎。

苏联政府正着手一项统盘的工作，旨在重建资格等级和降低高额的产量津贴。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这种激励产量超标的制度失去了部分效用。任务数量不断增加，人们很难衡量每个人付出多少劳动。

苏联的收入等级在两个基本差别方面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等级进行比较。一方面是没有利润，这就限止了个人财富的积累；相应的另一方面是，所得税不是累进的，充其量最大限度停留在13%，是针对6000，8000或10000卢布最高月薪的。这个税率将引起英国高级工薪阶层的羡慕感。这样的税制在西方人看来是地道的反动。但是让我们公正一些，在西方税收的累进性和苏联直接税制的非累进性之间，反差的存在是有正当理由的。

总之，在一个计划经济制度中，从理论上说，工资等级表达了计划者的意志。如果他们决定给一个企业领导高薪，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待遇是必要的，以此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或者激励人们作最大的努力，或者对为集体福利作出的贡献给予合理的报酬。不管你们取三个动机中哪一个，计划者都没有理由把他们自己制定的最高待遇比例搞得越来越高。相反，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资等级在大部分时候是由私人企业制定的。国家可以认为不平等过头了，于是根据选民同意的公正思想，通过累进税的办法从最高酬薪中征得很大一部分[1]。

让我们注意一下存在于两个制度特权者地位之间的区别，这区别同样十分重大。苏联大型企业经理的实物报酬是有保障的：别墅和汽车不是给予某个私人，而是针对职务的；如果经理

---

① 对私人薪金收累进税导致对公务员薪金也收累进税。利润的存在是税收累进的一个补充理由。

失去了他的地位,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高额的工资报酬弥补了较高程度的不安全感。

苏联式制度几乎包含了在西方看到的各种不平等现象。首先在经济部门,在西方,工业部门的平均收入比农业部门高,这个判断对美国和法国是如此,对苏联也是如此。其次,人们观察到在每个职业内部存在的差异往往很大。某些集体农庄非常富有,如同几年前苏联人所说,有财富达百万的农庄庄员(人们热情洋溢地谈论他们,因为他们是最出色的劳动者)。在法国或美国的农业部门同样有特权者,是那些有运气生活在肥沃土地上的人或那些最勤奋和最有效率的人。

在有赖于公众欢迎程度的职业中同样也存在极端不平等现象。也许在苏联获得最高收入的人是著名艺术家和作家,总之同西方一样他们的状况取决于公众的态度。在苏联式制度内,公众的欢迎也意味着国家政权机关的欢迎,这是确凿的。西方却不是如此,至少程度不同,虽然同时享受到权力机关的照顾并不总是无用的。人们可能会问在每种制度中具备什么才能可保证成功,在这里和那里都有理由时而流露悲观情绪时而又流露乐观情绪。在两种制度中,作品达到很大发行量的某些作家却不是最令人赞赏的作家。在西方的成名作中,有庸俗的或色情的,在苏联式制度中与此对等的是奴颜婢膝的作家。有一天,我听到我的一位朋友提及《真理报》和《法兰西晚报》的可怕竞争。对两种制度的较量来说,这种方法不会成功,实际上没什么意义。这里同那里一样,在成功者中都有名副其实的人。我们不能用百分比作比较。作家或艺术家不一定追求以发行量或收入高低体现的成功。反正西方的知识分子会因默默无闻而感到不平,但却不会遭受国家的迫害。

在苏联式制度中惟一找不到的不平等就是直接与利润原则

挂钩的不平等，恐怕还不完全如此。"利润资金"，即对超出计划的企业增产部分所作的货币估价，是在全体劳动者中进行分配的，但比例很大的一部分是给予领导的。

当前，计划化体制是唯生产的，其首要目的是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基于这个目的，体制允许有政治、行政和技术的严格等级划分，并用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即长远来看是平等的思想对等级制从总体上加以论证。把这一种等级划分方式结合起来也许就得到一个稳定的综合体。

最后一个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差距？在苏联式制度中可能构成的集团内部达到怎样一致的程度？我们缺乏很多实验性资料。我个人的意见是倾向于用如下两个判断概括在我看来是主要的东西：处于等级下层和处于等级上层的个人之间今天还有极大的差距。相反，人们对此的觉悟是薄弱的。苏联式社会远不是均等的，但它的不均等不具有在西方观察到的特征。

依我看，社会差距由于经济不平等以及低下的生活水平而不可避免。当我在研究美国的情况时，我曾经指出只要非特权者的生活条件提高，社会差距就能缩小的过程，暂且撇开任何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不谈。从穷人有 4000 或 5000 美元收入开始，后来达到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使他与过去无法比拟的大资产阶级的差别缩小。然而在苏联，不平等仍然表现在最必需的物资方面：食品、衣服和住房。所谓昂贵的食品(即肉类)是留给一部分人的。奢侈的纺织品、主要指羊毛织品，价格相对高昂。由于城市化发展迅速，居住条件极其恶劣。我去年谈到过的所有这些现象都证明这样一个简单而根本的判断：苏联还处于从经济不平等向关系到生活必需品的社会不平等转换的阶段。由

此可见，不存在特权者和非特权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后者不把自己看成与“他们”对立的“我们”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相反，假如我们力求确定集团的性质，我们感到要找到与西方阶级等同的阶级是极其困难的。按照苏联的统计，我们完全可以说，一边有集体农庄庄员，另一边有工业领域的被雇用者，最后还有知识阶层，但是农庄庄员、工业中的被雇用者、知识阶层都不构成一个有阶级意识以及与其他阶级对立的阶级。假如我们用整个社会内部小集团的构成来为阶级下定义，把它定成是意识到自身存在和与其他集团对立的利益一致的共同体，那么在苏联很可能没有这样的现实，尽管有经济不平等、客观的区分和社会差距

协调一致的集团难以形成，因为从本质上说，政权不同意它们形成、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提出请愿。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所有的领导都是被任命的，不容许有党派、独立的工人工会和利益集团的竞争，但完全可能像西方一样仍存在职业的区分、社会差距、经济不平等，而不见得凝聚成具有自我意识的集团。再说，我们曾在共卫星国中找到例子证实这个分析：当革命在匈牙利爆发的时候，人们看不到两个面对面的阶级，看到的是全体人民起来反对少数统治者。或者大家都被纳入一个等级制度，或者对立趋向于变成全面性的。不排除存在总体上的社会等级，但是层层相叠的各阶层是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制度的稳定性，它禁止请愿集团的组成和整个社会内部的竞争。它许诺并可能实现群众生活水平的缓慢提高，甚至继续使轻工业附属于重工业。它力图给工业社会的管理干部以好处。它希望少数管理经济和统治国家的人保持团结一致，并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杰出作用。最后，在每一

代，它都从社会各界中提拔富有才华的一部分年轻人。制度维持着纵向流动，起码在代与代之间。

如果这个分析是确切的，一切工业社会的根本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注意到了。每人都有望得到某种改善。也许改善被认为过于缓慢，但不管怎样，所有孩子甚至成人面前都展现广阔的远景。特权者们有令人满意的地位，人们以无产阶级团结的名义向他们灌输一种集体感情，与令人产生内疚感的资产阶级团结相比，无产阶级团结呈现无比的优越性，因为它使人问心无愧；而特权者的问心无愧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本条件。

因此，从我们当前谈及的问题来看，我们可以设想西方和苏联这两种制度的发展有某些共同的趋向（经济增长、生活水平上升、中产阶级队伍扩大、群众拥有耐用消费资料）。

同时，我刚才向你们描述的那个社会呈现出与革命前的俄国的某些相似之处。管理人民群众的是一个领导阶级或特权阶级，它由国家委任，具有官僚的和资产阶级的性质，因为西方资产阶级所占的地位在苏联是赋予官员的。苏联式制度就其特征而言包含着社会和国家的融合。这个制度象征俄罗斯国家的传统形式和现代经济的新生事物之间的妥协。这种结合从根本上说是稳固的。如果我今天列出的所有条件都得到满足，这样的结合可以持续下去（条件是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特权阶级对本身的团结一致有敏锐的感觉、没有敌对集团的形成）。但是仍然会出现一个疑问，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出发点：我曾经为你们描绘过一个社会，对官方思想体系进行辩论在那里是被禁止的，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社会？

这样，我们就触及到了什么是构成苏联式社会发展的真正问题。从经济上说，这个社会已经超越极端匮乏阶段，意思是超越了经济发展最困难的阶段。但在什么程度上苏联的结构体制

没有因经济的初步繁荣而受到威胁？回忆一下美国经济学家的判断：苏联领导将以保持自身的绝对权力而阻碍生活条件的改善。我认为这个贫困化规律是错误的，但它提出了一个实在的问题：在一个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里，是否还能保持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僵化？下面的判断显而易见但却自相矛盾：假定苏联式制度必须改变，要改变的原因将不是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恰恰相反，是经济和生活得到了持续改善。

第十八讲

展望苏联各类领导

我在上一讲中给你们介绍了有关苏联社会发展未来的一些零散而假设性的看法。今天我想先尽可能简练地回顾一下主要观点。

一、苏维埃俄国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经济增长的持续甚至重工业的继续发展都不再需要降低群众的生活水平。

二,它非常可能更进一步明显改善特权者的生活条件,同时也较缓慢地提高普遍的购买力。

三,分配暂时还是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几乎同最初几个五年计划期间一样,至少在工资或待遇的等级上与西方类同。然而苏联的这种不平等比美国更突出,原因是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总体上说更低,所以不平等表现在必需的生活资料上。

四,个人和个人之间在物质和心理上的差别仍然是巨大的。然而,鉴于制度的根本特征,也就是禁止群众组织起来,所以觉悟集团完全无法形成。我曾观察到即使在苏维埃俄国的城市和农村,也存在各种农民和各种工人之间复杂多样的紧张矛盾。我不想排除这类冲突,十几年来,波兰的社会学家对众多的冲突作了研究,冲突发生在拥有地产数量不同的个体农民之间,或私人土地所有者和集体农庄庄员之间。我的观点不是集团的冲突在苏联已经消失,而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阶级斗争,就是说全国范围内的广大工人或农民组织起来,具有阶级意识,并展开斗争,

在那里是不可能的。某个企业的工人可能意识到自身存在并起而反对领导，农庄庄员可能与农庄的行政领导对抗，甚至农民很可能朦胧地觉察到有一种共同感，以与城市居民相对立，但不可能有全国范围内的阶级那样的团体，因为阶级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为前提。

五，最后，苏维埃社会有等级，其主要方面是专制的官僚阶层，在一个计划化社会里，它可能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并且确保足够迅速的隔代社会流动。

然而，上一讲结束时，我曾告诉你们一种新的现象发生了，那就是生活条件的普遍改善和少数特权者技术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首先而且尤其表现在少数特权者身上。由于阶级的组成被排除，所以只有通过他们，群众的意愿才能得到表达，集团间的紧张状态才能浮现于表面，一种新的思想方法才有可能出现。苏联的少数领导人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想我们通过简要分析可区分出四个类别：一，技术人员、工程师、经理、企业领导、政府部门领导；二，党内人士；三，知识分子；四，军人。

你们要注意这样划分的意义。当某记者解释说，技术人员总体上是反对党内人士的，而党内人士是反对知识分子的，这个分析不仅简单化，而且是错误的。很多工业部门管理人员是党内人士，也不缺乏同样是党内人士的知识分子。这些类别中哪个都不可能与他人对立，因而不可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反对他人。只是苏联式社会的领导阶层必定包括受教育程度和思想方式不同的人，这完全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似。一个工厂的管理者受的教育不同于小说家，也不同于工会书记或国家机构的人。这些个人不担任相同的职务，不完全以同样的办法被选拔出来。随着苏联式制度延续下去，领导人按正常程序逐级晋升，他们不

再会成为工厂经理，因为他们曾经在革命时期或在党内扮演过光荣的角色，但也因为他们接受了技术教育。所以从总体上说，少数领导人将越来越有文化和有知识，但是他们仍然处在技术人员之外，是有自己思想体系的党内人士和是怀有疑惑和疑问的思想家。

这些内部紧张关系包含两个关键问题，将决定苏联式社会的未来发展：一，在什么程度上可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在前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运用的计划化方法？二，在同一时期内，在什么程度上可能保持作为合法思想的正统观念？

在苏联，造成少数领导者内部紧张关系的主要矛盾对立面，在我们看来一方面是经理或技术人员，另一方面是党内人士或意识形态专家。你们回想一下，在西方社会的例子中我曾注意到主要对立双方一边是当选者，选举方式和议会方式的拥护者，另一边是**政治煽动家**，那些自称体现阶级或全民意志的人。在苏联，根本的对立潜在地存在于两种人之间，一种是希望尽可能合理地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工业体制的人，另一种是国家机构的人。苏联经济的现任领导人几乎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目前，他们在政治方面还要受指挥于尚健在的第一代革命家，后者不是技术人员，甚至不是操纵群众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结构体系应该越来越导向于合理的管理。下面的问题将必然会提出来：斯大林的经济实践和经济思想可能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吗？

现在的情况如何？可能发展到什么地步？

一，理论家们曾经提出每年应该用于投资的国民收入百分比达到25%，并将此作为原则。因而他们把资本的迅速积累当做信条，为国力牺牲购买力，或者为后代人的福利牺牲当代人的福利，愿意怎么说都行。苏联在世界上起着日益增长的作用，在

国家关系和意识形态方面，它都雄心勃勃。它提供经济援助，时而给予已经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如中国[1]，时而出于外交动机给予不发达国家。东欧的情况是最复杂的。匈牙利或波兰在1945年到1956年间是被苏联剥削的，剥削这个词应该从资本主义含义上去理解。自从那两次革命以来，形势颠倒了过来，这两个国家不仅不为苏联带来好处，反而让它更多地付出。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哥穆尔卡先生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争取到了提高今后卖给苏联的波兰煤价格，并且追溯到已往，前十年所有交货的煤的价格也得到提高[2]。

规定25%投资本身并不是不合理的（可以认为高比例投资符合于经济增长的理想标准），但这需要作出巨大牺牲。是不是作为革命者继承人的第二代愿意延缓生活条件的改善，以确保整个集体更强大的实力或者去援助结盟的国家？我们不能给予明确的回答，但可能苏维埃俄国和其他同类国家一样，增强实力的意愿和对作出牺牲的认同随着革命的资产阶级化而逐渐减弱。

二，斯大林式的经济管理实践包括：对某些部门优先发展的僵硬规定；对生产资料价格的确定，由于价格的任意性（我指的是根据成本确定价格，而不考虑产品相对稀少的情况），定量分配就变得不可避免；中央政治局参与工业部门和工厂管理的细节问题；最后，消费者对国家财产分配的决定性影响非常薄弱。而这些特征[3]严格地说不包含在《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一

[1] 从1960年开始，援助被中止。

[2] 根据西方的研究，我搞错了。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继续操纵与东欧交换的商品价格。

[3] 我们可以把这四个特征综合起来为斯大林的经济管理下定义：僵硬的优先发展，价格的任意性，专断而细致的计划化，对消费者愿望的漠不关心。

般理论中，更不要说列宁的论著了。

人们决定把冶金工业的发展提高15%，如果缺少资金，就牺牲纺织工业。我们习惯于认为这种在西方战时实施的优先发展体制是苏联计划经济的实质。但这里说的是一种历史偶然。为了十分迅速地建成强大的重工业，领导者在一个既定时刻决定作某些选择，但是马克思从来未构想过这样的事。人们声称某些管理原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就构思出一种为之辩护的思想体系。但谁也无法阻止人们去改变这些实践，谁也无法阻止人们到《资本论》中去寻觅，并找到人们所期望的同样多的论断，以证明其他实践的正确性。换句话说，这是在苏联的特定时期引入的特殊管理模式，这并不体现从前的某个学说，这是可以改变的，同时不必抛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任何精髓，甚至必要的话不用抛弃斯大林主义的精髓（我们在《斯大林全集》中完全找得到为被改革的实践进行辩护的内容）。

而且，铁幕另一边的某些国家已经改变了上述模式。在南斯拉夫，价格是根据企业间的关系来确定的，不再由计划局作决定。在波兰，批评详尽的计划已经成为被公认的事。甚至在苏维埃俄国，人们趋向于由分别负责一个工业部门的政府各部来替代由莫斯科中央局协调的地方计划局。这种改革不直接触及我分析的那些成分，但可能导致这些成分的变化。

三，我们通常借以说明苏联式制度特点的农民政策也在一定情况下遇到问题。没有理由认为这项政策本身与学说的本质相连。组成附属于拖拉机站[1]的集体农庄，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把农产品出售给收购当局，这些措施激起部分农民的消极抵制，因为这导致乡村生活水平的下降。国家以很便宜的价格收购食

[1] 自那以后被取消了。

品，并对卖到城市里的这些产品征高额税收，这样，农民阶级本身就为资本积累出了大力。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只能用严格的纪律迫使服从和征购收获物，由此，集体农庄被置于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之下，并由它任命集体农庄的管理者。

随着苏联经济的发展，农民政策可能朝不同的方向发生变化。第一个设想是属于一些领导人的，是普及作为公有企业的国营农场，这可以说是超斯大林主义的。实际上，人们在某些有利的情况下创建了一些新农场，如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或者开垦中亚的处女地。

另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是试图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权。斯大林去世以来，很多改革是朝着这个方向的，特别关系到作物选择方面。收购的强行要求有所减弱。苏联农业的恶性循环来自于必须以低价征购大部分收成，因而必须使用强制手段，而这又反过来引发消极抵抗。斯大林逝世后，人们提高了农产品的售价。目前，根据属于优先上交还是额外上交而存在不同的价格。好像现在的情况是趋向于简单化了。集体农庄交付一定比例的收成，或者作为一种实物税收是义务的，或者以很低的价格出售，余下的部分可自由卖出。这样的制度使得国家施加在农村群众身上的压力减小了。

这是一个乐观主义的假设。我们也可以设想苏联领导仍然是一些理论家，认为集体农庄只是达到最终制度的过渡，惟有国营农场即国家所有制才标志社会主义的终极阶段。

斯大林在他去世前出版的著作指明的是这个方向。集体农庄仍然是合作社性质，农产品是被销售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应该取代销售。计划者们抱怨在农业中小块私有地占据重要地位。农民自己占有的这些小块土地耗费了可支配的劳动中不成比例的部分（但也提供了将近一半的奶制品）。

人们可能从理论上构想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学说性的，旨在尽可能取消私留地，另一种是自由的或技术性的，考虑到合乎人情的现象，即农民对私人产业的兴趣。如果苏联领导采取第二种办法，他们将缓和他们施加的压力，实施更宽松的农业政策，而不触及苏维埃主义的实质内容。尤其因为变化首先发生在计划化的方法方面，改革可能会更加容易。

的确，越是想加速工业发展，人们越是不得不降低群众生活水平，也就越难避免强制手段。缓解对农村的压力意味着苏联领导更少地依靠警察，更多地相信经济方法，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是更少地相信恐怖手段和更多地相信价格。越是对个人意愿缺乏尊重，就越少求助于价格刺激，就不得不越多地利用权力。最近几年的趋势是朝自由的方向发展，我称它为自由的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字眼，这是很有限的自由主义，让我们叫它为“放松恐怖手段”吧。苏联计划化具有的暴力特性，可以说警察特性，至少部分地曾与经济增长时期有联系。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合理化以及总生产量的上升，在我看来，制度所具有的近乎反常的特点可能趋于减弱。

这个结论依赖于一个不是不可争议的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领导人将变得不那么空谈学说，并且按西方对词义的理解，将变得更加理性。我明确指出要按西方对词义的理解，因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理性的含义会引起争论。趁此机会我们过渡到第二种关键矛盾，它使技术统治论者和意识形态专家处于对立的紧张状态。

最好先确定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什么。在我看来，它包括好几个根本不同的方面。人们首先从中找到的是对经济实践的解释、论证和理论构思。这就是我刚才涉及的有关经济管理的内容

其次人们从中找到的是捍卫和阐述政治实践，坚持一党制信条，断言平等是小资产阶级的固有思想，断言工资等级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尤其是宣称国家的正统性具有强制意义，并应该原封不动地被全体人民接受。

最后可找到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意识形态把我们观察到的社会即苏联公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与马克思有关理想社会的学说紧密连结。一旦政党一劳永逸地接受了历史或天命委托的权力，这种连结就导致无产阶级和政党的混淆；现在我们就触及到了依我之见是苏联社会的根本矛盾，这个矛盾不可预知，因为放弃这种意识形态同坚持这种意识形态一样困难。

为什么很难坚持？我愿意再一次向你们强调：原因仅仅是断言工人自身已经最终把领导国家和全人类的使命交给了一个少数人组成的小集团是荒谬的，断言每当这些个人作决定时就是工人阶级借助于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也是荒谬的。但从另一角度看，什么时候人们放弃这些见解，苏联社会就变得普通而平凡，也许像西方社会一样美好，总而言之，像其他社会一样，功过和利弊兼容并包。这个社会不再是通向人类永福惟一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由此，我认为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意识到了这个矛盾，放弃了这种意识形态，这就是承认苏联不再是所有劳动者的祖国。坚持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自寻麻烦，就是违背显而易见的事实和思想。

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先生最近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长时间地阐明个人崇拜的灾难性后果。他揭露了与斯大林个人有关的大量事实，西方人并非不知道这些事实，至少那些愿意读一些书的人了解，这些书在苏联及其卫星国家是不被正式承认的。报告本身向理论家们提出了一个几乎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自身通过政党掌握政权，有关个人崇拜的现

象是怎样产生的呢？人们不可能不提出意大利共产党书记陶里亚蒂曾提出过的问题：个人崇拜现象不起因于单独一个人，而是苏联式社会结构本身决定的。即使斯大林式恐怖主义的根源存在于苏联式社会结构中，也不由此导致这个社会比别的社会更坏，但显然导致它是由少数人统治的：几年前是一个人，今天是一个集团，他们可能作决定、犯错误以及犯一些过去或现在与无产阶级政权毫不相关的罪行。

苏联领导人刚想放松思想意识的正统观念，他们就遇到了今天仍然摆脱不了的一个矛盾。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两个信条，一个是把无产阶级和政党混同起来，另一个是确认苏联式制度是通向人类永福道路上的必经阶段。接着他们要作好准备任凭生物学家接受遗传规律，任凭小说家写不令人厌倦的小说，也许任凭画家画抽象派油画。但是自由是蔓延的、有传染性的。对知识分子说："你们有权利自由讨论和写作，但是你们不要对国家的思想基础质疑问难，这是苏联式社会中最易受攻击的部分。"这样说就是试图解决化圆为方的问题。

至少在两个国家里，这种矛盾以革命的形式爆发出来。在波兰和匈牙利，一旦把争论的权利还给了个人，他们就没有在苏联领导人希望竭尽全力捍卫的信条面前止步不前。无论在波兰还是在匈牙利，沿着自由道路上的各个渐进阶段前进，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了。人们首先重新考虑正统观念的泛滥问题，解放了自然科学，然后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文学、音乐和绘画，接着敢于直言不讳，甚至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人们承认计划化的困难，坦言价格的随意性造成这样那样商品的匮乏以及定量配给，在波兰，人们发现 3/4 的国家工业亏损，乡村中的集体农庄亏损。本来应该尊重的东西，诸如制度的理论原则，也没能幸免被人们争论。

结果是在一个国家爆发了一场起义，在另一个国家对一切都重新提出来讨论。在波兰，制度不再是苏联的那样。这个国家在地理、政治、军事上还属于苏联的集团和华沙条约，但是它放弃了推广土地集体化，农产品以相对自由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人们宣布不再应该由中央来规划经济生活的细节。人们承认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取消手工业和小商业是无用的。换句话说，人们保留了对外贸易的垄断、计划经济的总体思想、工业的公有制（总之，任何人都不能买工厂），但苏联式经济实践的很多成分都发生了变化。

这还不是全部。几天前我有幸听到一位来自那里又回到那里的波兰知识分子的报告。他向我们解释华沙的人如何看世界以及大国的对立。今天的波兰人发现了所有现代国家的共同特点和一种工业经济的诞生。他说，我们了解两种类型的工业经济，苏联的和美国的。在波兰，人们把苏联式制度叫做"穷人的崇美（国）主义"和把美国的制度叫做"富人的共产主义"。那么斯大林主义的甚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还剩下什么呢？

如果我们接受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应该接受），如果我们接受建造工厂的必要性（应该接受），那么直到目前为止，从技术上说和从减轻穷苦人民的不幸上说，不管怎样，产生最有效结果的办法与其说是苏联的办法，不如说是美国的办法。报告人极其含蓄地补充：我们的传统习俗是无代价地互爱，我们爱技术，但是它不爱我们。计划方法的改变不足以革新波兰的经济。也许当前的经济正处于更为严重的混乱中。

因此从现在起苏联势力范围失去了整齐划一性。不再有一个制度、一种思想体系，苏联保持了它的最主要特点，但呈现于观察者眼前的是其他的模式。首先有南斯拉夫的不同模式，确切地说铁托从一开始就是分立派，而非异端派，与其说他主张改

革计划经济，不如说他在一般意义上坚持针对斯大林的独立性。但斯大林式的正统观念、经济实践逐渐发生了变化，现在南斯拉夫农业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个体生产者，人们力图给工业企业某些自主权（人们谈到工人监督，我对其效果不敢肯定）。总而言之，人们抛弃了中央计划化和价格随意性的教条，而尽力创造一个市场，企业间交换的商品价格由市场来决定。

波兰则相反，它是异端派而非分立派。它或许想和南斯拉夫一样成为分立派，但是地理环境不允许它这样做，因此它原则上屈从于克里姆林宫，但它越来越不顺从共产主义的教条和政党。目前还谈不上正式接受多党制，但出现了某些比放弃详尽经济计划更重要得多的事物：人们自由地发表言论，而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地写作[1]。莫斯科领导对华沙领导的主要责难不涉及中止土地集体化和提高煤价，主要针对的是波兰新闻报刊的内容。当前，铁幕的那一边，一个正式以苏维埃主义为准则的国家在众多问题上表达意见时，好像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巴黎。法国的政治现实，包括皮埃尔·埃尔韦先生或其他某个共产党人的争论引起华沙知识分子的强烈兴趣。

苏联则相反，主要方面还是同斯大林时代我们了解的情况一样。只要这个判断仍然是正确的，我们在波兰和匈牙利看到的所有变化都可能在某一天有被取消的危险。目前在苏联占支配地位的是正常化了的斯大林主义。除非出现个人反常现象，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必把正统观念一直推行到绘画和生物学领域，都不必不时地清洗政府机关的队伍，都不必在有一天宣布最伟大的医生们是叛徒或凶手，都不必制造不合常理的重大案件。人们取消了以往似乎应该赋予甚至是党的前总书记的人格

---

[1] 1963 年与 1957 年相比，写作的自由大大地减少了。

的赞颂。制度向专家治国的模式靠拢,但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证在其主要方面仍未被触动。赫鲁晓夫先生在他的每个报告中继续把苏联的现实和马克思理想社会学说连在一起;他的党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意愿,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将推广到全世界。

这就是当前形势。现在让我们带着一切可理解的保留条件,大胆地展望一下长远的前景。

我再次表明坚定的乐观思想。如果我必须在如下两个假设中作选择:一是极权主义的加强,尽管它变得更没有必要、二是极权主义的逐渐缓和,我将选择第二种说法。在苏联式制度走向正常化(我不说民主化)以及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极端形式趋于减弱上,某些力量起着作用。古往今来,革命的狂热从来没能最终抵御时间的消耗。苏联的情况是,革命狂热持续时间很长,但那是由于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看来第二代领导人表现出的是继承者的特色,而非开创者的特色。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干部的技术知识水平越来越提高。如果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我将很乐意强调这种制度的矛盾,为了创造有效的经济,该制度不得不普及教育,尽管久而久之教育会危害专制政治的稳定。最后依我之见,从长远看占上风的大概会是专家治国论的趋向,"穷人的崇美(国)主义"将变得越来越兴旺发达,继而,管理者们将更关注于他们自己和集体的福利,而不是精心地宣传他们那已经受到怀疑论侵蚀的信仰。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这说的是长期前景,对于近期的预见,我无能为力。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设想在斯大林主义(指苏联的情况),或一党制(指波兰的例子),或进一步与多党并存(这或许是匈牙利的变化模式,如果它被实施到底的话)这些范围内出现宽松气氛。我们也想像到由于苏联领导担心在他们控

制的势力范围内部出现日益增多的制度,因而他们力图消灭因解冻而产生的毒害萌芽,这对整个集团来说是令人生畏的。

在上述多种可能性之外,我将不多说什么,因为我想再次提醒你们,经济-社会分析本身包含局限性。我在今年或去年从事的研究针对整个社会的三个因素,即经济实践、社会集团和少数领导者。这项研究不完全,也没想有此奢望,它省略了也许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政权体制。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分析的这三个可变化因素足以精确地决定国家类型和政体类型。至少这将是我在明年的课程中要研究的问题,对象是当代我们能观察到的两种纯粹的政府模式,也就是民主政府的模式和苏联式政府的模式。但是在接触这个有关政治制度的理论之前,我将在下一讲也是最后一讲为这两年的课程作一个简要总结。

第十九讲

结　论

本课程所包含的社会学内容力图给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作出精确的表述和可能的回答。如果社会学停止从哲学范围的问题中受到启示或者由其指点方向，它就有在枝节问题的研究中失去方向的危险，过于精细不足以确保获得成功。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学科企图教条地回答哲学问题，它将不再是一门经验性的客观的知识。它通过对社会现象或经济机制的研究，确定某个措施可能产生的结果或者某个制度呈现的利弊性质。人们难以或许永远不能以科学理性的名义来确定最好采取什么决定或应该选择什么制度，因为没有不包含缺点的行为，也没有无弊端的制度。

去年和今年的课是由两个传统政治思想问题引出来的：第一个有关平等和不平等，第二个有关整个集体被分解成互相分离和很可能互相竞争的集团。我参考了托克维尔和马克思这两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观点，并对这两个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前一位的出发点是，确信个人地位的区别在目前社会里正变得模糊，而且越来越趋向于消失。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不可能不走向更加民主化。他认为，经济的不平等当然不会因此而消灭，但与地位平等这个主要现象相比较是次要的。在他看来，真正的取舍是在自由的人民社会和专制的人民社会之间。至于马克思，在他看到这种地位差别消失的同时，也发现对立阶级的继续

存在，因而把社会矛盾视作根本矛盾，这个社会虽宣称个人平等，但通过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挑起了与以往社会同样激烈或更加激烈的集体对抗。因此他预见了冲突逐渐严重直至爆发的前景。

换句话说，我们的两个问题是：社会不均等现象及其含义；阶级现实对全民统一性的破坏。现代工业社会中敌对集团的分裂状况究竟达到什么程度？

作为结论，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提一个思想，它在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著作中都没有重要地位，这就是经济增长或生产力的发展彻底更新了传统不平等问题的含义。托克维尔还试图用孟德斯鸠的方式把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混同起来。对他而言，现代集体只是某一大类社会中的一种，这类社会消灭了贵族，把福利放在社会准则的首位。我们的社会本质上不是商业社会，它们本质上是工业社会，这意味着财富的源泉不是交换，更不是依仗权力或掠夺对交换比率[1]加以操纵，而是决定劳动效率的机器质量和管理质量。财富不是借助强力而是借助劳动生产力而得来，我们或许正生活在有史以来人类富有的初期阶段。这个重大的事实应该被所有人承认，然而它被轻视了，这正是因为在几百年或几千年期间人类社会从来都没有把权力和财富分开的缘故。

马克思不是不知道这个主要事实。在他的著作中，处处都提到一种经济发展的理论。他比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都更清楚地看到现代经济的特点是不断发展的性质，在他有关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发展（投资的另一个说法，即生产力提高的因素）的论述中，他能够承认工业社会的这个主要特征。阻碍他创造出一种

---

① 买进和卖出的商品价格比。

经济发展普遍理论的因素是，他在自己生活的时代震惊地看到，伴随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到来出现了众多现象，如集中在原始工厂周围的劳动者承受着极度贫困，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即富有和贫穷呈现鲜明对照，生产资料拥有者的权势和受剥削工人无能为力的现实形成对比。

基于这些实在太真实的现象，他发展了所有权是一切社会冲突根源并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也发展了一种资本主义变异的理论，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贫困化现象将日趋严重。假如他是正确的，就是说假如伴随资本的积累，人民群众越来越贫困，不容置疑，革命不可能不爆发。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合乎愿望的。实际上，根据《资本论》，贫困化首先由工业后备军引起。只要从思想上设法改变劳动力市场，只要设想工人组成的工会能够平等地与企业主谈判，哪怕在马克思主义观念内，贫困化的必然性就足以消失。如果我们撇开马克思主义中这种悲观主义看法，它就可能在总体轮廓上成为所有经济制度的一种有价值的发展理论，依据这个理论，各类工业社会的特征和每种模式的利弊（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剩余价值是中心问题，对它的分配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将显现出来。

不管怎样，我们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是错误的，如果不知道经济发展的良好效果，为治愈我们社会所有疾病而设想一种灵丹妙药是错误的。在法国这个具体例子中，今天我们知道一种经济有可能既迅速发展，又受到外汇资源枯竭[①]危机的威胁。我们知道生产力发展在于有效地组织劳动，这可促使劳动效率的成倍提高。但为了使付出的劳动有效，就必须致力于物质材料。即使在现代经济中，人们也做不出无米之炊，人们需

① 1957年。

要能源和原料，因此实现工业化有自然和地理的障碍。但在当今世界上，对全人类来说，如果人们考虑的仅仅是自然资源问题，经济增长并不因此就不可能。

然而，为提高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有第二个条件，这就是产量的增加快于人口的增长。即使在二十世纪，高出生率有可能使通过发展来缓解贫困的努力付诸东流。我们熟知在众多社会里，科学为防止人类死亡比为提供他们生活资料有更突出的功效。经济增长造成的不是平等，而是减轻不平等。这个判断确实只符合这样的社会：在那里，出生率下降以及人民的技术和智力素质的迅速提高是结合的。

即使在顺利的情况下，认为工业文明是平等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我曾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而且我想在结论中重复，鉴于当前的集体财富状况，没有这样一个社会：严格平等的分配所给予特权者的生活水准是他们视为可接受的。一个工业集体中的劳动组织是完全有等级的，职业在资格上有差别，很难设想甚至抽象地设想职位等级不意味着收入等级。在市场体制和私人资本体制中，不可能避免资本拥有者对利润的一定积累。在全盘计划化的体制中，人们可能实现，或者更慎重一些说，可能想像一种平等的分配制度。但是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计划者自己必须有苦行的意愿；二是他们必须认为，即使工作性质有差异，收入均等也是可能的，并与之相容，而这样的相容即便不遇到经济阻力，也会遇到社会阻力。两个条件都不可能做到。

然而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今天具有的含义已非同以往。第一个原因是报酬的等级看来几乎直接反映了工作的差别。而这个差别是与工业社会的本质相连的。因而如果你们设想一个相当流动的集体，个人的机遇从一开始并不过于不均等，劳动者分散在不同等级的岗位上，同时领取不同等级的报酬，这个现象的出

现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公正的，因为这两个不同等级互为关联，公正仿佛可以得到满足，至少是成正比的。此外，我力图向你们指出，很有可能，归于国家中少数特权者的财富比例随着经济发展趋于缩小。但是即便假定我错了，后果也不那么严重，因为最可能缩小收入差距的办法是普遍提高生活水平。

然而我不愿意在一个过分乐观的调子上结束。从心理角度和社会角度看，不平等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来没有过一个集体承认不同个人间的一定平等。然而，我们的社会越是关注福利和财富，人们就越趋向于在生存领域中编织对平等的憧憬。这样就产生了下面的反常现象或矛盾现象：现代社会也许更趋向于缩小经济上的差距，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差距，但人们在这个领域中的要求从来没有如此强烈，正是因为社会经济条件对今天的人来说比对过去的人意义更为重大。工业文明摧毁传统秩序的根基，消灭几百年来对等级制度的屈从，这个制度曾被视作是命中注定或天经地义的。因此总财富的增加有时创造出一种要求平等的欲望，却没有能力满足这个愿望。

由此得出，经济发展使不平等现象逐渐缓解，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同时也没有多大意义。对于社会学家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经济增长究竟引发出什么结果，是更多还是更少它无法满足的要求。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里，如果收入的分配窒息了发展，不平等还是一个中心问题。假如少数特权者获得国民收入中相对可观的一部分，即1/5或1/4，而且他们又没有节俭和投资意识，保留着挥霍无度的习惯，那么不平等将不仅是不公正的——从我们想像的公正观念看——，而且对经济增长是一个障碍。就是在这类社会中，革命的必然性(从马克思主义含义上说)可能得到肯定，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现在来讲第二个问题，就是整个集体被分裂为相对团结一致的集团的问题，我想从这项研究中概括出几点结论。

你们还记得，我们在为社会阶级下定义时遇到很大困难，有几个理由。首先，可以拿来作为区分的标准太多。的确，根据社会-经济条件、威望等级和对权力参与的不同情况，工业社会不是清一色的。这些不同的类别不一定吻合，因而使主要集团的确定成为困难的事情。人们对工业社会的结构所作的描述是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有些人看到整个集体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分层结构中。所有个人分散在收入、威望和权力的不同等级上，这些等级不完全吻合，但每个等级中都包括很多梯级，均匀地逐级由基层到顶峰。另一些人看到社会被分离成阶级，每个阶级都相对紧密地与一个特有的阶层连在一起。所有阶级在物质上和心理上有相当明显的区分，它们在整个集体内部构成各种局部社团。有的人还对这个理论提出不同的表述方法，认为有两个主要阶级，一个可以说是掌握政权的，另一个是服从政权的。难以在上述两种看法中作选择，因为哪个看法都不完全错或完全对。模棱两可的态度不只是出于社会学家的偏爱或由于科学的不确定性，而且在于现实本身。工业社会不是被无限地分割成极小的单位，也不是被组织成几个大集团。

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人们不应谈论社会阶级呢？我想在三种情况下：第一种情况是社会差异的主要原则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宗教或种族上的。例如，南非的整个社会结构是由种族对立所决定，不同意这个看法是荒谬的。同样在大部分近东国家里，区分的标准更主要是宗教标准，而非严格意义的社会标准。第二种情况是，如果每人的境遇完全不依赖于他在整个集体中所属的集团，而仅仅决定于自己，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人在惟一的赛

跑中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那么谈论社会阶级是不合理的。没有一个现代工业社会开始就实现了机会均等。最后,第三种可能的情况是所有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基本上是一样的。而我们知道这种状况从来没有见到过。

在这三种假设之外,谈论社会阶级都合理,这些阶级是由多种标准确定的集体,在整个社会内部构成一些或多或少真实的集团。一切含糊不清的因素都包含在我故意使用的这几个词中:“plus ou moins réels(或多或少真实的)”。如果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阶级的成员,都知道自己属于这个阶级,并一致认为那里才是他们的共同集体,事情就简单了。工业社会中的很多人都大体知道他们属于哪一类。如果人们向他们问及此事,如果社会学家问得巧妙,就能成功地让他们说出他们大致处在什么等级地位。如果人们把事情向前推进一步,向他们暗示答案,最终就能从他们嘴里得到他们属于某个阶级的肯定答复。但是人们对阶级归属的觉悟程度是不相等的,因而阶级归属的显著程度也不相等。

在专家们认定的四个主要阶级中,至少有三个是模糊不清的,而且相当难以区分。资产阶级(除了人们说它是上层阶级之外)不代表一个非常凝聚的、充分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团体。只要想一想其成员的人数就足以明了,他们在人们所说的“阶级斗争”中充当“敌人”的角色。中产阶级(我们不知道这个词应该是单数还是复数)是一个大杂烩,可以把既不属于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也不属于精英阶层的人们放在里面。至于农民,人们时而认为他们构成一个惟一的阶级,时而认为他们被分成好几个部分,视其占有产业的数量和不同法律身分(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农业工人)而定。惟一与想像的类型没有过分差别的团体是工人阶级。只有这个阶级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上看在众多国家中是

实实在在的现实，然而即使在工业社会里，这个集团也与理论所期望的团结统一相去甚远。依我之见，与其说趋向于更强大，不如说趋向于瓦解。在英国，人们估计有约1/3的工人不投票选举被看做代表他们的政党。选举是充分的政治行为，虽不足以激起阶级意识，而阶级意识对于检验阶级的真实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社会阶级在它们具有阶级意识的情况下变成了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所谓阶级意识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包含的特殊意义上说的，我想说的是既意识到它们的现实存在，也意识到它们之间的斗争。结论通常是显而易见的，但稍许反常：当阶级以其原本的样子互相承认的时候，它们对工业集体的存在起决定性影响，只有当个人信服于某种学说的时候，阶级才会互相承认。不管表面现象怎样，再一次得出地道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因为马克思本人宣称只有当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时候，也就是只有当它发现自己是被压迫的集团，具有强烈革命愿望的时候，它才真正存在。

当工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历史使命时，他们虽仍然显示出一些客观的、物质的、心理的共同特征，但他们缺少最主要的东西，以便成为改造社会的积极动因，那就是发现他们的一致性以及制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的规划。阶级的救世主降临说经历了奇怪的命运。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曾被历史事件所证实。如果说因工人采纳了无产阶级革命使命这个思想，就说思想是正确的，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证实，但同时，它也被否认了，因为根据理论，采纳它的人本来不应该这样做。直至目前，接受这种思想体系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背离的。总的来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越来越不革命。然而按照这个学说，他们本来应该变得越来越革命。像通

常一样，一种伟大的理论既正确又错误，或者你们如果愿意，也可以说人们预见到伟大的理论将在某种条件下得到证实，然而它却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受到检验。

对于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来说，革命的论调在当前有点过时。阶级之间展开殊死斗争的前景对美国工人比对真正贫穷的不发达国家无产者的诱惑力显然小得多。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西方国家来说，阶级间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思想已成往事。也许这种思想因某种哲学思想的关系而被某些知识分子接受，以及由于确实存在的不满情绪而吸引了一部分工人阶级成员，但是我们研究的东欧制度类型对于西方工业文明国家来说仅仅是一种倒退。从经济上说，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与我们熟知的西方经济体制相比是相当原始的。法国和英国所达到的生活水平暂时高于铁幕另一边，绝大多数西方人，包括工人，抗议向俄国的生活条件看齐。这不意味苏联式制度的失败，在它所确定的一项任务中它获得了成功，那就是建设强大的重工业，从现在起，重工业是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基础，在不确定的未来，它可能为整个集体带来福利。

在西方的消费社会和民主社会以及快速积累的社会之间，有第三种国家，叫做"不发达国家"，它们不属于我研究的两种国家的范畴，然而将对两者的未来有重大影响，甚至决定性影响。两个集团之间的论战不单纯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幸福或最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而竞争，同时，除了军事和政治角逐，也为争取余下的那部分人而斗争。而无论人们对苏联式的工业化方式给以严厉批评还是欣赏，它有时仍吸引"第三世界"的国家。它被看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加速。它使人们有可能模仿西方，同时又咒骂西方，人们从西方借鉴工业体制，但却保持一种对之否认和抵制的政治制度。

最后，在领导阶级不可能确保经济发展的所有社会里，革命似乎是必然的。而共产党意欲完成这个使命，正如苏联提供了一个范例。总之，工业化的第一条件是，管理集体的是有志管理的人。人们可以热爱或不爱共产党，一旦它掌握政权，它就要强行让集体节俭，以增加投资，它有能力确定优先发展它选择的部门。如果传统的领导阶级没有能力通过其他办法完成相应的使命，在一定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式的暴力革命必定会爆发，但这是在工业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而非最终阶段。

因此从这门课程中得出的历史蓝图不完全是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勾画的蓝图，也不是卡尔·马克思勾画的蓝图。人们从中找不到向一个越来越整齐划一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至少还存在阶级形成的可能，阶级本身是团结一致的，但互相分离和敌对。蓝图更不表示必然借助一次彻底的革命动乱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事实上，在我看来，恰当的考虑方法将可能是既区分各个经济发展阶段，又区分各种工业化模式。人们承认在每个发展阶段被提出的问题、出现的矛盾，以及有助于解决问题和矛盾的经济方法或统治方式。例如，在原始积累阶段，应该强制性地规定全体人民充分节俭以及快速投资。无论什么政治和社会制度，它必须有强有力的权威。从前西欧的这种权威因专制政体的残余而得到保证，而苏联则是因为有严酷而非人道的斯大林主义。不可能说清原始积累阶段的专制制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确切形式，但是可以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权威，要适应工业化初期的需要是不大可能的。

随着工业经济向前发展，对专制主义的需求逐渐减弱，但假如在通货紧缩或危机时期，集团间的冲突就有继续存在的危险。托克维尔在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抉择还会存在：是人民的社会，

这没有问题，但是对这个社会是自由的还是专制的必须作取舍。没有一种发展模式可保证政府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保持民主性质。如果某个内部和外部问题看起来难以解决，如果有几百万失业者，没有传统等级的人民社会就会成为暴力斗争的舞台，有时别无选择，惟一的出路是采取专制制度。而根据经验，专制制度的可能性随着经济增长而缩小，而不是增加，我们有权说的仅此而已。

这个结论是审慎的，我们期望如此。以经济和社会关系为出发点，对工业社会所作的一切描述留给政治方面的选择有多种可能。正是通过分析政治制度本身，我们能够确定多种制度的性质和未来。

在剩下的几分钟里，让我们尽量考虑一下在我们的文明中不平等问题的最终涵义。古往今来，人们似乎至少已经了解三种人类向往的平等景象：首先有给予所有人的平等，因为他们都有理性，具有象征意义和代表性的是柏拉图一篇对话录中的章节，说的是苏格拉底让一个奴隶学习算术。奴隶自己也有能力理解理性的真理。其次有基督教主张的精神平等。在使奴隶们从被奴役的状况中解脱出来之前，基督教向他们预言，他们的灵魂可望有永恒的前途。最后有公民的平等，他们都是国家的一分子。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憧憬另一种平等，至少通过每个人参与对集体财富的分享表现出来。

当前这种社会-经济平等具有两个局限：第一个也许是过渡性的，就是人民之间和种族之间极其悬殊的差异。当我们提到富足时，我们想到的是人类中的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贫穷仍然是天经地义。第二个局限是在我们社会中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是由职业、才能以及智力的差距造成的。工业文明没能成功地——或许永远不可能成功——消灭职务的差别

和个人天赋的极端不等。在这里出现了最后一个问题，是政治范围的问题。

依据什么原则统治不平等的人类？什么样的人应该当统治者？他们是否应该消除能力不平等的一切后果或者首先从一切人的平等尊严中得到启示？希腊的思想家给自己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谁当城邦首领？统治者若是技术专家，他们是否类似于船舶的领航员？当然，他们应该拥有一种知识。但对于集体福利必要的知识，是哲学家所拥有的，是那些对理念有直感的人所拥有的。美好的社会将会是哲人掌权的社会，退一步说，也将会是能够听取哲人意见的领导掌权的社会，或者还可能是一种三个成分平衡组合的贵族制度，即寡头制、君主制和民主制。哲学家希望自己不同于被人们称做诡辩家的人，因为后者对各种制度的根本差别听之任之，他们发现总是强者占上风，在某一方面公正的事物在另一方面就不公正。然而人们把诡辩家同哲学家混同起来，因为哲学家参照理念以贬低**任何城邦**的法律，他们的行为似乎与诡辩家如出一辙。诡辩家对**所有城邦**的法律在承认的同时又加以削弱，认为所有法律都有效或都无效。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技术专家。部长们应该懂得什么是利率，如何确保经济快速发展，如何克服通货紧缩，或更困难的是如何避免通货膨胀。但公元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福利和目标不由技术专家来决定，如同他们没有能力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城邦担负相同的职责一样。

除了几位哲学家，我们几乎不认为那些觉察到理念的人有能力把统治艺术教给政治家。总之，我们在两种原则间犹豫，仅有两种，它们由两类社会体现出来。在我们这边，我们顺从的是让技术专家依从于当选者，即我们选择的人。但是我们对当选者只有一半的信任，我们希望他们人数众多，永远不掌握全权，

希望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选民之间长期保持对话。我们投票选择的人在我们看来不是哲人，我们不能确信他们与超感觉世界有接触。由于他们的权力始终是暂时的，他们相互抵消对方的影响，因而有可能使损失程度受到控制。所以依我们之见，与政治领袖自己赋予自己最高使命的制度相比，上述制度相对来说更可取。

另一种是辩证学家的观念，他们由雅典哲学家转化而来。他们不声称自己与超感觉世界有交流，但企图了解全部历史，因此高于技术专家和思想家。我们不缺少会使机器转动或管理财政的专家。有些怀疑论者阐明所有制度归根结底都有效，比利牛斯山脉这边正确的东西到山的那边就是错误的，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今天的诡辩家接受历史相对主义，就像上面的现象那样，人们不可能超越。辩证学家不像柏拉图那样参照永恒的理念来克服这种态度，而是用黑格尔的方式参照整个历史。依据他们的全面真理，他们追求起码是过渡性的绝对权力。一旦他们成功地以历史真理说服了所有人，也许他们将可能恢复他们之间的对话以及与人民的对话，目前，他们掌握全面知识，他们向技术专家们发号施令，因为后者掌握的是一门低级学问，即知道用什么方法达到某个目的，但不知道瞄准什么终极目标。

在当选者和辩证学家之间，我们不得不在当代作出选择。去年，我力图分析这类人或那类人统治的制度是怎样运作的。作为结束语，我将简要地告诉你们为什么我站在当选者一边。所有工业社会都不是清一色的，假设有朝一日差异会消失，只可能发生在今后某一个阶段，那时的集体财富允许达到一种经济平等继而是社会均等。在此之前，交流、协调、竞争或冲突是这个社会中人类的真理。而为了使存在差异的社会接受集团之间、选民和当选者之间、政府之间的对话，任何集团都不应声称

掌握最高真理，至少任何集团都应不拥有足够的权力以武力强制他人服从被它视为最高的真理。如果谁都不再追求真理，对话就将中止。当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能使所有人不得不遵循其对真理的特定表述时，对话也将被中止。

附 录

一些批评家责备我没有整理出《十八讲》中的统计数字。由于课程的本身特点，我对这些责难并不在乎。从任何方面看，课程不是对俄国或美国社会、苏联式或西方式社会的描绘。课程的意向是得出一些基本概念、检验一种分析方法、消除幻想或成见。当前五年计划完成的确切程度、苏联和美国国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不是我们研究最需要的内容，尽管这些事实或这样的比较值得关注。

然而为了满足某些读者的好奇心，另外也是因为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提出了一些在课程中几乎没有指出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附录中提供一些补充信息和最近统计材料是有益的。

1950 年到 1960 年期间，西欧的增长率不仅远远高于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的增长率，而且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曾经计算出的增长率。法国在 1950 年到 1960 年间，生产力人均年增长率在农业中为 4.7%，在工业中为 4.5%，在服务业中为3.3%。德国和意大利在 1949 年到 1959 年间的增长率更高一些：德国的农业和工业都为 5.6%，意大利的农业和工业各为 5.4%和 7.1%。美国相应部门的增长率为 3.8%和 3.7%，英国为3.9%和2.1%。

1960 年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参照美国价格加权，相当于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 63%，如果加权参照法国价格，该比例则为 47%。假定国民总产量的增长率是 4.7%，到 1985 年，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参照美国价格加权，将相

当于当前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2%，如果参照欧洲价格加权，该比例为115%。如果五十年代的法国增长率持续不变，而且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保持稍低于2%的增长率，人们显然可从中得出结论，二三十年以后的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接近于美国。所有这些计算都建立在一种传统的方法上。人们首先确定劳动力总数，人们接受某个生产增长率，接受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对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中的一定分配，同时接受按不同收入水平对劳动力最终需求的一定分配。最先进的国家把劳动力的分配及其最终需求量作为参照。这些数值尽管投射出巨大的不确定范围，但意味着从1960年到1985年间人均消费增加2.5倍。因而1985年的年人均消费量以1959年的价格衡量将在9100法郎上下，相当于三口的中等家庭每月2300法郎。工业产量将始终在全部产量中占主要部分，即总产量的三分之二。45%的人口将在服务业工作。

即使西欧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于美国，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而言，美国继续比旧大陆发展得快，因为美国人口增长率为1.8%，比法国或德国高得多（两者都低于1%）。此外，美国幅员辽阔——这是英国和德国都无可比拟的。

这些数字提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否由于不可能保持或不可能再现的增长原因，五十年代的增长率是例外情况？或者是否这个增长率预示了西方经济真正的质的变化？由于统计和方法的不确定性，不同作者计算出的比率有差距（尤其是人们应该取哪种价格作参照，是最初年份、最终年份还是中间年份的价格？），但无论差距大小，所有作者在大约的数字上意见都一致。从1839年开始算起，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实际价值）年增长率为1.58%，按实际价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为3.5%[1]。没有出现人均增长率增加或减少的明显倾向，因为总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根据人口增长率必然有增长或减少的倾向。

另一篇由D.C.佩奇、F.T.布莱卡比、S.弗罗因德写的论文（也发表在《工业经济社会研究及资料学会学报》上，第804期，1961年12月1日）按每人每年创造的实际价值（换个说法是一年期间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率）计算出国民生产的增长率。对长期增长率的计算，日本自1880年起，意大利自1863年起，德国自1853年起，法国自1855年起，美国自1871年起，英国自1857年起，结果如下：日本最高，约为2.9%；英国和意大利最低，约为1.2%；美国以2%的比率位居西方国家之首；德国和法国为1.5%。如果我们想一想计划总署预计1960年到1985年间人均年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4.7%，我们就会估计出法国经济学家甚至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指望的真正革命。

为什么今天可以设想大大超出过去的经济增长率呢？在我看来，持乐观主义态度的依据如下：意识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曾有利于改变企业主甚至人民群众对劳动和生产力的态度。昨天，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是一系列个人行为直接瞄准的目标，有时候几乎对此察觉不到，今天，要达到什么结果，成为人们有意追求的目的，从企业和政府角度来说都如此。

西欧大陆国家传播现代生产模式，经济中的某些产业如农业过去曾经抵制科技革命。在这些国家面前有较先进国家的例子，至少能够大概预测几年期限内主要产品的总量。为保证技术进步，人们耗费巨额资金进行研究，技术进步的速度确切地说

---

① 这个数字引自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论文《根据国民收入的美国经济增长》。见《工业经济社会研究及资料学会学报》，第844期，1963年2月10日。

加快了，而不是放慢了。总之，一五年以来，西欧国家成功地做到了大大减少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只是表现为加速增长和缓慢增长的交替，而非扩展和收缩的交替。这些论点丝毫不打算证明大陆欧洲的经济，特别是法国的经济能够指望4.5%到5%的人均年生产增长率。这样的比率是例外情况，虽然过去已经出现过（1922年到1929年间的法国，1872年到1880年间甚至1871年到1889年间的美国）。总而言之，如果这个增长率在几十年期间保持不变，还是属于例外。再说它们不可能在一个世纪内保持在4%或5%。5%的增长率导致五十年间增加11倍以上，一百年间增加130倍以上。4%的增长率导致五十年间增加7倍以上，一百年间增加50倍以上。

另外，不仅目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无限期持续增长，而且目前能源和原料消耗量也不可能无限期持续增长。我们计算了世界能源需求目前相当于50亿吨煤，到1975年将是90亿吨。按年增长5%算，石油的消耗到2000年将达到75亿吨。

从长远前景看，不存在能源和原料匮乏的问题，或者相反情况，不存在由于科学进步出现能源和原料富足的问题。我们要指出的仅是，生产的发展如同国家财政部门所估计，从此西方经济持续增长，今天欧洲的增长率高于过去按长时期计算的增长率，美国因其长时期增长率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总之，2%的增长率在一个世纪之后可使产值增加7倍多。

现在让我们来看苏联的数字和斯大林去世以来十年的情况。苏联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在1953年到1958年间继续加速，自1958年以来速度明显慢下来。

在1953年到1958年间，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进行了多种改革，规模最大的是取消"拖拉机站"，所有改革都旨在使集体农庄庄员有更多的可能发展生产和上交产品。自1950—1952年至

1957—1959年，农业生产年增长率为6%。从那时开始，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这迫使政府于1962年1月1日宣布提高食品价格)。最近这些年农业的失败看来首先由于领导人的错误(开垦亚洲的处女地和其他一些决定从技术上说都不令人满意)。

最近几年的失败没有抹去斯大林刚去世后那些年获得的发展。与1958年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水平相比，1953年初至1962年初期间，牛的存栏数增加45%，羊的存栏数增加31%，增长速度是巨大的。人均肉类产品41.5公斤，相当于美国的40%左右。相反，两个国家的人均黄油数量应该说可以比拟，苏联1962年人均牛奶291公斤，比美国稍低(约低15%)。相反，如果我们把当前苏联农业的人均收入同1928年进行比较，我们会感到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只是刚刚在消除。还不应该忘记农业收益是在全部劳动力缩减比例近一半的条件下获得的。

至于生活水平，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五年期间发展得很迅速。在1952年到1960年间，生活水平大概提高了将近50%(但起点很低)。1962年由于农业价格的上升和农业生产的停滞状态，生活水平下降了。根据西方的所有统计，苏联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欧水平，**更不必说**美国的水平了。

工业发展的速度在最近几年明显减慢，但还是属于快速的。1956年的计划于1957年9月被放弃。代之以七年计划(1959—1965)的出台。但事实上，这最后一个计划也处于半放弃状态，或者至少在农业生产方面和在实际生活水平方面它将不可能得到实现。甚至重工业都比预计的稍稍落后。

不管怎样，国民产值的增长率仍然很高。虽然估算各不一样，但最近十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大概在6%—7%。如同在斯大林时期一样，这个结果的取得是由于非农职位的大

量增加(每年4%—5%),以及净投资的百分比非常高(根据A.伯格森教授的估计,在30%上下)。继承者们肯定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改革,力求使制度"合理化"。但是在最近三年内,回归到越来越集中的倾向取代了原来的分散倾向。虽然苏联的经济学家和领导人承认工业经济的复杂性和投资中的必要选择所提出的新问题,专断而精细的计划经济特点在农业和工业中都没有被消除,甚至没有明显减弱。在总产量,也许在技术质量方面(至少在某些领域),显露出与西方经济的靠拢。今天两种经济制度——诸如收入分配、价格作用、增长因素方面——几乎还是和十年前一样相去甚远。

越来越需要**经理**或技术专家的苏联仍然由党内人士在统治。官方思想体系继续证明党和国家的正确性。斯大林主义泛滥的反常现象已经消失。极端的恐怖形式已成往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化是不容置疑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被人们视为独一无二的普遍真理,并且不承认其他学说的存在权利。赫鲁晓夫先生接受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但是不接受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和平共处。

当然,形势不再像过去那样凝固不变。苏联领导人谴责个人崇拜,并不断重复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有权拥有某些创作自由,但条件是忠实地遵循党的方针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天平的指针时而倾斜到自由主义一边——关于集中营的报道被发表——,时而倾斜到另一边,赫鲁晓夫先生提醒人们抽象画和一二音体系音乐是西方腐朽艺术,意识形态排斥和平共处。

换个说法,苏联式制度的固有矛盾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知识分子有完全的辩论自由,他们将会对根本信条、党和无产阶级的混同、国家正统性、党内人士的至高无上等问题展开讨论。但拒绝给知识分子自由不再可能也不再应该被推进到

斯大林式的荒唐地步。知识分子的自由与思想统治的稳定性究竟可相容到什么程度？苏联领导人在摸索中寻找答案，与西方和解以及与中国争吵使他们越来越急迫地要解决这个问题[1]。

---

① 今天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多少百分比？人们的估计仍然各不相同。根据艾布拉姆·伯格森的意见，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在1960年是美国的48%。如果增长率为5%，1980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的指数将为127.8（196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00），如果增长率为6%，指数将达到153.9。在此期间，美国若以3%的比率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将在同一年达到180.6，若以4%的比率增长，将达到219.1。然而，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优势不排除苏联的工业生产赶上或超过美国，无论如何在某些部门是如此。即使在上述假设中，苏联生活水平将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增长率是通过强制投资的方法获得的，除了在农业部门中和管理方法上所作的根本改革，一旦计划者把增长的利润广泛地分配给人民，这个增长率就不可能保持。最近两年即1962年和1963年，农业危机更加严重，甚至工业发展好像都停滞不前了。